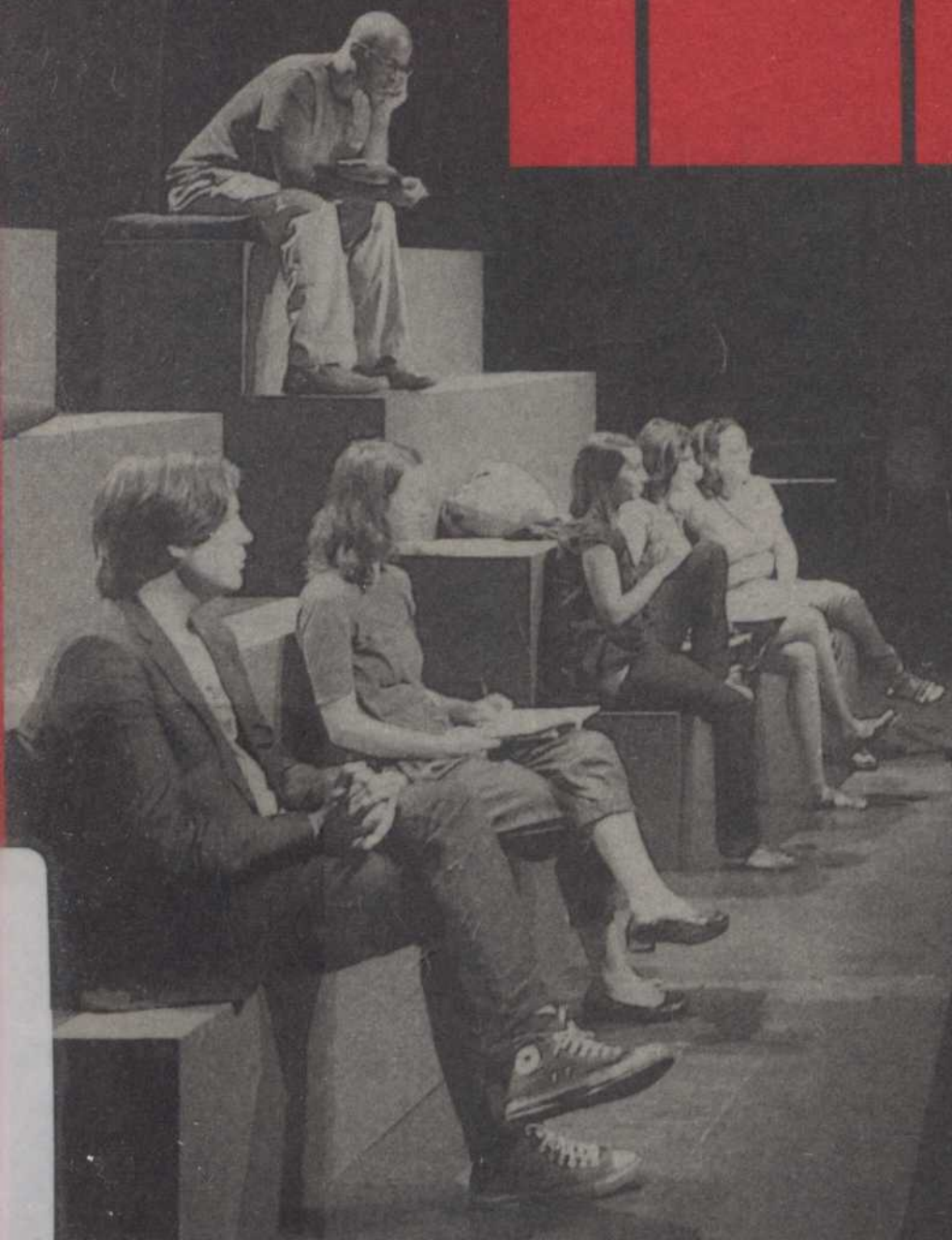


参与的恶梦

作为一种批判性的中立实践模式

The Nightmare of Participation
Crossbench Praxis as a Mode of Criticality

[德] 马库斯·米森
(Markus Miessen) 著
翁子健 译



纵观当下形式创作的趋势，马库斯·米森看到一种几乎是苏联式的、属于政治冰河时期的伪民主和伪参与。在21世纪初的设计界中，他看到的是具有一些被全球化扯着动的犬儒的、没有意义的习俗，信奉政治正确，借用民意堆砌

乍听之下，这有点口吻，或有点潜在法西斯的出口，一些创造批判。我们强悍地介入其他学科，制造异于寻常并意想不到的新空间和新概念。他让人们成为中立者和“不请自来的局外人”，提倡主动地寻找冲突。他认为我们应该鄙视今天这种未发生便已死气沉沉的文化，这个根据自说自话的共识来设计的世界。

一篇论文随时可能是埋葬作者的事业的废墟，但事实上，它以惊人的睿智和深刻的思虑指出了前进的方向，既富有未来意识，又显得正确无误。这不是一本简单的读物，但本书的精要恰恰来自构成其复杂性的所有细微之处。

——道格拉斯·库普兰德 (Douglas Coupland)
加拿大知名作家、文化评论家

上架建议：艺术理论

ISBN 978-7-5155-0607-4



9 787515 506074 >

定价：48.00元

参与的恶梦

作为一种批判性的中立实践模式

The Nightmare of Participation
Crossbench Praxis as a Mode of Criticality

[德] 马库斯·米森
(Markus Miessen) 著
翁子健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参与的恶梦 / (德) 米森著; 翁子健译.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2. 11
书名原文: The Nightmare of Participation
ISBN 978-7-5155-0607-4

I. ①参… II. ①米…②翁… III. ①艺术理论—文集 IV. ①J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27716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Markus Miessen, *The Nightmare of Participation (Crossbench Praxis as a Mode of Criticality)*, First published by Sternberg Press, Berlin, 2010.

参与的恶梦

作者 [德]米 森

译者 翁子健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607-4

定 价 4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最令人讨厌的一件事，就是你偷偷做的梦，居然在现实中硬生生地发生在你身上了，对于这种实现的梦我们给一个很好的名称：我们称之为恶梦。¹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

1. Slavoj Žižek, interview by Georg Diez and Christopher Roth, in *What Happened? The 80*81 Book Collection: Part One* (Zurich: Edition Patrick Frey, 2010), 60.

……一旦某事被过分鼓吹，变成一件庄严的事，不久之后，此事又变得社会性——尽管不是政治的，但是变成了一种人人都有的权利。就是这一点毁了那些互动电视节目，因为人们几乎视之作为一种权利。比如说那些最差劲的电台节目，让你打电话去谈谈你的意见，这种节目成本很低，但能把所有听众都闷死。我才不想听四十五个不知道是谁的人给电台打进电话，随随便便谈论这样那样的想法！好像说，只要让观众或听众参与，节目便成立了——这是今天的当权者心照不宣的做法，而那些想以低成本制作的电台和电视台便照样学起来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差劲的戏剧，差劲的电台节目，差劲的电视节目……¹

——塞德里克·普赖斯（Cedric Price）

1. Cedric Price quoted in *Cedric Price-Hans Ulrich Obrist in Conversation* (The Conversation Series 21) (Cologn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 2010), 53-53.

序：协作的两难

艾亚尔·威兹曼（Eyal Weizman）

参与（Participation）概念中的绝对极端是协作（Collaboration）。“协作”一词包含某人或某团体被迫或自愿地与当权者站在同一阵线的意思，这种勾结可以是政治、军事或经济上的，又或是多方面的。历史上有很多清楚的例子。这种合作往往是在逼不得已之下合理但悲壮的办法。参与/协作的两难在于它预设了一个封闭系统，尽管里面有一些选择，但我们不能质疑这些选择及其提供者。为了让我们顺从，这些“自由的主体”会获得一些不同的选择，我们会在慢性伤害中找到一些小好处，然后心悦诚服地为当权者服务。因此，参与往往引致种种政治和伦理的两难，我们需要清醒地研究在号召参与的背后的种种权力勾结。

参与的两难对大多数非政府独立组织影响很大，构成了当代危机生态。这种两难让社会运动分子不得不与他们反对的政权甚至军队和武装分子合作。例如，一个想“开明”一点处理人命的军官可能会找人道组织合作，而人道组织又需要军方允许才能为人民提供物资和医疗。所以这种参与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这些政权和人道主义机构之间的根本道德差异。

参与两难的核心先是一种权宜之计，继而退化成为一种畸形结构——当权者和反对者互相拥抱，非国家组织变相在政治系统中工作，国家将它的道德意识外判给非政府机构，而这些机构也停止批评政府无能。

在拒绝和权宜地接受之间，参与或回避参与都面对一样的问题和困难。当然，没有一条公式可以破解这两难，但对政治构思 - 实践的审议，可能有助我们找到政治模式的方向，并不断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问题的局限。前者通过看清错综复杂的政治

关系，通过研究分析困局四周的力场；后者通过展望更远的将来。

古希腊人认为两难困境是悲剧的要素。所有“悲剧英雄”面对的选择，都必然导致不同形式的可怕折磨，所以，困境就像让你在发怒公牛的两只牛角之间选一只，但是我们根本就不应该思考选择哪只牛角，而是应该思考为什么要接受加诸我们的问题和选择。罗伯特·波西格（Robert Pirsig）就提出了几个方法去颠覆这个困局：我们何不“拒绝进入竞技场”、“向公牛眼里扔沙子”，或者“唱催眠曲哄公牛睡觉”？

政治和空间活动家总是难免于妥协，但是他们的实践必须找方法去挑战所谓真理，无论他们选择合作还是抗争，他们都应该不断挑战当权者——正是这些人把公牛放出来，还让我们选要哪一只角。

当我们无法选择时，拒绝可能是最有效的政治行动，但这个选择一定要保留给那些可以并愿意行动的人。

目 录

- 1 引言：何为当务之急？
- 17 第一章 超越浪漫主义的空间实践
- 32 第二章 破除参与的天真幻象
- 52 第三章 宏大叙事——后毕尔巴鄂生活
(幕间节目)
- 81 第四章 共识的泥潭
- 89 第五章 合作与冲突
- 104 第六章 再访民主（与查特尔·墨菲对话）
- 167 第七章 平行现实——进入体制的左派
- 177 第八章 向市场学习
- 197 第九章 危机与失败
- 201 第十章 不请自来的局外人

214	第十一章 未来的学院——教学体制建成中
232	第十二章 批评与赞扬之间的灰色地带： 中东冬季学院
242	第十三章 没有指令
254	第十四章 中立的实践者
271	大写建筑
286	后记
291	跋
302	参考文献
320	致谢
326	合作者简介
335	作者简介

引言：何为当务之急？

你面前的这部小书试图勾勒出一个假设：有时，我们必须不惜代价地避免无所不包容的民主。在任何一种协会组织、网络或机构里，必须有人愿意承担做决定的责任，才有可能克服分歧，并将决定付诸实施。

为辩证这一点，我会提出一种后共识实践，它将不再需要体制复杂而以共识主导的政党，或任何类似的架构。它将说明破除参与的天真想象是何等必要。

目前，无论是在政治界，在左派中间，或在空间实践及建筑等参与的最明确的产物中，参与都处于转变的时刻。在历史上，或者在政治团体的眼中，参与都是一种关于商议、包容和民主决策的浪漫观

念。但是，正是这种总是没人质疑的包容模式（政客将之当做万试万灵的零售政治竞选策略）根本不能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因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盖过了任何批判性。与之相反，这本书鼓吹将参与视为一种冲突的实践模式。它与一般民主分子的思维背道而驰，还不时采取概念的暴力和独断的决策，目的就是为建造引起变革的框架。

《参与的恶梦》一书希望超越人性本善的想法。参与的传统模式建基于包容，它假定在一个平等社会里面，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同等的重要性。通常，只要简单地提出一种容许由下而上的包容参与的结构或情境，政治家或机构就会被冠以“善人”的称号。有趣的是，有某些角色，比如策展人（curator）的工作就是要作出决定，于是也必然需要删除选择。尤其在形势严峻时，参与被尊崇为抵抗一切罪恶的救星。这种柔软的政治真的需要质疑。

我将参与定性为一种进入政治领域的方式（强行进入现有的权力关系之中），而不是一种为了获

得政治合法性而“以政治驱动的伪参与”（让人们好像参与了决策）。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对民主原则的不信任，而是基于对富有成效的批判性改革的纯粹兴趣。

可能会有人认为我所提出的模式里暗藏一种机会主义。其实，它质疑“主流就是智慧”这种普遍看法，而提倡一种主动的公民权，让独立的局外人（在某既成的政治结构之外）变成改变的推动力，它强行进入现有的论述，而不是简单地把事情抛给大家解决。在“民主”的竞技场里，我将参与混种，将它变成一种暴力形式，一种非民主的实践，一种机会主义干涉主义的模式，它将发起一种脱离决策一体化模式的后共识实践，也会为富有成效的内部斗争提供条件。我最终称这种实践模式为“中立的实践者”。

这个进行中的计划旨在修补参与，企图开创新的语言、新的实践、新的行动场域，而不仅仅停留在现有的抗争中。本书运用了多种写作方法，但归

根究底是一部以建筑思维为方法的书。

在本书的框架里，我引用了过去三年间我进行的一系列的实验，每一个实验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直指上述去除参与的天真想象的目的。其中一些实验是文本的，有一些是在艺术界进行的，还有一些是城市干预，体制模式的构想，或实体建筑项目——通通都是为了验证改变的可能性而作的本土小型实验场。

接下来的每一章都是一个星系模型，其中星球在虚空中旋转。希望这本书出版时，这个虚空将会被一种实践模式填满。这种模式将会提出和揭示问题，但既不通过等级分明的组织，也不属于某一领域，而是通过星系的方式：一种关系模型。读者会找到应对这种无等级的模式的多种尝试，及对某些议题和问题的抨击，目的都是为了打开一种更开放的工作方式的可能性。

在最近进行的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中，这是三部曲中的第三篇，这个三部曲旨在质疑人们现在对参

与性实践的理解，从而破除幻象。第一部只是质疑它：《有人说参与吗？空间实践地图集》¹（*Did Someone Say Participate? An Atlas of Spatial Practice*），第二部则踢它一脚：《参与的暴力》²（*The Violence of Participation*），而这一部则提出一种另类方法，尝试处理和打开这个问题：今天，究竟如何去书写进行中或持续的工作。

这套理论关于如何从外（而非从内）参与到一个定义分明的权力架构中。传统观点认为参与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行为，而我试图避开民主的邀请，半路加入讨论，也可以说是从侧面介入。

我会把这本书当做一种工具使用，但它的功用不一定是补充，或积累和消化已有的知识，它是一部能综合及提炼我手上的各种实践和项目的内化机器。本书的立场是不需要熬过任重道远的学术研究，也可以发表批评意见。我不研究某个主题，而是探讨一个问题：即参与的陷阱和它可能走向的死胡同。

上面说的每个星球都代表着一种大胆尝试，都

为了凿开一系列的潜在问题。除了传统而怀旧的街垒冲突外，我们还可以怎样抗争？如何提出一种关注社会及政治关系的另类空间实践？这种多重的实践可能会是什么？它为何有效，又是否总是在迫切中才有效？

将分散的实践提炼，就是将生活转化成一种实践，它的出发点是一种不靠指令而行动的意志。这种自发的实践将摆脱现有的经济模式，不再跟随明确的“客户 - 服务提供者”关系，它将可能令我们进入甚至生产一个异类论述或知识体系。

这些问题和实践的可能性将被放在一个更大的计划中，一个更成熟的模式，以产生一条属于自发和应用的个案研究及不同干预模式的轨道。除了思考所谓的“参与实验”的三重结构外，我还将介绍一系列的项目，比如中东冬季学校（the Winter School Middle East）以及欧洲艺术馆（European Kunsthalle），目的是把这些项目作为实例，其中本书描述的一些问题在各种本土情景中得到细致的考

察。这些实例示范了一种建立小规模独立机构的实践模式，它提供一些与公共艺术机构和名牌大学地区分校不同的方法。在这些例证中，我将自己变成政府级体制的一员，进入正式的政治环境中，得出了一些对比鲜明的经验，其中，既有斯洛文尼亚政府任欧洲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时主持的一个项目（“欧洲东岸”³），也有一个经迪拜政府蒙塔玛拉特智囊团（think tank Moutamarat）委托的研究项目，这个项目的成果就是2007年出版的《有或无——中东地区的空间成品、政治和实践》⁴（*With/Without—Spatial Products, Politics and Practices in the Middle East*）。

这部书的大部分材料、研究和知识不是长年累月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工作的成果，而是来自一种通过实践而生产知识的尝试。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材料就像是一种档案或日志，记录了过去五年来我在这个领域——这既定义了我的实践又草绘了我对实践理解的领域——的搏斗。激发我开展这项工作的一个动机就是反思这些议题的材料还远远不够，因

此我决定必须建立这样的档案库。比如说，很久以来我都对比利时政治理论家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的作品非常感兴趣，但是总找不到一种具体形式或方法，去直接介入，思考包括什么排除什么，以及如何参加到现有权力关系力场中。因此，我既不跳过她的理论，也不再重读她的书，我约墨菲直接交谈。这样就产生了这个历时三年的长篇访谈，目的是梳理关于参与本身的一系列假定和颠覆。本书第六章就是这个访谈的节选。

更一般来说，访谈允许我更易于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去检验我的假设。我建立了一个网络，其中人们的响应和与他们的谈话有助我想清一些理念。因此，访谈是一种参考文献。自行产生的词汇成了参考文献；各种文章成了参考文献；建筑项目成了参考文献；实地考察和与机构的合作项目成了参考文献；出版物、展览及编选工作也成了参考文献。

曾经和我交谈过的一些人，在这本书内容的成文上有助于我，包括查特尔·墨菲、德国工人代表

艾尔哈特·艾普勒 (Erhard Eppler)、美国语言学家和哲学家诺姆·乔姆斯基 (Noam Chomsky)、英国艺术家利亚姆·吉利克 (Liam Gillick)、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 (Rem Koolhaas)、斯洛文尼亚欧文艺术集团 (IRWIN Group)、荷兰理论家勒默尔·凡·托恩 (Roemer van Toorn)、德国策展人菲利克斯·沃格尔 (Felix Vogel)、斯洛文尼亚编剧、策展人和作家的艾达·库福尔 (Eda Cufer)、以色列建筑师艾亚尔·威兹曼、伊朗策展人阿沙汗·赛帕万德 (Ashkan Sepahvand)，以及美国城市规划专家和作家凯勒·埃斯特林 (Keller Easterling)。

我还要特别感谢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探讨实践模式的细节。我在伦敦期间以及探究这个主题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在撰写《有人说参与吗？空间实践地图集》一书期间，我和舒门·巴萨 (Shumon Basar) 保持了密切的工作关系，我十分欣赏他的真知灼见和幽默感。最近，我和加拿大艺术家帕特丽夏·里

德 (Patricia Reed)、瑞典建筑师马格努斯·尼尔森 (Magnus Nilsson) 以及意大利策展人蒂娜·迪卡洛 (Tina DiCarlo) 的交谈使得这本书的内容得以检验和发展。我还想对弗兰兹·凡·斯托芬伯格 (Franz von Stauffenberg) 致谢, 与他的一次餐桌谈话对我大有启发, 影响了我对浪漫的怀旧情怀的思考。

如何提出一种介入社会政治的空间项目的另类实践? 一种多重的实践可能会是什么? 空间规划通常被当做管理空间冲突的手段。城市和进步的机构是作为社会和空间的冲突地带而存在的, 通过不断转化而不断议定它们的边界。要处理冲突, 批判决策就必须演变。现在人们总认为决策的最终目的是达成共识。为了反对这种共识的政治性, 批判性的空间实践应该在空间生产中推动微观政治性的参与, 并探讨如何用“空间”的角度对未知的知识领域、专业或论述做出贡献。经过专业化的周期, 我们可以将未来的空间实践者视为一个局外人, 他将不试图建立或维系共识达成的共同点, 反而通过在

人们熟识的知识领域之间挑起矛盾，从而进入既有的情景或计划。我会用一系列的实例研究作为干预方法的试验场。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认为，“打破共识机器”的需要与日俱增。⁵ 如果认真考虑这个想法，就应该尝试理解和描述批判性地介入未知知识领域中的重要性——利用空间状况作为文化考察的手段。这个进行中的项目考察建筑师的角色，也考察当代机构的角色，重新审视现有的参与模式，反思当中的共识文化和妥协风气；这些例子将描绘出当代体制是如何构成的。

我会介绍和讨论今天我们如何需要能超越既定网络和范畴而工作的人，将常规专业知识放在一边，尝试和其他后科学的现实重叠。空间实践的另类参与模式将会产生，其中参与首先是一种超越共识模式的方式：它不寻求同步，而主张保持距离地参与，并主动利用冲突的空间。在这空间中，我们可以将现状解体，产生策略性地孤立起来的分子，并（误）

用之以制造摩擦。这种实践有助我们理解软设计成分（soft design components）的作用，无论是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上。

另外，我将在空间组织的专业背景下，研究如何建立可介入冲突的专业知识领域的体制。用建筑师的学识和技巧去划出冲突的场地，这种疑问将爆发出一个问题的群岛，试着揭露空间和建筑专业知识的实用处，以及如何在体制的范围内创造一种另类知识生产。

我不提供一份说明书，我将列出一些可能的出发点，提出有批评距离的响应声音，或有助于理解建筑师可如何面对当下的问题，综合上述各种元素以创造一种选择性的、操作性的观点。一位建筑师研究一个情景的方法，何以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的典型方法？在第八章《向市场学习》中，我将“不请自来的局外人”（及之后的“中立实践者”）与市场主导的传统咨询方法论并置；我将反思亚马时德·加若达黑（Jamshid Gharajedaghi）提出的系统

架构，介绍这位第三代系统思维的奠基人之一。这种系统方法论的核心就是反复不断地设计。在游走及行动于不熟悉的结构之间可能很困难，问题是我们如何在扩展的新环境中获得足够的信任和理据。

另外，我以多种不同的角度观察我感兴趣的参与现象：就政治科学而言，借用查特尔·墨菲的主要理论冲击英国新工党的政策和荷兰浮地模式（Dutch Polder model）。在 20 世纪晚期哲学的较大范围内，我引用（或误用）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和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Said）的作品 [尤其是《知识分子论》⁶（*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一书]，展开了一场虚拟的对话。就空间实践而言，通过阅读凯勒·埃斯特林和艾亚尔·威兹曼的著作，我考察了建筑学的软思维。我引用弗洛瑞安·施耐德（Florian Schneider）的文章以打开关于协力的批判论述。我还“窃取”了德国政治家约施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的传记，以他的例子说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迈向体制的长征”的错综

复杂性。读者也会通过一个德国政府资助的大型项目，认识到如何用政治正确、申请资助的语汇去构成一个参与项目，这将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例子，让我们明白为何必须强烈反对这种伪民主。

我希望这种新创的方法论会为我建立论据。然而，这到底是一部什么种类的作品，这依然是问题。它的内容既非历史调查，也不是来自前线行动的报道，而是为了说明我的论点而自行产生的多种论据的混合体。我引用项目、材料和文章以发展出一套冲突参与的理论，这种方法就像建立一个档案馆：不像图书馆，而是综合了不同知识和东西的（实质的）集装箱。

我们会进而考虑到，这本书在更大的论述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如何反对传统的参与方式，成为一套严谨理论。我希望本书的技巧将会产生一个集中的声音，将现有的论述进一步区分，同时就我的激进政治实践、批判性空间实践、艺术创作和近期写作引起激烈的辩论。

我做所有事情时，都尝试（有时候偷偷地）从一个面对复杂的现实情况而工作的建筑师的观点出发，这种定位几乎马上引起关于这种专业（姑且如此称之）的运作状况的问题。我们一旦走出建筑的专业领域，便会发现建筑思想变得有趣起来，甚或才真正能发挥其所长。我认为，建筑永远是在断裂时刻的一种个人行为：一种要跨越现状的决心。

我知道我的方法论对学者来说是恶梦，因为我用的大部分资料都并未获得历史的鉴定，在图书馆也找不到，但这正是写作本书的重点。我关注的是政治性的状况：思考未发生的事情。所以它不是研究（research），而是探询（inquiry）。

从很多方面看，我为讨论而提出的专制模式不应该被理解为实践的蓝图，它一个出发点能够创造出必要的摩擦来引起辩论，也会从本质上促进实践发展。如果说这本书只有一个目的的话，那就是要发展一种共同的理解，一个起点——用墨菲的话来说，即我们可以开始说不同意。这是一套关于如何

不为选票或选民，但为推动关键的改革而参与的理论。这里有两个论点：一个是抨击性的，另一个具有概念的建设性。有时，这些论点会在具体的情况和项目中发展，西蒙·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会说这是一种“情境的普遍性”（situated universality）。⁷

注释：

1. Markus Miessen and Shumon Basar, eds., *Did Someone Say Participate? An Atlas of Spatial Practi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2. Markus Miessen, ed., *The Violence of Participation* (Berlin and New York: Sternberg Press, 2007).
3. Markus Miessen, ed., *East Coast Europe* (Berlin and New York: Sternberg Press, 2008).
4. Shumon Basar, Antonia Carver, and Markus Miessen, eds., *With/Without: Spatial Products, Practic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Bidoun; Dubai: Moutamarat, 2007).
5.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建筑协会的圆桌谈论，伦敦，2006年3月10日。
6.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7. Simon Critchley, *Indefinitely Demanding: Ethics of Commitment, Politics of Resistance* (London: Verso, 2007), 42.

第一章 超越浪漫主义的空间实践

从历史的观点看，建筑学是从事建筑物及环境设计的专业，它的工作涉及美学，而它研究的是设计及建造的原理。在传统的建筑中，重要的是计划流程、宏伟景观、商品、基础设施、环境布局。我并非试图去判断建筑学的价值，而是希望观察建筑学大体上是如何运作的。在现在的经济状况下，建筑师被迫尽可能减少摩擦，直至他沦为一个平庸而漠然的角色，在这工作中，任何对于传统模式和惯性做法的质疑都被视为损坏“共识机器”的不良企图。

在以前，谈到建筑实践时，建筑师都被描绘成建筑物的设计师、监督和负责人，他将提供一个极致的方案，他用个人的风格将“建筑”变成一件独

一无二的作品。他就像完美的“文艺复兴式人物”（Renaissance man），通晓多种知识的博学之士，正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建筑由一种不涉及文字的实际行为（去做！），发展成一种知识框架和智力行为（去想！）。19世纪的绅士又是“文艺复兴式人物”的变奏。就空间实践来说，把建筑理解成各种实践——在建房子及纯理论这两个极端之间丰富多元的实践——的混合，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即第一次将建筑之元概念从建造的欲望中解放出来。即是说，最终是否建成什么已不再重要，纯粹思想的产物也可以是建筑学的成果。

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内，博学之士无疑是很不被重用的。现在，人们要马上看到成果。今天的建筑师缺乏多种学科的知识，也没有全面而周密的视野（甚至也不能质疑既有的功能形式和行事方式），他们面前是一个愈来愈注重经济效益的体系。客户总是要求更原创的设计、更高的效率、更精良的细节、更丰厚的利润，而建筑师还必须面对过时

的法规、糟糕的工人和微薄的报酬。今天的建筑师举步维艰，一方面要确保建筑计划稳妥顺利，一方面又想加入更多创意。正因如此，开发商渐渐变成了“新建筑师”。这是一个危机：开发商往往能更便宜、更快地完成一项建筑工程，他们找建筑师，只需要他们提供一个设计样式便足够了，于是很多当代建筑师的工作便仅仅限于画设计图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法规掌管着建筑物的生成和外观，建筑师成了一只头戴大红毡帽，听见音乐便跳舞的傻猴子。建筑师——甚至不再是必需的了——已沦为那个在烘焙好的蛋糕上摆些草莓装饰的角色。

为了突破这些关于建筑的普遍观念，或许我们应把建筑学视作一种超越传统学科领域的知识力量，一种跟空间现实和其形成有关的实践。我们似乎极需要超越传统定义，重新评价空间成品，以空间中的积极参与建成一种“知识的建筑”。对空间状况的理解、创造及变革为认清更广泛的政治现实提供了前提。当今的空间实践不仅利用关于城市社

会的多变性的实验研究，而且会应用种种实体和非实体结构，以改变及调节空间的设定。或许造成的变化很不起眼，但这些实践的确有一种无可否定的优点：一种能产生具体影响的、行动的乐观主义。

当然，这些实践不仅仅是乐观主义 [相对于盛行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美国都市及空间理论中的、那种以悲观主义和单向评估为主导的杂乱无章的知识生产模式，如沙朗·佐京 (Sharon Zukin)、麦克·戴维斯 (Mike Davis) 或者迈克尔·索尔金¹ (Michael Sorkin) 等人的论著]，也呈现出日常居住环境的复杂性。这些实践增强了我们对微观政治斗争的洞察力。要想看清空间形成的过程，就必须克服现有的话语缺失，把实践转换成一种观察方式，关注空间建构的瞬间性，以及由日常现象和习性构成的城市文化。近年出现的空间地图学，其好处在于不必事先假设最坏的情况，但也不是说要丢弃批判性观点，而是去体会物质世界的复杂性，并把这种复杂性视作介入的契机。

在建筑学和城市理论中，“参与”通常解作进入或使用，大概即是赋予人们以空间使用权。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我们看到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愈来愈喜欢参与性项目和让公众参与规划，其中很多项目和论述的核心概念，都是设立一种系统让使用者可以参与空间的规划及构成。

纵观20世纪的建筑史，我们看到以参与的角度反思传统建筑实践的多种尝试。然而，大多数的尝试都仅限于提出一种抵抗，都是旁敲侧击。除了超现实主义者的随意性和情景主义者的意识形态集会之外，还有一些人提出过不同的抵抗方式。例如，在60年代，建筑师小组TEAM 10倡议以诸如迁移率、日常生活模式及城市人口递增率等概念作为城市规划的基础，这样，社会改革（以前是由领导阶层下达指令以某种建筑构成的）便得以自下而上地根据社会内部发展而进行，并以建筑和规划去管理。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师的工作应该是硬件的管理员：扩大、降低、调控各种系统内的流量和强度。

法国人尤纳·弗瑞德曼（Yona Friedman）的作品基于不可预测性的原则。他调查诸如住房短缺和市区重建等尖锐问题，并公开其调查结果。他提议建造一些巨型建筑物，在里面，居民能建造自己的住所，他又制作了一些简单的漫画手册，引导人们设计自己的居住环境。英国建筑师塞德里克·普赖斯也提倡建筑中的“可把握的未知性”。他横向地思考建筑，又提出在城市公共艺术中强调时间性，这些都令他的作品在另类当代实践中有历久弥新的影响。普赖斯与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卢修斯·巴尔克哈特（Lucius Burckhardt）的工作有相似之处——卢修斯对规划方法论和城市参与的另类模式特别感兴趣，他尤其注重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所有角色提供新的学习。² 因此，在80年代的IKAS会议³上，他们的方法被平行研究。该会议有来自四十个国家的二百多名与会者，会议的特点是讨论建筑的社会任务，而非后现代话语中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会议的议题包括民主化、使用者参与、工程的可持续性

以及建筑物的长远使用等。会议上研究的模型都是以参与为先决条件，认定共识及社会参与是实践的原动力。

近年，“参与”一词在建筑和规划的领域被滥用，类似的现象先前在艺术领域也发生了，比如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在90年代提出“关系美学”⁴（relational aesthetics）这一术语，认为评价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应该基于“作品在社会背景下如何与人互动，而非局限于独立及私密的符号空间”。⁵有别于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主流创作，这种具有关系层面的创作较少关注物件，更多关注作品的现场甚或表演性，因此，作品非常依靠观众的互动及参与。克莱尔·比绍普（Claire Bishop）的近作《参与》（*Participation*）便探讨了观众如何由观察者的角色走向制造者的角色，并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⁶

对参与一词越来越多的应用，在某些情况中，能看到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架如何被演变成实践。杰

里米·提尔（Jeremy Till）认为：“‘参与’这个字眼近来像当代政治中的‘可持续性’一样成为被滥用的口号了。”而这两个口号在“可持续发展社区”（sustainable communities）的概念中相遇了，因为理论上，“可持续发展社区”都是根据民主参与的原则而建立的。问题是，由于过度使用，“参与”、“社区”和“可持续性”这些词都失去意义了。这些字眼只有表面的意思，但只要对之稍加思索，便会发现其中对于什么是关键问题没有丝毫反思。“所谓参与经常只是安抚的权宜之策，而不是真正的改革过程。”⁷

以下段落选自我和温哥华艺术家萨宾·贝特（Sabine Bitter）的简短交谈，谈话内容关于由德国联邦政府通过联邦文化基金会资助的大型城市研究项目。萨宾·贝特和他的搭档海马特·韦伯（Helmut Weber），以“贝特·韦伯”的名义从事有关城市地理和视觉政治的项目。

马库斯·米森（以下简称“米森”）：萨宾，我们曾就加拉加斯（Caracas）的项目谈过很多次了，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项目。

萨宾·贝特（以下简称“贝特”）：这是我们在2003年做的为期半年的研究项目，主题是非正式规划城市空间的文化。这个项目主要是关于城市〔委内瑞拉（Venezuela）的加拉加斯〕的非正式规划和混乱的部分，诸如贫民区、街边摊、非正规经济活动和交通堵塞，人们认为这些事情是城市发展的毒瘤，而且日益恶化，变得无法控制，影响了正式的城市规划及设计。

米森：在这个项目中，你和海马特·韦伯合作，你主要负责什么？

贝特：这个项目是以德国文化基金会（即联邦文化基金会）和加拉加斯城市智囊团授权的一个以研究为基础的，我们以视觉艺术家的身份获邀请，理应纪实地反映这个城市“失控”的现象。

然而，我们把重心从简单地描绘转向深入研究引起都市化进程中受争议部分的历史、社会及政治状况。我们通过项目——比如录像作品《活的巨型建筑》（*Living Megastructures*）和《超级公民》（*Super Citizens*）——看到一种“转变中的城市”（transformative urbanism）的概念：那里的居民希望社会的关系架构，而不仅仅是改善自己在城市中和生活和工作的形式。

米森：你最初是怎样构想出这个计划的？

贝特：最初，我们想建立一个城市设计办公室，结合不同学科的专家，从事一些半学术性的研究工作。

米森：整个项目是由谁组织的？

贝特：是由一个名为“加拉加斯城市智囊团”的团体组织的。我刚才提过，这计划获得了德国文化基金会的资助，是一系列关于城市的项目中的第

一个。一些大学和机构成为这个项目的战略伙伴。那时加拉加斯的两个建筑师领导着这个智囊团，他们是阿尔弗莱德·布瑞拉姆（Alfredo Brillembourg）和哈伯特·克拉姆内（Hubert Klumpner）。

米森：关于这个项目的组织，您有什么经验谈谈？

贝特：它就像一个运用前景研究和理论的建筑办公室。

米森：这两位建筑师布瑞拉姆和克拉姆内，在组织内部和这个项目的实施上，担当什么角色？

贝特：他们作为这个办公室和智囊团的主任，“当然的”就成为负责这个项目的权威。

米森：在我看来，这个项目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如何误用了社会参与的模式和论述，而这些模式和论述经常被用于制造经济来源。用这些模式和论述当然没有问题，但人们经常有意地将之过分放大。

我听说过一些关于资金问题的传闻，你们的资金真的消失了，被存到了一个海外账户上了吗？

贝特：我们等了好几个月才收到第一笔资金，真的很让人恼火。我和海马特·韦伯要为维也纳的工作室付租金，其他参与者也要付他们的房租，而且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在加拉加斯租了一套公寓，才能在当地开展工作。在传闻这个问题上我想说明一下：当我们追查那笔资金时，发现了一个海外账户。那笔钱没有不见，只是“晚了”，所以让我们很担忧，并引起各种猜测。把资金转到国外账户上似乎是委内瑞拉上层社会的惯常做法，当我们付租金时也是把钱打到一个迈阿密的账户上的。

米森：在这个项目之后，对于艺术和建筑领域的参与概念，尤其是那些所谓的“社会项目”，你的理解和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贝特：在这个项目的大纲里从来没提到“社会项目”——只是参与者渐渐走向探讨社会和政治情

况，使得“城市规划方法”显得太迟钝——而项目的最终成果也呈现了一些批判意识。我和布瑞拉姆和克拉姆内就一个城市研究项目的“非政治”角色进行过多次耗费脑力的讨论，数度使项目陷入既耗时又痛苦的局面，特别是妨碍了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城市结构内部的社会、政治和形式方面的表达。

米森：身为局外人，我觉得这个项目似乎产生了矫正所谓“社会项目”之观念的方法，并且用“参与是创造一种经济模式的影子战术”的市场主导观念替代之。你怎样看这个问题？

贝特：这恰恰是我们遇到的和想挑战的问题。

米森：你是怎样挑战这个问题的？

贝特：在我们的项目里，我们发现了一种契机，即空间呈现的政治性。我们制作了一幅“1月23号居民区”（barrio 23 de Enero）的图片，该区完全是根据新玻利瓦尔宪法建成的，而我们设想把

23 号区的特殊历史和政治现状，与目前主张以民主参与进行社会改革的国内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我们将这个图像放在 Bellas Artes 地铁站里的一个“文化壁龛”（cultural niches）内展出。我们可以在那里展出图片，因为那时负责管理这些“壁龛”的两位女士，正是住在 23 号区的。她们马上就同意让我们展出了，因为她们觉得像 23 号区这样的地方及那儿的居民，从不曾在像 Bellas Artes 地铁站这样的空间里被展示过。我们还在地铁站内放映我们在 23 号区拍摄的录像，片名为《活的巨型建筑》。作为艺术家，我们有机会创作大型图像，又可以进入公共空间展出（这多亏了地铁办公室那几位了不起的女士，她们意识到一幅城市面貌图像也是政治的）。这样，我们没有参与经济生产，而是以一种批判的方式对现存的经济关系进行反思，并且希望争取加拉加斯的经济和空间问题上的公义。

在计划之初，我们便认定我们必须向当地居民学习 [正如我们一件作品的标题“向拉维加学习”

(Learning from La Vega) 所说的那样], 而不要自认为是空降来解决空间或社会问题的外国专家。我们不是迷恋这种社会上被边缘化的人的知识, 而是相信所谓知识应该是一种更民主的概念——有文化知识, 也应该有空间知识、社会知识。

注释 :

1. Michael Sorkin, ed.,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2. 参见 Jesko Fezer and Marin Schmitz, eds., *Lucius Burckhardt: Wer plant die Planung?: Architektur, Politik und Mensch* (Berlin: Martin Schmitz Verlag, 2005); and Markus Ritter and Martin Schmitz, eds., *Warum ist Landschaft schön? Die Spaziergangswissenschaft* (Berlin: Martin Schmitz Verlag, 2006)。
3. 建筑和城市规划国际大会。
4. Nicolas Bourriaud, *Relational Aesthetics* (Dijon: Les presses du réel, 1998).
5. 同上, 14 页。
6. Claire Bishop, ed., *Participa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7. Jeremy Till, "The Architect and the Other," *openDemocracy*, http://www.opendemocracy.net/ecology-landscape/architecture_3680.jsp, accessed June 26, 2006.

第二章 破除参与的天真幻象

美好怎么变成坏的了？当连美好都是坏的，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何等病态的社会呢？¹

——乔治·科斯坦萨（George Costanza）

民主带给其追随者的责任压力已经重得无法承担了，民主的理念又同时饱受现实景象的冲击和怀疑者的质疑。民主不能有丝毫出错，而希望担起民主责任的人们也渐渐无法辨认他们选出的代表在日复一日中设下的骗局。他们反而鞭挞那些传信人（……）我们几乎敢肯定，如果奥地利的政治代表制奉行真正民主原则的话，像约格·海德尔（Jörg Haider）这种人绝不能成为一个政治公众人物。²

——约瑟夫·贝尔比奇（Josef Bierbichler）

参与经常被吹捧成一种伪怀旧情怀。参与的模式也可以是民粹主义的，并被如此利用。例如，公投便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参与方法，它能强化民主，也能侵蚀民主。在当下的意识形态危机中，公投很受大政党的欢迎，因为他们都害怕作出不受大众欢迎的决定。这种“责任-心理”导致了今天政治中的决策权外判的现象。通过公投，那些被人民赋予决策权力的代表，就暂时不用承担决策的责任。当他们总是征求大众的意见时，他们自己便不需要有什么远见及观点，可惜公投的结果也不会创造出什么新的观点，仅能说明社会上哪些是大众哪些是小众而已。于是，这种对民主的侵蚀发生在内部，其诱因是假共识。这是对民主模式的稀释，它非常危险，因为它容许，甚或在某程度上说，鼓吹政治极端主义的抬头。

最近在瑞士发起的关于禁止伊斯兰尖塔的全民投票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其实情是SVP（Schweizerische Volkspartei / 瑞士人民党）动用他

们在郊区的影响力，特别是利用大马路上的宣传攻势，“协助”人们作出决定，利用所谓的参与民主去推行排外主义。民粹派就是喜欢这样：只有用公投才能反映出国家或者特定政治体制内的主流意见。但我们也不能忘记，往往是谁愿意投更多的资源到宣传，谁就获得主流的支持。当然不是说所有投票活动都是这样，但金钱政治往往比我们想象的由下而上的民主要有效。结果，投票的瑞士人中竟然有 57% 赞成禁止兴建伊斯兰尖塔，但讽刺的是，在另一项的统计调查中，瑞士却被评为全欧洲最不排外的国家。

就工具的元层面，或就行为模式本身，“参与”其实并非一种特别的性质取向。说“参与”，就像在建房子时说“锤子”一样，并不表达出什么重大意义。坦白说，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需要征询全部人的意见。人们似乎错误而偏执地觉得获得所有人的意见是最迫切的事，这种偏执起源于政客担忧失去权力，希望保住选票，以及想更策略性地调控其

他权力单位。国家政治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权力结构的，所以要在政治力场内保住自己的位置，就不可能只顾着维持或扩展自身的权力。³ 参与只是一种激进的时尚（Radical chic），它之所以在政客之间风行起来，是因为只要抛出了这个有批判性的工具，政客就不再需要作出决定性的建议了。

这样的话，参与便变成了一种浮力生产，一种社会镇静剂，其弊端并非民众可能作出的决议，而是在于它取消了民众对决策人或代表作问责批评的基础。这给我们一种预感，即纵向管理的精神和概念在今天尽管是有价值的，但它将会被当权者用作一种政治筹码，而在这种政治交易的经济中，政治正确性也变成了一个错误的命题。好像有一种潜在的共识，让我们不只思想行动都要政治正确，而且说得更直白，它还要我们相亲相爱，不能引起混乱和争议。如此，具批判性的质疑便愈加罕见了。更有问题的是，这种因为政治正确而产生的包容，甚至也渗透到那些自觉具有批判意识的人里——他们

往往不出声，好像一旦抒发己见就会危害到他们整个事业发展似的。

我不是要抨击政治正确性本身，但我希望指出现在流行的这种参与将把我们推向一种终极的无意识，在那儿那位应该接受问责的主要决策人变成了仅仅是所谓大众的品位和取向的代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有胆量踏出一步说：“等一等，这是有问题的，我们应该重新想想！”

近来，人们谈论参与时，似乎都假定了愈接近某事或某人，你就会投入更多感情。这是一个可怕的假设。今天，一旦我们开始谈论参与的话题及 / 或问题，我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日俱增的令人讨厌的浪漫情怀，而这种浪漫情怀却在今天渗透到整个政治世界里，无论是最核心的左派还是最极端的右派。但如果我们不再可能超越最主流的取向和情感去作出决定，这个世界会变成怎样？在社会层面，似乎我们谈论性谈论得愈多，我们的性生活便愈冷淡；我们愈是表面化地公开参与，我们便其实愈是漠不关心。

近十年来，对于“参与”一词及其民主原则的使用总是那么温情洋溢、理所当然，我们目睹了对参与性的几乎盲目的信奉，伴随着一种畸零的、不作批评的、为了所谓参与而度身订造的结构及理念，不管是国家政治、地方事务还是艺术项目皆如是。似乎对于抱着这种行善的浪漫情怀的公共参与者、机构或党派，我们急需一种敢言、坦率的政治声音。这声音必须打破政治正确性的束缚，尤其要打破那种为了顾全政治体面而达致的和谐共识。这声音要因应不同情况提出批判性意见，要以坦率、专业、批评及判断去取代和谐。没有比由于错误理解政治正确性而造成政策失误更糟糕的事了。

在建筑范畴中对于参与概念的（过分）使用，仅仅是这个行业近二十年来面对的更大危机中的一小部分。“社会性”项目在整个90年代涌现，这只是行业的经济不稳的一个征状。关于参与，有一点是从未怎么被讨论过的，即为什么这么多建筑事务所转为从事更包括性的，以过程为主的研究项目。

其实这是因为他们接不到大型的建筑项目。有趣的是，人们讨论建筑时从不讨论经济的元素。直到90年代末及千禧年之初，去到像柏林这样的城市，人们惊叹当地的建筑及空间都带有很高的包容性及社会责任意识，其实这正是建筑界所面临的更大的经济危机的先兆。可以说，建筑的这种社会危机可能最不能够反映参与，因为它既不全然基于社会民主原则，也不致力于直接参与，但与此同时，这危机似乎突然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窥见了一种另类的模式。当不再有实体建筑的工作了，建筑从业者便不得不另谋出路。

不是说从来就没有人认真地思考一种参与模式。在诸多类似的范畴包括建筑、城市规划、空间实践等，危机的出现催生了更多有趣及另类的模式——当一个危机带来重大遗害，它当然也会带来创新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在政治上，更准确地说，在议会民主制中，我们常常能清楚看到人们在编纂一种神话。政治邀请

我们参与，每每会附带着一套清晰的指示，教我们应该怎样参与，换句话说，是给了我们一套操守守则、一套不明文规定。奇怪的是，每当艺术家或批判参与者探讨民主过程和决策的问题，他们往往排除代表制，他们倾向一种非代表制的民主，一种直接的、由下而上的民主 [1971 年约瑟夫·博依斯 (Joseph Beuys) 在德国杜塞尔多夫 (Düsseldorf) 创办的“大众投票为民主组织” (Organization for Democracy through Popular Vote) 就是诸多例子之一]。让所有人一起决定吧！但为什么呢？

或者这是因为参与的纯洁形象太诱惑人了。西蒙·克里奇利批评今天很多思想家采取的呆滞和沉思的态度：“在这个太快把自己炸成碎片的世界，虚无主义者闭上眼睛，把自己变成一座孤岛。”⁴ 似乎我们必须更详细、更广泛地思考我们身处的情况，在这个变幻不定的世界中抵抗虚无主义的引诱。要在实践中达到这种关键的转向，我们需要将道德决策的基础指向辩论：“没有看似成立的动机，即是

没有一个道德的信念，道德思考被降至在标准而正确的框架内无谓的操作：一堆道义论、功利主义及道德伦理。”⁵有趣的是，克里奇利不是说哲学家的工作是制造道德自我，而几乎是相反的：他们应承担 responsibility。正是这种责任及对于所谓负责的定义的再发明，是我最感兴趣的。

在克里奇利的政治观里，真正的民主应该是描绘个人与国家的间隙距离的一种行动，一种“迈进”，一种摩擦：“创造一种间隙距离。”⁶这个框架催生另类和新的政治主体性。克里奇利认为民主化及其进程就是民主本身，或者辩证地形容，那是一个国家的真理，但没有任何国家能完全掌握这真理。民主永远是，而且首要是民主化的进程，这个进程永远不会结束，只能不断地学习及培养。民主永远是当下和变化的。

要达到超越怀旧主义的实践，我们必须打破“要全面民主，所有人都要参与”这种成见。事实上，正如我在本书引言中所讲的，有时我们必须不惜代

价地避免民主。例如展览策划（curatorial）的概念从一开始便是与所谓的“浪漫参与”相反的，因为它是由外或由上而下的决策；它是关于排除和减省的。与其说策展人的工作是决定要展什么，不如说他们是要决定不展什么。

政治正确、经验丰富的参与往往造成反效果，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是错误和罪恶的参与都获得神圣的光环”。⁷ 这种对于社会争议的避免和压制，当然是为了建立和维持社会和谐，但它从不考虑没有争议是否就能让议题或者事务推进。这种情况有时到了一种程度，以至于人们放弃某些想法，仅仅因为害怕被标签为保守派。如果我们考虑这种政治正确性，便会发现它不仅固执于某些价值观，甚至可能使体制更牢固。演员约瑟夫·贝尔比奇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在政治中，最迫切的问题已不是我们是否“容许”丑闻，而是是否可能存在丑闻。⁸ 贝尔比奇所指的丑闻并非指那些产生短暂媒体效应的爆炸性新闻，而是相反：一种以先进、尖锐思想造成

的扰乱，它可以揭穿社会的虚假共识。⁹

当义愤和不统一性无法冲击社会共识，反而被之吞噬，争议辩论也不发生了，冲突的空间也不复存在了。有时，这完全变成了一个丢面子的情况，政客为了保住选票，也不顾自己的立场和信念了。加上民粹式的参与活动，这种天下太平的景象已经出现了好些年，尤其在1997年以来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新工党英国政府¹⁰，他提倡的新中间路线以解决短期和地区问题取代长远的政策目标。

在新工党中庸又简单化的政治中，人们曾经，甚至仍然能看到最棒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如何利用怀旧而生硬的框架，企图以参与将决策责任转嫁到人民身上。正当英国处于公众参与度（即人民参与政治事务和决策的程度）的历史低潮时，偏偏又遍地都是教人民为何和如何参与的宣传。当新工党将一切都变成全民参与，将所有人都变成所谓的“一分子”，人们就开始怀疑这些词语的意思是否真的

像听起来那么纯洁，在其背后到底是什么动机，当我们谈这些时到底又怎样把这些概念浪漫化了。

新工党决定要计算所有的东西，引入最虚假、最不切实际的目标。在工业和公共事务中，这种想法和做法引致目标、定额及计划的泛滥。其初衷是要给予工作者以自由，随便他们用什么方法去达到目标，但这种博弈论失之于没有计算那些“玩家”面对不可能达到的要求时，也是会作弊的。以上这些情节记录在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的纪录片《陷阱》¹¹（*The Trap*）中。在片中，柯蒂斯描述了从左派（以英国为代表）到右派（以美国的新保守派为代表）政客都试图将个人自由定为政治的终极目标。影片探讨了正面和负面的自由，即是“不做什么”的自由和“去做什么”的自由，又展示了布莱尔政府及它维持社会稳定的目标如何产生了自由的反面，它创造的所谓自由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政客提出一个新世界，那儿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主宰自己的生活，在这个奢侈的乌托邦里，社会流动性

是打破古旧的社会阶级的利器。但这个政治难题的答案显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个美好答案，反而制造了一个两难处境：试图制造的自由变成控制管理的抬头，所谓自由选择权不攻自破，社会等级及优越阶层回来了。这些人民票选出来的代表，他们把自己应该提供的“服务”转嫁到人民身上：这是怀旧情怀的一种变体，以自由作为它的掩饰。政客不再尝试改变世界，他们把自己的工作仅仅视为人们想要什么，他们便提供什么。那一度自命为“新”的工党，落入了那个在政治上没有方法又没有计划的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手里，他的政绩完全失控了。他是一个暴躁领袖，无法创造或者推进任何工作。他的视野只望向昨天。

参与就是战争。只要看看大部分的办公室、学院、文化机构，我们便会发现任何一种参与本身都是一种冲突。在战争中，敌我双方都占有自己的领地，可扩展也可被攻陷，而且双方都会有一个代表或者统领，他将会统治，或者屈从，或者崩溃。要

参与到一个情景中，我们就必须意识到这个情景中各种冲突力量的关系。在物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空间向量（spatial vector），这个术语是以比例和方向定义的。一个力场是由每一个向量分子所构成的，但是要加入到这个力场中，明白其中的冲突力量是最为关键的。这样看来，“参与”并非我们一般知道的是指在计划或者过程中的参与，而是有意识的导向、强制进入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领域、系统、语境或实践中。

在维基百科上，参与有两种解释：其一是“一个有广泛含意的词，指大众以各种方式直接参与到政治、经济或管理的决策中”；而其二更为有趣：“参与可指与别人有所共通。”在我要探讨的层面上，第二种解释显得尤其有趣，因为那正是我要反对的。

近年来，除了“参与”一词的膨胀外，同时兴起了一种文化，即由怀旧情怀推动的浪漫参与。这种参与模式涉及地方社群、文化及社会基建、生态和地方政治中的公民力量，它居然被视为减少摩擦

的良方，而这种参与总是发生在过程中，而非在事前的决议时（那才是真正参与起点）。这样的话，问题似乎是：为什么参与总是被认同为基于共识、绝对正面、政治正确又纯洁的呢？这进一步引申出一个问题：即我们是否需要一种参与的另类模式，而这种模式将具有冲突性，它旨在取消善行的浪漫想象，其焦点在于批判性干预。

在《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中，夏洛特·约克 (Charlotte York) 由始至终都看来是四个主角中最纯真的一个。在整套剧集中，她是唯一一位始终奉行约会原则、认真希望结婚生小孩的主角。在第55集，夏洛特决定辞去曼哈顿画廊的策展人工作。她在跟那些不赞成她的决定的朋友解释她为什么想要辞职时，为了隐瞒她“坏”的真实动机（想生孩子和装修家居），她解释说辞职是为了想在医院做义工，为新生儿大楼筹款。当她面试她的继任人时，她说自己是“Lenox Hill 儿科基金会董事之一”。就夏洛特的情况来说，为重要社会事务做义工是一种

自愿的善行，这将避免她因辞职而受到责备。这构成对于参与的错误想象，简直把参与等同于一种“懒人行动主义”，就像人们在脸谱网（Facebook）上发起为尼日利亚投票一样。

这不正是我们在众多社会性实践中看到的情况吗？在以上这种情形和被劫持成正面而且不容置疑的参与之间有着奇妙的相似性，我们也必须小心别把参与混淆成旨在提高生活素质的社会公益或利他行为。

本书不想探讨目标明确的慈善活动，我希望探讨的是权力结构的关系，及如何在不成为权力分子的情况下进入这个权力结构。就如何进入现成的政治力场，看看这些例子是有趣的：艾亚尔·威兹曼在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工作，和艾迪·拉马（Edi Rama）作为地拉那（Tirana）市长的工作。看看另类机构如中东冬季学院的模式，远比看诸如泰特现代博物馆（Tate Modern）等大机构一成不变的公共项目及推广节目要有益，因为后者和在 Facebook

上的“懒人行动主义”一样，只会看着预算做事，甚或跟麦当娜（Madonna）收养一个非洲小孩，其实没多大分别。

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可能在不放弃自我的主动身份的情形下，参与到一个特定情景中，而这个主动的自我并不想跟随共识或行善积德，他希望提出有效的质疑并推动实践往某个方向发展。一个冲突力场的向量分子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参与而不仅仅为了满足眼前的需要和任务。在建筑的传统观点上，即如何不根据慈善条例做社会服务，或跟随社会元型的由下而上式参与，而是通过提出摩擦和问题参与到诸如都市微型政治等情境中。¹²

在建筑界，经常有批判性参与和实际商业利益冲突的例子。在2006年，伦敦建筑师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受雇到纽约从事一个项目。后来，他的客户得知他让一帮“巴勒斯坦公义建筑师及规划师联盟”的建筑师使用他的办公室，罗杰斯便被请到帝国发展企业的办公室（这家公司正在主

理价值 17 亿美元的纽约 Jacob K. Javits 会议中心重建项目，也就是他们聘请罗杰斯的)，他们需要罗杰斯解释关于上述那些建筑师为什么在 2006 年 2 月 2 日使用了他在伦敦的办公室。结果，一些纽约的官员要求将罗杰斯排除在这个公费项目之外。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建筑师如何常常被用作权力结构中的棋子。就权力结构本身来说，建筑师是不能成为参与分子或主事者的，建筑师只能是提供服务、提供产品的人。正如雷姆·库哈斯早前说的：“我认为，人们认为政治冷感是建筑师角色的一部分，特别在美国是这样的。”¹³这正是我希望修补的裂隙。

我们不妨用以下的观念作为想象另类参与方法的入门：我们的责任不是直接的民主参与，而是个人行动，这是化被动为主动而又符合民主原则的个人行动和决策。或许可以说，这正是相反地解读我们需要的正是新工党所推崇的“社会浪漫”民主的相反解读。

注释：

1. 引自 “The Café,” *Seinfeld*, episode 7, season 3, November 6, 1991。
2. Josef Bierbichler, *Verfluchtes Fleisch* (Frankfurt: Verlag der Autoren, 2001), 93,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Der Druck der Verantwortung ist groß, den Demokratie ausübt auf die, die an sie noch glauben, und wird unerträglich, wenn der Glaube hinterfragt wird von der Wirklichkeit der Bilder und dem Zweifel eines Ungläubigen. Es kann nicht sein, was nicht sein darf und die, die Verantwortung mittragen wollen, merken den Betrug nicht mehr, der täglich an ihnen verübt wird von führenden Vertretern der Demokratie. Da prügeln sie den Boten. Besseres kann dem Betrug, zu dem Demokratie von Demokraten gemacht wurde, gar nicht passieren. Man darf doch davon ausgehen, dass es einen Haider gar nicht geben würde, wenn es in Österreich wirklich eine Demokratie gegeben hätte, mit Repräsentanten an der Spitze, die sich ihren Grundlagen unterworfen hätten.”
3. Josef Bierbichler, *Verfluchtes Fleisch*, op. cit., 9.
4. Simon Critchley, *Indefinitely Demanding: Ethics of Commitment, Politics of Resistance* (London: Verso, 2007).
5. Simon Critchley, *Indefinitely Demanding: Ethics of Commitment, Politics of Resistance*, op. cit., 9.
6. 同上，13页。
7. Harald Martenstein in *Zeichen 4: Engagement und Skandal*, eds. Josef Bierbichler, Christoph Schlingensiefel, and Harald Martenstein (Berlin: Alexander Verlag, 1998), 28.
8. 同上，9页。
9. 同上，13页。
10. 新工党是1994年工党铸造出的一个新标签，被通用来区分工党中的现代派和那些传统立场的成员。
11. Adam Curtis, *The Trap: What Happened to Our Dream of Freedom* (BBC documentary), first aired on March 11, 2007.
12. 根据英国的城乡规划法第106款（1990年），本地规划部门（local

planning authority, LPA) 在批准土地拥有者发展土地时, 双方必须订立法律协议或规划义务, 其义务即在第 106 款中订明。这些协议有助确保土地发展时必须包含基本的规划, 因此更多公共服务及基建, 例如高速公路、康乐设施、教育、医疗及廉价房屋等得以建成。这些协议普遍有助于公共事务。

13. Rem Koolhaas, interview by Markus Miessen, "Rem Koolhaas with Markus Miessen," *Bidoun*, issue 8 (Fall 2006), 41-49.

第三章 宏大叙事——后毕尔巴鄂生活 (幕间节目)

最终置城市规划于死地的，倒不是如此多人犯了如此多无可救药的错误，而是因为如此少的程序和运作实际是可以按计划进行的，而计划却是城市规划师的经典产品。¹

——雷姆·库哈斯

有一种稍稍有点离谱的想法，认为建筑实践能影响社会。这种想法的理由是“建筑师”的教育形成了一套结合科技、艺术和社会元素的无所不包的论述——于是它也解释了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观点：建筑师“可能是硕果仅存的人文主义者”。²

——U.P.W. 奈高（U.P.W. Nagel）

对那些不被这么感伤地加以描绘的人物来说，疾病被看做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终行善的机会。至少，疾病的不幸能够擦亮人的眼睛，使他看清一生中的种种自欺和人格的失败。伊凡·伊里奇（Ivan Ilyich）用谎言来掩盖他的痾病——他患了癌症，却对妻儿只字不提——而这些谎言使他意识到他整个的一生无非是一个大谎；在他弥留之际，平生第一次，他变得诚实了。³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观众就坐。帷幕后深处传来一个声音说：让我们开始，假设在毕尔巴鄂（Bilbao）之后，生活还继续下去。

第一幕 亚里士多德来到大都会

斯多葛主义（Stoicism）的基础是宇宙的互连性，

万事万物都遵守着一套绝对法则。从这套法则中，人类寻找活着必须的理性和道德观。斯多葛主义的实用伦理学推崇自律、乐天知足、与自然和谐共处。斯多葛主义假设人生活于动荡的政治中，人需要以坚持和尚德为本，以中庸的生活方式达致恒久和稳定。根据这种观念，内心平静之道在于弃绝力所不达的欲望，活在当下，且对未来既不抱希望也不感畏惧。

但等等，难道不就是这样一种欲望，驱使我们对现状作反思分析，并投影出一个“更好”的未来吗？当我们检讨当代建筑，我们应该将实践者放置在更大的文化政治背景中。

第二幕 习惯的生物—*tamquam truncus stat*⁴

纵观历史，很多知识分子沦为了权力的奴隶，只有少数人尝试用他们相对的特权去协助其他人，去瓦解不合理的体制和做法。用最简单的方式看，

斯多葛主义教导人们去寻找世界的趋向并且乐于跟随，这马上就触及一个基础问题：如果人相信一切从一开始便都是对的，他的生活又怎么可能有道德责任？自我感觉良好，筑起堡垒拒绝外面的世界，不提疑问不求变革——人会逃避一些可能重要之事，只为了继续因循守旧地生活。为什么人会故意逃避现实？我们是否还固执于一些已经没有意义的东西？

第三幕 破除建筑诸神的神话

在形式实验主导的建筑实践中，也有一种差不多那么顽固的“自我感觉良好”，这种倾向令实践在平庸中结茧自缚，只是当我们将它放在更大的景观中，就会发现它根本毫无意义。几十年来，建筑实践大都只讨论形式问题，所以这种实践就关心怎样创造物理外壳，只会自我迷恋，对于参与到社会政治环境中毫无兴趣。现在，即使是那些最传统的

建筑理念的代表——那些只对纯粹的建筑形式感兴趣的建筑师——都开始认为“今天，人们通过各种非物质空间的媒介沟通，建筑师的责任是建造让人与人可以实在、直接地沟通的真实空间”。⁶然而，事实证明，说易行难。

第四幕 超越宏大叙事逻辑

斯多葛主义主张去绝冲突。相反的观点认为，冲突摩擦、另类逻辑思考、来自其他专业范畴的影响，这些都经常能引发最创新的意念和理论。人不能、也不应在道德孤立中工作，即不能把自己困在一种专业范畴中。我们可以注意到，建筑师普遍习惯认为他的工作是不断致力改善人类生活的环境。那么，与其套用一成不变的、约定俗成的道德教条，建筑师更应该经常反思真正尊重人性的实践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正如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刻，我们无法预计世界在走向何方，我们只感觉它在走，

走得愈来愈快。这时，那些胸怀狭窄、目光短浅的斗士呼喊：“世界失落了。”在绝望中，我们抓住过去不放，就像沉船的水手拼命抓住船的残骸那样。20世纪建筑师的生活方式是紧随建筑史的宏大叙事，沿着前辈作品的步伐，崇拜经典建筑物，将它们视为改变的泉源。‘奇怪的是，当建筑师还是这样做时，人们却已明确地认识到，构成城市状况的不是建筑师的形式及美学，而是一些更重要的力量：“大多数城市理论的贫乏可以归纳为一个核心谬论，即城市或都会完全是一个物理形式，而作为一件绝对具体之对象，人们可以分析和干预它。然而城市根本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不断重组，不断运动中的力场，每个城市都是其独特历史形态的多变组合。”⁷

一般认为，当代建筑形式取决于现代建筑材料和手法。有些人视建筑为一个时代的典型精神的产物，只有当人类精神完成了一个阶段的演进时，才会出现一种新形式、新风格的建筑。今天的实践不

应是简单地重新演绎建筑的物理过程，它更应试图反映一些新的原型，其出发点是反映如何超越单一真理，甚至超越自身的真理，是一种扩展空间而非界定空间的激进性：一种新式的建筑次文化产生新的空间理念，拒斥将建筑等同于建筑物——一件实体——的传统理解。这些原型会质疑今天社会的习性和建制，抗议建筑物和建筑师那僵化的道德幻觉。与几个世纪以来大量不顾一切、粗制滥造出来的自我参照建筑物（self-referential object）*相反，近年的一些合作项目和小组试图在工作过程中加入不确定性，他们认识到城市这个最无法规划的对象正是由各种不确定性所构成的。

这重大的转变——由自我参照物过渡到所谓的“关系实践”⁸——呈现给我们一种理解世界的新方法：它因事制宜，不盲从死板的道德定理。世界不需要“抓住船的残骸”，世界需要的是一种乐观精神，

* 指那些只关注外貌形式，不考虑社会政治状况的建筑设计。——译注

它需要对情景现实的深切理解分析，而不是陈腔滥调的道德真理。

第五幕 斯多葛主义与空间—*ad rem publicam accedere*⁹

思想家暗自想到：“什么？压在柜子下的人？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在那里？”不重要，反正他们就在那里。而如果有某人前来，以最客观的名义证明这个柜子移不开。他说的每个字都加重了这个柜子，那个他企图用他的“客观意识”的普世性去形容的物件。它还体现了整个基督教精神，人们像忠诚的狗，一边沐浴在爱之中一边受苦，还到处派发那伤重了但还在笑的男人的照片。“那柜子的理性永远是最好的。”每天新出版然后塞到那柜子里面的几千本书都这样说。柜子下的人每一刻都想呼吸，但是没有人可以，很多人说：“我们迟点才呼

吸。而他们大部分人都不会死去，因为他们早就死了。”¹⁰

如果我们将斯多葛主义引用到空间政治中，便会发现斯多葛主义者只会照顾自己的房子。对于他们来说，“里”和“外”的分野是非常明确的。从罗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i）的一本关于市集哲学的书《向拉斯维加斯学习》（*Learning from Las Vegas*）¹¹中的城市-斯多葛观点，到哥连·罗维¹²（Colin Rowe）的城市-怀旧解读法，人们最感兴趣的潜问题似乎都是环境景观如何影响对话（字面意义上的和比喻的）。谈到斯多葛哲学对空间的影响，则必须先分清楚“建筑中的斯多葛策略”（*stoic strategies in architecture*）和“斯多葛建筑”（*Stoic architecture*）：并没有一种造型意义上的“斯多葛建筑”，它指的是一种框架，其中人们的做事方式可能是“斯多葛式”的。虽然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与四周环境毫无关系的建筑，但要将（斯多葛主义

的)纯粹哲学概念与建筑物的物质、美学意义彻底配对起来,那还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无法说清楚一个斯多葛空间(作为一种伦理空间)是否存在。在当代的政治和空间领域中,宏大叙事已不复成立。再者,有观点认为,人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尝试以物理空间去勾画伦理空间,因为无论在哲学论述还是在意识形态的论述中,伦理空间从来都只能在理论架构中发生作用。

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近年出现了一种认真的社会政治空间实验,试图将各种空间情景理解成一些本土微环境,这些实践意识到在空间背后有一些法则或机制。而最要紧的是,我们应该意识到传统甚至保守的建筑实践[认为建筑是一个“被控制的空间”¹³(a controlled space)]与一些当代建筑实践的差异——当代建筑师对开放而可变的机制更感兴趣,他们设计的系统针对特定环境的特殊组织结构:“空间总是由很多小空间组成的:相对的空间、并存的空间、互为相关的空间。空间受主体与客体,

即人与建筑环境的关系所影响。这些关系及其直接影响构成我们所谓的社会空间结构。它们受主流的力量影响，却也受边缘性和异议左右。换言之，空间是彻底政治性的。”¹⁴

第六幕 回归不明确性—*cabente disciplina*¹⁵

传统的斯多葛哲学家认为，围绕着我们的是一个无法控制的世界，而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只能自求一种尚德、自省的生活；当代人同样认为世界是无法控制的，但面对这个世界，堂而皇之的现代主义工具是没有用的。以上两者的根本分别在于，在当代，世界的无法控制是一种优点。今天，在这些（功能和定义都）不明确的空间中，日常微妙的活动会演变成一些自我组织的架构。当我们想到一个人性化的空间可以做到什么或者不可以做到什么时，便发现在这些不明确的空间里，已经开始发生一些细小而自发的改变。

然而可能有人反对这种观点：对这种实践的追求，就是在转译一种以个人专业知识去应对和创造变革的欲望。今天，似乎人们不再着眼于世界的形象，他们不再沿着传统的方法，不再用物质规范、形象和景观来界定空间。¹⁶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新式建筑理念，这种理念不关注实物，它关注改变，一种以时间和批判性观念引发的转变；换言之，这种理念的兴趣不在于物理构成，而在于过程。人们不再热衷于如何将一片空地发展成一个定位清晰的场地，因为这种野心预定了未来的最终成果：一个根据图像设计而建成的完美、完整的城市。一些当代人将城市视为日常环境和建筑的活动场，城市会对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的干预作出回应。这种概念超过了物理城市作为兴衰的不断循环的简单想法，它鼓吹一种不同的城市实践：实际理解而推崇改变。这是一种积极的当代哲学，与劝诫人们弃绝欲望的斯多葛主义或佛教哲学恰恰相反。

第七幕 诸神失明了

借用古老的透视法，我们便能理解各种建筑实践之间的差异：我们用透视法便能理解一个传统建筑中构建的空间，但用同样方法却无法理解某些当代建筑项目。其部分原因是因为透视法可以客观再现一个空间，让人们不用进入这个空间也能理解它的轮廓和基本功能；但它不适用于一些新项目，因为这些新项目的重点不在于改造物理空间，而在于设计空间的运作。再者，许多近年的项目不会使用透视法表达，因为这些项目的重点不在于视觉的表达。

传统的建筑师梦想建造，为人们勾勒代表光辉未来的新世界。当各个领域的精英走到最前线，打一场对抗旧社会的仗时，建筑师就负责指导和设计属于明日的景观。他背后有一种对进步由衷的信仰，但建筑师的欲望也揭露出一种扭曲的隐秘快感：在建造欲望的背后是权力欲望。他们试图推广梦想中

那些代表进步的容器，他们尽情享受社会给予他们的权力，他们的社会地位得到认可，让他们可以掩饰他们的快感。伦理也帮了他们一把：建筑师常常自认为有一种正面的能量，他们的工作让世界进步。无论这种道德理想是带着恩赐的、讽刺的、武断的、愤世嫉俗的或者随便什么态度去说，它始终巩固了建筑师的合法性。

当大部分的传统建筑项目都比较重视建筑物的外观¹⁷，具有政治意识的新一代建筑师却更关心建筑物内部的体验，这个内部不仅仅是指空间的内部，还指建筑物中的各种应用体系的内部。这种体验上的差别，同样指向造型方法的差别：传统建筑固守一种“自我”的文化，追求建筑师的个人风格，而当代建筑师却拒绝自我参照，不愿意与地方和文化脱轨。虽然历史上也有几个根据现场情景而实践的时刻¹⁸，当下的这种次文化似乎在涉猎一个建筑界从未探索的领域。这种新式实践并不讲求新科技，也有别于现代主义推崇的普世景观；它不想“殖

民”一个地方,而将焦点从建筑实体转移到对社会、政治及空间环境的整体阅读,其中各种规模的改变机制都可能发生,这也说明了建筑符号和语言的传统位置和性质正在改变——这种内部演进最终会改变人在等式中的位置。其实在某程度上,在某些较早的论述中,已有关于建筑的美学阅读与外部世界的影响的对比,其中上述的演进已显得很清晰。文丘里的波普-城市主义指出,观看城市应该着重于实际活动而非美学阅读,这种理念可能是库哈斯的城市设计策略的早期参照,因为他的设计策略就是紧随金钱的流向。然而,这些概念仅仅是一些项目的姿态和性质,大部分时间它们仅仅停留在议论的层面。

第八幕 神圣本来就是幻觉

虽然某些意识形态背景可追溯到《冬宴》¹⁹ (*Potlatch*) 的第一期——这个意念的实验室创造了情

境国际²⁰的一些主要概念——今天，由于一些概念被落实到实践中，整个论述已变得不一样了。除了康斯坦特²¹（Constant Nieuwenhuys）是一个早期的例外，这个论述至今从未长期发展开来。根据一套通过牺牲和过剩的经济交换理论，人类学者和乌托邦主义者对“通过礼仪和节庆破损而提升地位”²²感兴趣；而今天的空间实践不单借用城市社会中的实验性行为，也引入了各种物理和非物理的结构以改变和调节空间的设定。今天的空间实践表现出实验技术、分析思维的应用以及对日常情况和物质环境的转化。它造成的改变看似细微，其影响却是实在的。由此可见，我们也应该重新思考学院是怎样陈述今天的建筑实践的。如果我们假设纯粹造型的论述已不复存在，我们还是发现很多表面上是现象学式的、社会性、政治性的学院工作室，其实还是因循着过往：学院派只想在他们最熟识的论述中打转。

在《环境斯多葛主义和地方阳刚性》²³（*Environmental Stoicism and Place Machismo*）一文中，

迈克尔·本尼迪克（Michael Benedikt）形容有一种“对廉价的、边缘的、令人沮丧的、令人觉得有失身份的、平庸的、不舒服的、局限的、被人彻底弃绝的空间的忍受或视而不见”，在他的建筑词汇中这就是“环境斯多葛主义”。²⁴ 本尼迪克说：“斯多葛主义建议我们逆来顺受，而男子气概（是一种态度多于一种哲学）提出勇于接纳艰难环境的一种荣耀。”²⁵ 他就这两种观点的比较是合理的，可惜他提到的范例与现存实践正好相反：现存实践讲究情景特点，并以全盘方式去处理微观政治。虽然本尼迪克也补充说“环境斯多葛主义在建筑师之间没有在一般大众之间那么普遍”²⁶，他却不知道的确存在与他形容的有所不同的项目实践。他形容的范例的基础是，建筑师必须学习如何改善一个建筑环境；这样的范例（至少在建筑界）居然是从未被提出过的。除了非常近期的理论著作，如玛格丽特·克劳福德（Margaret Crawford）的《日常城市》²⁷（*Everyday Urbanism*）或乔纳森·希尔（Jonathan Hill）的《非

法建筑师》^{2R} (*The Illegal Architect*) 等勇于批评当下建筑的著作之外，我们勾勒出现象，今天才是第一次被用于空间，即物理的层面上：投射性而非反应性的。所以它没有先例可参考，历史上根本没有任何建筑或城市项目尝试过处理这些问题。只有在当代对空间一种政治化的热忱中，人们才有可能讨论空间冲突中的社会政治空间，并带着一种务实而乐观的精神，一种期待机遇的好奇心，而不是一套悲观的理论。这种乐观精神是本书的潜在要旨，它受到诸位所见略同的实践者所鼓舞。他们是艾亚尔·威兹曼、约翰·柏美辛奴 (John Palmesino)、席琳·康多拉莉 (Celine Condorelli)、文奴·赫斯 (Manuel Herz)、尼古拉斯·希尔施 (Nikolaus Hirsch)、菲利普·米塞尔维茨 (Philipp Misselwitz)、耶斯科·费萨 (Jesko Fezer)、萨宾·贝特、巴萨姆·艾·巴朗尼 (Bassam El Baroni)、泰迪·克鲁兹 (Teddy Cruz)、沙迪恩·祖凡诺维奇·韦斯 (Srdjan Jovanovic Weiss) 及凯勒·埃斯特林等。

第九幕 谁说诸神勇敢？

自古以来，建筑师都被塑造成一位雄伟的男主角，他把一种完善的生活方式介绍给世界，他“热爱新事物，开放，宽容，富有同情心……然而，建筑师却很少透露他们的工作目标和各种尝试，很少在公众中找到一位准备好（理解他的作品）的观众”。²⁹ 就在这时，人们看到实践的一个转折点：放弃自我中心的论述和自我参照的野心，从而因事制宜地工作。这种利他的理念恰恰是自我中心个人主义的相反。它提出一个基础问题，即建筑应该定性为“一个人做而且只为个人而做的艺术，还是一种满足市场需要和创造利润的商业企划，还是一种为社会服务的公益行动？”³⁰ 无一正确。有趣的是，今天的建筑兼有以上各种成分，根本就分不清，只能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应用不同的机制。建筑师极尽浪漫的理想——“以个人的概念带动建筑进步，经常创造新的风格，由建筑师到建筑师将历史传承下

去。”³¹——这些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想主义早已不再成立了。

丹尼丝·莱莉 (Denise Riley) 在《我只想要回我本来的》³² (*What I Want Back is what I was*) 一文中介绍了她对皮埃尔·艾多 (Pierre Hadot) 的《哲学作为生活方式》³³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一书的独特见解。她认为艾多对于福柯 (Foucault) 的“自我的文化” (The culture of the self)* 的理解 (一种作为存在美学的道德模型), 有变成“出世的精致的自我修行”的危机; 而斯多葛主义认为“自我”没有必要那么的“孤芳自赏, 也可以在公共生活中追求”。³⁴ 现在, 这种说法似乎成立了, 除非当这个追求自我的人关心到形象, 一种从外部的审视, 而这一点最能解释那些只讲究外观的建筑。今天, 我们应该能分辨到两种不同的建筑: 一种是形象主导的

* 或者称之为“自我的培养”和“自我的实践”, 简单来说是指将哲学思考作为一种技艺、风格或生活方式, 而非仅仅是纯粹理论论述。——译注

建筑，而另一种或可称之为“后毕尔巴鄂建筑”。³⁵建筑事业所估计的权力、属性、目的等往往与现实相抵触。我们还发现，维特鲁威（Vitruvian）* 提出的建筑原则——有用（*utilitas*）、美观（*venustas*）、持久（*firmitas*）——愈来愈不足以解释今天的实践。可以说，新兴的实践最有趣之处是人们如此的不重视外貌形象，形象不再是构成自我的必要成分。

第十幕 毕尔巴鄂之塔—*salva res est*³⁶

由关注造型的建筑师转向关注特殊实践的建筑师，这种转变大概开始于弗兰克·盖瑞（Frank Gehry）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汉姆美术馆（Guggenheim Museum）在1997年开幕之时。作为20世纪末的超级明星建筑师³⁷，盖瑞是一代人的缩影：开始以前卫自居，最后变得自炫博学却因循守旧。我们可

* 古罗马的作家、建筑师和工程师，第一位建筑理论家。——译注

说在毕尔巴鄂塔建成之时，新一代建筑师开始积极寻回 20 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所缺少的东西，针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超级现代主义³⁸都避而不谈的问题：“现代主义不明白将符号抽离城市的灾难性结果。如果你将公园、市场、大街的类型特征拿走了，那么人们便无法明白这些地方作为社会互动场所的角色。它们仅仅变成一种机械式的存在……问题的答案很野蛮，只有‘是’或‘否’，没有任何不明确的空间。这些‘新项目’的力量往往在于它们力求改正各种典型情况的问题。”³⁹新建筑师不搞形象工程，不像明星建筑师那样走红地毯，不再讲什么什么“主义”。尽管你可以说一个“反形象”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定位，所以也是一种形象，但其实关键的是建筑师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称呼自己，怎样描述自己的实践。突然之间，边缘的地带变得有趣而重要。近十年来，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故意而业余的（这是一种最正面的业余）过度专门化，好比说建筑和空间生产中所有方面都需要一位特别的

专家来做，以至“建筑师”不再是一位无所不懂的大师。随着这种改变，我们听过很多新的职称，如“空间顾问”、“城市研究员”、“建筑策划人”、“空间策略师”、“框架设计师”，而因为无人知道这些职称到底是指什么，他们似乎还玩得挺成功。

丢掉了 20 世纪的包袱，最近的实践重新发现本土，相信某些问题需要特别设计的方案，而不是靠伟大的哲学论述来解答。这种信念来自所谓世界的“真实地理学”（real geography），它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演化而出现的。这种针对问题的方案设计，抛开了建筑作为“风格化对象”的理念。今天，如果你在西岸或者加沙等地进行一个项目，那么你很可能在项目中考虑到当地的各种政治、文化因素。20 世纪晚期的“图表”（diagram）建筑项目纯粹是现代主义的，因为它们企图给出一个几乎是科学的解决方案，而对其他所有事情一概不考虑。后毕尔巴鄂时代出现了一种论述，即认同空间的政治意义是急需要处理的。再没有对斯多葛、自我参照

或图表的自读意识有任何同情，因为在 9·11 之后，大家都意识到整个世界都在焚烧，但布什政府的政治思想却更走向图表，提出更没有变通的方法，完全没有顾及未来。

“图表”跟历史上很多理论和实践一样，是一种斯多葛的茧。它不单是一种潮流，它将建筑师描述成一位圣人，一位不能失败的大师。它承担着一个英雄的传统，图表——它的现代主义意味，它对于建筑师是无懈可击的大师的陈旧梦想——仅仅是一种概念，而本文提到的反斯多葛实践则截然不同。新的实践首先意识到建筑师是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在一个与现代时期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工作，我们的系统关注临时性、偶然性、非正式、短暂，拒绝单纯的实体。

第十一幕 形式主义被打败了

在这个幕间节目之初，我们假设在毕尔巴鄂之

后生活还继续着，而的确是这样的。在《我为何写作》⁴⁰（*Why I Write*）一文中，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出一个作家应该充满荣耀地工作。奥威尔将作家的生活气氛分成四种：纯粹的自我主义、美学热情、历史推动力和政治动因。⁴¹ 由于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的，这些氛围在很多作家和建筑师的职业生涯中都能够看到。我们走到了空间实践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个分叉路，有远大视野的人将会抛弃个人主义的野心。在一种乐观精神之中，我们也应该去积极参与，迈向一个由人和空间一起构成的社会。

上文已经指出，斯多葛主义的绝对原则构成一种特定的思考方式，一种身处动荡政治社会中的生活方法。今天，我们在一个奢侈的位置，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道德信念，尝试去改变一些事情。人们不再因为希望名留青史而追求革新。我们活在当下，对未来既有希望又有恐惧。与其埋怨旧时的流逝，或者奢望一个普世的道德框架，不如勇敢走出去面

对漫天风雪。知道真相的一刻必然是悲壮的，在这一刻斯多葛主义者也终于走到了稳定和谐的虚无主义的尽头。

“表演结束了。观众纷纷离开。是取回大衣回家去的时候了。他们转身……再没有大衣，再没有家。”⁴²

注释：

1. 雷姆·库哈斯接受 Alejandro Zaera 的访问，“Finding Freedoms: Conversations with Rem Koolhaas”，刊于 *OMA/ Rem Koolhaas 1987-1998*, Madrid: El Croquis, 1999, 30 页。
2. U.P.W. Nagel, “U wie Universität”，刊于 *Von A bis Z, 26 Essays zu Grundbegriffen der Architektur*, Maria Hohmann and Stefan Rettich 编，Cologn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 2004, 127 页。根据本书作者英译译出。
3.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40 页。——译注
4. 拉丁文，作者英译为：“他，不动的体系。”（He, the immovable institution.）
5. 妹岛和世，“Face to Face”，刊于 *HUNCH, Berlage Institute Report #6/7* [109 Provisional Attempts to Address Six Simple and Hard Questions About What Architects Do Today and Where Their Profession Might Go Tomorrow], Jennifer Sigler 编，(Rotterdam: episode publishers, 2003) 407 页。
6. 请勿将经典建筑物（classical architectural object）与古典建筑（Classical architecture）混淆，前者指的是物理形式的建筑设计。
7. Sanford Kwinter, Daniela Fabricius, “Urbanism: An Archivist's Art?” in

Mutations, eds. Rem Koolhaas, Stefano Boeri, Sanford Kwinter, Nadia Tazi, and Hans Ulrich Obrist (Barcelona: Actar, 2001), 495.

8. 见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关系美学》, Dijon: Les presses du réel, 1998.

9. 拉丁文,作者的英译为“转向政治”(Turning towards the political)。

10. Raoul Vaneigem,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 Rebel Press, 1983), 51 页。

11. Robert Venturi, Steven Izenour, Denise Scott Brown, ed.,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77).

12. Colin Rowe, Fred Koetter, *Collage C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4).

13. 这里说的“控制”不一定是指这个字的当代意思(即闭路电视、围墙铁闸等),而是一种企图控制活动、时空关系等的物理操作。

14. An Architektur, “R wie Raum,” 刊于 *Von A bis Z, 26 Essays zu Grundbegriffen der Architektur*, Maria Hohmann and Stefan Rettich 编, Cologn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 2004, 110-111 页。根据本书作者英译译出。

15. 拉丁文,作者译为“当古代秩序开始崩溃”(When the ancient order started to crumble)。

16. 例如,在景观中的自我参照建筑物。

17. 例如形式外观、规划安排、空间质量、物质性、景观线、灯光调动,等等。

18. 艺术家如 Robert Smithson、Dan Graham 及 Gordon Matta-Clark 等;建筑师如 Alison and Peter Smithson、Cedric Price, 等等。

19. 《法国字母主义国际的信息报》,1954 年创刊。

20. 一个非艺术小组,在几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使他们联合起来的共同理念是艺术的终结或缺席,和一种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艺术制作的波希米亚精神。关键词“情境”是基于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存在主义,与其中论及的关注和责任有关;他的“情境”形容一种在特定环境中的自我的存在意识。也参看德博的“Repor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ituations and on the Terms of Organization and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ist Tendency” , in Guy Debord and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Texts and Documents, ed. Tom McDonough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2), 44.

21. 康斯坦特本是一位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在 1947 年成为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一员，后来又加入了 CoBrAn 小组。

22. Simon Ford,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A User's Guide* (London: Black Dog Publishing, 2005), 33 页。

23. Michael Benedikt, “Environmental Stoicism and Place Machismo—A Polemic,” , no. 16 (Winter/Spring 2002).

24. 同上。

25. 同上。

26. 同上。

27. John Chase, Margaret Crawford, and John Kaliski, eds., *Everyday Urbanism*(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1999).

28. Jonathan Hill, *The Illegal Architect* (London: Black Dog Publishing, 1998).

29. Andrew Saint, *The Image of the Architec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 页。

30. 同上，6 页。

31. 同上。

32. Pierre Hadot,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ed. Arnold I. Davidson, Oxford: Blackwell, 1995.

33. Denise Riley, “What I Want Back Is What I Was,” *Diacritics*, no. 1, vol. 32 (Spring 2002), 57 页。

34. 同上。

35. 明星建筑师的作品。

36. 拉丁文，作者译为“暂时，一切还好”（For now, everything is still fine.）。

37. 其他人物包括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雷姆·库哈斯、蓝天组（Coop Himmelblau）及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他们开始时都自

认为前卫派，但其实都跟随建筑大师的传统，尽用各种方法制造他们的大师形象。

38. 超级现代主义是汉斯·伊贝林斯（Hans Ibelings）提出的词；他用之以辩护与地方环境毫无关系的城市建筑，认为世界可以是一个更干净、简单的空间。他视近来的建筑发展，是全球、中性、非表现性的艺术和交流的转向的病征。见：Hans Ibelings, *Supermodernism: Architec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sation*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1998).

39. Kieran Long, "MUF: Children Dressed up as Horses Take on the Modernists," *ICON*, no. 22 (April 2005).

40. George Orwell, *Why I Writ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41. 同上，4-5页。

42. 瓦讷格姆 (Raoul Vaneigem),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 Rebel Press, 1983), 176页。这里瓦讷格姆引用了洛札诺夫 (Vasilij Vasil'e Rozanov) 对虚无主义的定义。

第四章 共识的泥潭

我们从一个好消息开始吧：我们需要共识。共识不是总是有问题的，反而经常是必需的。没有它，没多少事能做好。但是，当人们普遍认为冲突模式会引起社会分化时，其实恰恰是共识模式在制造这种分化，它的分化是由集体被动性造成的。讽刺的是，冲突模式也可以被理解为更为主动的和参与性的模式。共识通常等于减少互动。没有互动便意味着停滞不前。如果我们不再你来我往地辩论，那么我们便先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但纵观之下，无论在国家政治、私人公司的重大决策，非政府机构的项目，或者艺术世界的很多委托项目，各个单位都过分急于达到一种共识模式。

与荷兰的浮地模式相似，瑞士的共识民主模式

令国家日常行政进行得非常顺畅。但是，当国家需要作一些复杂而重大的决策时，这种模式便行不通了。以共识为国家的核心，即告诉我们所有事情都会以务实处理。直接民主制是否毋庸置疑？有共识之处，就不必思考或批评。但我们应该质问民粹主义者，或社会上的大多数，他们是否对每一件事——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有起码的热诚？似乎愈来愈有必要重新介绍对所谓“大政治”的信念，一种比得过且过要求更多的信念。

如果我们还记得新工党的例子，便不难意识到那种投机性的参与其实暗藏共识。这样看来，各个分子都很清楚，等式也很简单：参与 - 共识 = 操作，而参与也无非是一种符号姿态。政客（特别是右派）经常借媒体的力量，用危言耸听影响公众投票。我们不能，也不应将民主概念解读为：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所有的范畴、专业和实践。仅仅将民主当成能政治正确地解决问题的最终工具，这似乎是危险的。不是所有议题、所有事务都应该以公众投票作表决。

曾经受所有人欢迎的政党，将所有非暴力对抗冲突的可能性都抚平了。但似乎，自从 21 世纪初，这些政党愈来愈失人心，正是因为他们不再能带动社会和政治的团结，又处理不好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沟通。再者，就连“政党”这个概念本身都失去了人们的支持和信心，因为人们愈来愈不认同政党，愈来愈不愿意通过政党来参与政治了。'

没有人的内心是完全民主的，而民主的概念也依靠、基于一种虚构的宏大叙事，即每个人都有权投票，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影响力。然而，要真的实践纯粹的民主概念，而不是停滞不前地为民主而民主，必须有两个条件：既要有合理数量的持份者（stakeholders），使制度保持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又不能受外力如传媒的影响。

谈到以共识作为国家决策的核心概念，就不能不提荷兰版本的托尼·布莱尔简化政治概念（又名，建制的死亡之吻）：浮地模式。这个词最初形容的是荷兰经济的共识政策，但现在已用于更大的范围，泛

指非冲突性的全国辩论。人们说这种模式是“一种务实的多元性”，或“求同存异”，诸如此类。据说这种决策风格在荷兰这么成功，是因为荷兰大部分领土都是低于海平线的低洼地，如堤岸、填海地、泛滥平原或沼泽。中世纪以来，在同一片低洼地上的敌对或竞争的城市被迫放下歧见，合力防止整片洼地被淹没。

所以，这种共识生产的概念在荷兰社会中根深蒂固，以致它被广泛应用至人、事和特殊决策上；或者情况就像一次在史基浦（Schiphol）到阿梅尔勒（Almere）的火车上，有人告诉我：“你一把头伸出来，便会被人砍下来——别出格，这已经够疯狂了。”现在出现一种潮流，荷兰的商人和政客会专门到伦敦上一些课程，重新学习如何说不同意。这种共识模式甚至渗入荷兰的流行文化中，那里流行“BNer”² [beroemde Nederlanders（著名的荷兰人）]，指的是那些在媒体上获得名气的人，但他们有名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特别之处，仅仅是因为所有人都同意他们。

“如果你不想有敌人，那你就最好当个税务顾问、药剂师或者助产士。”³ 这说法是对的。谈到民主，“民主的憎恨”（Hatred of Democracy）——正如朗西埃指出——肯定不是新事。⁴ 朗西埃说，在古希腊，“民主”一词是用来表达憎恨的：这是一种侮辱，形容那些因没有坚守的原则而导致秩序破败的国家。他继续说，伴随着这种民主的憎恨，历史见证了对民主的各种批评，这种批评承认某事的存在，但也指出它的界限。

于是，民主形成一个两难的局面，这可以简单地说明：或者，民主生活意味着很多人参与讨论公众事务，这是一件坏事；或者，代表一种社会生活，当人们的力量全放在满足个人的愿望上，这也是坏事。所以，要履行一种好的民主，政府和社会生活必须能控制民主生活中固有的两个走向，即集体活动和个人抽离。⁵

朗西埃形容民主既非一种宪法，也不是一种社会形式，而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只属于那些没有权力管治而只能顺从的人们：“人民的力量不来自人民的聚集，不来自主流。”⁶他明白一个民主社会从来无非是一个想象的画面，其作用是维持一个好政府的各种原则：但“人们喜欢将问题简化为直接民主和代表制民主之争”。⁷

正是在这时，出现了自发的参与；不请自来的局外人（这一点我稍后详述）加入了。这种朗西埃所形容的经常两极化的情况，这种直接民主与代表制民主的对立，需要转化为一种超越书面协议的建议性关系，变成一种平行情况，其中冲突和摩擦创造了条件，让墨菲说的“对手”（adversary）关系出现。似乎共识是很多参与性项目的问题症结所在，而且在批评界中也可能一样。在本书第六章中，墨菲提出对于民主原则的共识当然是必要的，但也需要关于这些原则的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不同意见。换言之，人们一定要反思默认的观点。在大部分的艺术评论

中，大家似乎都协议好不解读作品，这绝对无助于推进艺术的发展。

在建筑界，我们可以听到一种共识何以必要的解释，这种解释不单非常无建设性，还有一种田园牧歌的味道：人们一般觉得在建筑项目中很少有议论的空间，行业以外的人尤其如此认为。建筑师被视为服务提供者，他们应该应客户要求，照着本旨办事，不能超出服务行业的共识。与被认为是自主的艺术家相比，建筑师却总是被困于此，就好像建筑师只能在一种既定的范畴中，为这个范畴而工作，而这往往意味着停滞。

曾经现代主义给各种专业定了明确的角色，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是，不同范畴无法明确区分，不再有稳定的领域；而问题是，如何以最具批判效用的方法去把握这个不明确性的场域？

所以，面前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将民主的方式、一种关于能力和投入的“大政治”，套用到一个系统、

网络或特定框架中？如何构建一个框架，让我们可以不断打破僵化？

注释：

1. 见 Franz Walter, *Im Herbst der Volksparteien? Eine kleine Geschichte von Aufstieg und Rückgang politischer Massenintegration*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09)。
2. 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lder_Model。
3. Marcel Reich-Ranicki, interview by Elke Heidenreich, *Wozu Lesen?* (audiobook), Zurich: Kein&Aber, 2005.
4. Jacques Rancière, *Hatred of Democracy* (London: Verso, 2006).
5. 同上，8 页。
6. 同上，47 页。
7. 同上，52 页。

第五章 合作与冲突

社会阶级身份和两极化冲突的消失，使传统政治不再有效。共识终于被尊奉为社会体制的基础，而缺乏任何合理的另类方式，又使这种共识不被置疑。¹

——查特尔·墨菲

与合作（cooperation）相比，协力（collaboration）的原因是复杂的现实，而非对于共同处境和共同性的浪漫想象。这是一个矛盾的过程，由互相影响的各个参与者之间一系列矛盾的关系所构成。²

——弗洛瑞安·施耐德

怜悯被过分低估。

——乔治·科斯坦萨*

任何形式的参与本身都是一种冲突。要参与到一个特定环境或情景中，必须先知道这个环境或情景中各种冲突的力量。这样看来，似乎急需推广一种“冲突性参与”的概念，一种不请自来的刺激，一种向知识领域的强制进入，而这一点可谓得益于空间思考。

在参与的政治性中，必须清楚区分合作与协力，正如弗洛瑞安·施耐德提出的那样。³ 政治理论家查特尔·墨菲道出了对抗（antagonism）在社会维度上的两种表现：先是一般的对抗，一种经典的敌我关系；然后是“争议”（agonism）的概念，那是持反对立场的双方的一种另类定位方式。在后者，我们面对的不是敌我关系，而是一种墨菲称作“对

* 经典美国情景喜剧《宋飞传》(Seinfeld) 的一个角色。——译注

手”（adversaries）的关系，“对手”的定义就是“友好的敌人”：他们彼此有共通之处，而且他们分享一个符号空间。这个概念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它去除了关于参与的天真幻象，指出现实的责任，揭示了“参与的暴力”^{*}。这样看来，将冲突性参与构想成一种有用的干预实践，应该是有益的。

冲突是一种对抗的情况，两个人或更多群组之间互相对立的状态。冲突也可以用来形容利益、目的或目标的矛盾。当我们将冲突与天真的参与相提并论，冲突并非指抗议或挑衅，而是一种微观政治实践，其中参与者是主动分子，他们要求在力场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参与是一种批判性的投入。

当参与变成冲突，冲突变成空间，微观政治活动与传统国家政治活动有着一样的影响力。这些微观政治的碎片强化了哈尔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说的“诸众”（multitude），

^{*} 《参与的暴力》是米森《参与的恶梦》之前的一部关于“参与”的著作的书名。——译注

即组合多种差异，汇合来自不同方位的力量。‘他们提出，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在全球的快速融合构成了一个很有力量的网络。界定这种“诸众”的是丰富的多元性而不是共同性。哈尔特和奈格里认为这种“诸众”是带来未来转变的最大力量，它会在最无法估计之处发生，当对抗愈激烈，它的影响力便愈大。然而，正如在我跟墨菲的对话中谈到的，哈尔特和奈格里的多元理论在解释全球与本土的对比时流于过分简单。

谈到空间实践和参与，最有趣的是比较“诸众”的论述与意大利政治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论点，尤其是他说的“迈向体制的长征”，即对广义文化体制包括媒体、学院及剧场的挪用。葛兰西、哈尔特和奈格里都不同意文化变革只能在“革命之后”才发生。他们三人都确认文化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的“革命”应该是建立一种另类体制，而不是推翻既有体制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缓慢的转变过程，其中冲突是一种有益的对抗，一种民主应该能

接纳的干预。文化是一个活的系统，只有通过提出反对的观点，才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2006年7月，雷姆·库哈斯与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在伦敦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连续二十四小时采访了超过五十个人——那是第一次的“采访马拉松”。这个活动旨在采访来自不同范畴的人，试图整体地反映今天伦敦的面貌。虽然这个活动在很多方面都很有趣和成功，但也有一些从批评角度出发的观众表示不尽满意。当然，如果要反映一种跨范畴的面貌，便必会包含多元的声音。为免误解，我必须说明，我不是说活动应该有一种更包容或政治更正确的模式，相反，我认为它没有的恰恰是构成这个城市本身的冲突。主办人称这个“马拉松”是“一系列刺激的讨论”。可惜，所有参与的人要不就是既定文化界的一分子，要不就是思想家，反正多少跟文化界有点关系。

基于协力是一种超越共识的实践，我想提出，要包涵一个城市的所有复杂性，就必须包括城市中

所有的冲突力量。共识在各种力量的相对关系中达成，换言之，如果暂停了这些相对关系，便有可能产生另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将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城市中的多重真实，和其中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有趣的是，“采访马拉松”中有一位受访者就是查特尔·墨菲，她对中产阶级的共识沼泽深恶痛绝。虽然她的“访问”更像是个人发言，却道出了可能是这个访问活动的重点：由于今天的文化网络依靠共识多于冲突，它只会复制，而很少产生新知识。正如墨菲指出：“认识到力量关系的构成角色，就可以抛开一个修补民主社会的虚假理想。“民主共识只能体现为‘冲突共识’。民主议论不是为了达到大家都接受的‘唯一’的理性答案，而是追求‘对手’之间的观点交锋。”⁵

所以，我们不妨将冲突想象成一个有利条件，一个积极环境的构成元素，而非一种直接的、物理的暴力。我们不必把冲突构想成某种物理力量。虽然一堆太散乱的冲突声音聚在一起，可能会变成一

场马拉松辩论，但通过各种群组和论述的参与，我们可能在对话中获得对各种力量的更准确的理解，从而创造出另类、意想不到的知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多重的力量关系，它们渗透在社会之中，构成社会的特性。这些力量关系不会自己形成、巩固、发生作用，除非得到一个论述的生产、积累、传播和作用。”⁶

为使参与达到政治的维度，人们的投入需要基于一种有距离的批判声音。通过这种“冲突参与”，在后学科力场中的知识交流会生产新形式的知识。作为这种“冲突参与”的开始，我们可以引用施耐德在他的文章《合作：诸众的黑暗场地》（*Collaboration: The Dark Site of the Multitude*）中对协力和合作的区分。⁷“作为一个轻蔑的词，‘collaboration’也可以解作‘通敌’，即协助敌国，特别是战争中想侵占或攻打自己国家的敌国。这也解作与自己不亲近的群组或媒介一起合作……”⁸这种意思的“collaboration”也强调了“里”和“外”

的分野（如果你在在里面，你就在一个事先同意的既有论述中），而这样的话，“外来者”便更有可能向既有的力量关系提供新的观点。虽然人们认为外来者根本无法影响系统内部，因为他们不熟悉这个系统，但正是这个条件，让局外人以局外人的方式深入探讨这个系统。我们今天需要更多的这种局外人，他们既不害怕犯错，又不介意制造摩擦，我们需要如克莱尔·多尔蒂（Claire Doherty）说的“环视可预计性”，就是这种外行主义可能让我们进入一个更有效的合作模式。⁹这样的话，超越既定范畴的批判生产，便也可以说成是暂时放弃个人的专门知识，以一种新的好奇心进入一个既有的系统。专家不以知识，而以一种明确的参与的意愿，参与到一个环境、系统或论述中，他们以好奇心去引导探索、研究及学习，还为这个系统输入一种陌生的外来知识。

施耐德说，所谓团队工作经常以失败告终，是因为人们对合作的平庸和主观的理解，这种合作往往不是知识分享，而是相反：“为了事业发展，人

们需要保留他们的知识，不让他人知道。这一点也是小组或团队总是失败多于成功的原因之一。其他原因还包括小组里的人事问题、有害的外部因素、糟糕的管理技巧。”¹⁰ 施耐德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即我们日益看到，共同工作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在这些情况中，一个小组（本是讲求团结和分享的）的成员，会迎来一种更直率的协力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个人愈是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便愈会依靠别人，他们互相依靠，虽然他们各有自己追寻的目标”。¹¹ 合作应该被理解为并肩工作，互相同意而非互相竞争。而协力则是指不同的个人或机构，在共同目标的十字路口处一起工作。这可以是不同但互相裨益，结合力量以创造盈利，尽管各个持份者的目标可能是相反的。为了清楚分辨合作和协力两种模式，施耐德说合作是指向机制内相似的个人，而协力则代表一种差异的关系，针对相异的个人，结合各种不可预估个体。相比起合作的有机模式，协力更像是一种酷烈的内在而非合法的实践。

这个概念当然也跟局外人的概念有关，指出对于一种冲突性参与模式的需要，自我组织实践对比服务提供者的既定模式：“合作不免在以顾客为主导的建筑业发生……相反，协力有一种根茎的结构，使知识以一种无法预估的方式繁茂地生长和蔓延。”¹² 就在这儿，改变可以发生，一种不同的框架建构起来，多元的创意可以产生有效的实践。

协力中的角色往往不只是为赚钱或累积文化资本。协力可说是一个有益的学习过程。在《寻找新的公共空间》（*In Search of New Public Domain*）一书中，马滕·海杰（Maarten Hajer）和阿诺德·列多普（Arnold Reijndorp）形容一种真正的公共空间是一种摩擦和自由的互动经验。我们短暂但频繁地与别人的细小空间接触，甚至进入其中。¹³ 即是说，如果设定一个情况让人们制造他们所相信的，这个情况便会制造一系列的关系和生产力，这个情况超越传统的学科甚至跨学科生产的效果。在变化中的逻辑中，例外永远是基础的概念，意想不到的行为

引发“新”的发生。或者可说艺术世界的自律制造了这样的基建，又换言之，反对可以解作肯定，无论边界收窄或扩张，它们都建造了可能性的界限。

以冲突创造批判性和有建设性的协力，这是冲突理论的要点。不少非常正式的政治的、跨国的和非政府的体制都使用冲突作为一种策略工具，从而呈现真实的情况，并引发一些危机以加速改变的发生。联合国就利用了一些冲突策略，引入一些小冲突到既有冲突情况中，以求处理问题的根源。这种引入其他冲突的方法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冲突转化理论”，这种理论深受约翰·加尔东（Johan Galtung）的影响。¹⁴

回到协力的概念。如果将冲突视为协力中一个有益的因素，似乎并不过分。这个观点将指向更大的问题，即我们如何构想挑战和改变。冲突不一定是自然发生的。它需要出现，成为一种有创造性的摩擦力，一种批判生产的力量。然而，正如前文指出，这种冲突不应是物理或暴力的，而是在内容和

生产层面的摩擦，一种在民主领域中被容许的冲突。在这个领域中的行动会创造现实。这种情况下，那些不行动只袖手旁观的人，他们并不参与，只认定现有的实践范式。对抗性合作的文化也是城市的而非乡郊的。密集的人口使对抗更自然发生。一个表演性的空间，是一个碰撞和反应的空间，其中便有墨菲提出的一种本质性的关系——互相裨益的对手，“友好的敌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共享的符号空间。他们同意一些道德-政治原则，但他们可以对这些原则有不同的理解。他们的争辩发生在共同原则的不同解释中。在对朋友和敌人的关系的考究中，德里达（Derrida）在《友谊的政治》¹⁵（*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一书中谈及了友谊中的差异。德里达思考着亚里士多德的一句格言：“我的朋友，没有人是朋友。”他谈到差异在友谊中的角色。他并无刻意将友谊的概念变成问题，因为友谊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究其根本，友谊带着差异的印记。在朋友和敌人之间，或者在朋友和朋友之间，

可能会出现冲突性共识，于是便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共识性参与得以发生。

这样的话，参与的政治便有可能重新解释为一种以摩擦引入的有益差异。批判性实践应该挑战一般期望，质疑事情应该是怎样，应该怎样做。知识必须是共享的，而知识只能在共同的基础上生长，而这个共同的基础却可以是冲突性的。如果说艺术是政治的，是因为艺术在界定人如何相处，重塑人与人的共同基础，研究这基础是如何产生的，那么，正如汤姆·基南(Tom Keenan)称“艺术明显可以是，也的确是一种政治性的研究”。¹⁶ 艺术“进行”政治，不是通过代表制，而是通过实践。当人们决定行动，变得可见，政治性便出现了。然后，几乎是自然而然地，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局外人需要认识它是政治性的。于是实践、分配的问题，及如何指出和表达的问题，变得最为迫切。我们必须明白建筑永不提供解决方案，但建筑可以呈现冲突的面貌和空间，因为冲突是包围建筑四周的现实环境的本质，尤其

是当我们愈来愈难视觉地看到这些冲突。于是，建筑变成一种见证。

我们于是可以指出，与其寄望下一代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我们更应该鼓励那些“不感兴趣的局外人”，“没被邀请的参与者”，他们不认识预先设定的原型，他们参与进来时两袖清风，只有一种可以引发改变的创意思维。他们不怕引起摩擦，不怕捣乱现有的权力关系，他们打开改变的空间，容许一种“政治性的政治”。面对日趋散碎的身份认同，日趋复杂的当代城市，我们必须思考一种共同的形式，容许冲突作为一种生产性的投入：一种波希米亚的参与，以局外人的身份介入现在的议题及论述，一点都不必在乎会不会被接受。

注释：

1. Chantal Mouffe, "Introduction," in *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ed. Chantal Mouffe (London: Verso, 1999), 3.
2. Florian Schneider, "The Dark Site of the Multitude," in *theory kit* (<http://kit.kein.org/node/1>), accessed Jan. 25, 2006.
3. 同上。

4.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London: Hamish Hamilton, 2005).
5. Chantal Mouffe, "Introduction," in *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op. cit., 4.
6. Michel Foucault, "Two Lectures," in *Power/Knowledge*, ed. Colin Gordon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0), 93-94.
7. Florian Schneider, "Collaboration: The Dark Site of the Multitude," op. cit.
8. 同上。
9. Claire Doherty, "The New Situationists," in *Contemporary Art—From Studio to Situation* (London: Black Dog The New Situationists, 2004), 11.
10. Florian Schneider, "Collaboration: The Dark Site of the Multitude," op. cit.
11. 同上。
12. 同上。
13. Maarten Heijer and Arnold Reijndorp, *In Search Of The New Public Domain*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2002).
14. 加尔东现任 Transcend 的总监，该机构是一个国际和平和发展网络，被视为和平与冲突研究的先驱。他也是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中心 (PRIO) 的创办人。加尔东发明了“和平新闻”的概念，并愈来愈影响传媒和媒体研究。过去四十年来，加尔东就关于如何运作冲突而出版了九十五本著作，发表了千篇文章。有趣的是，Transcend 的推广口号如“尽管选举民主和个人人权对你是好的，对其他人却不一定是好的。”在于加尔东发明了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结构性暴力”。在这个概念中，冲突不是一种挑衅，而是引发变革的方式，通过掌握利益的碰撞而产生新意义和实践。这是一种有效而自发的改变。
15. Jacques Derrida,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London: Verso, 1997).
16. 引自建筑研究中心的圆桌演讲和讨论会，2006年3月24日，英国伦敦 Goldsmiths College。

第六章 再访民主(与查特尔·墨菲对话)

2006年12月到2009年夏天，马库斯·米森与政治理论家查特尔·墨菲进行了一系列的一对一对话，分别在伦敦、维也纳及柏林进行。本章节选了部分内容，呈现了米森现在研究的冲突和非共识参与，作为一种另类空间实践，一个讨论民主生活的出发点，以及墨菲对于“冲突性共识”的理解。

第一部分

马库斯·米森：查特尔，你写过很多文章探讨政治斗争和民主生活的激进核心。可否请你介绍一下你的新书《论政治性》(*On the Political*)的中心论题？

查特尔·墨菲：《论政治性》有两个主旨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来自政治理论的观点。我认为民主政治理论的两种主导的模式——一种是聚合式民主，另一种是像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说的审议式民主——这两者在面对今天的挑战时都显得不够用。我想在政治理论的讨论之中提出一种不同的模式，这种模式我称为争议性民主。我的第二个目的与我的中心动机相联系，那是政治性的。我一直想明白为什么在我们所处的这种社会中——我称之为“后政治社会”——对于民主体制有愈来愈多的不满。我观察了好一段时间，留意到右翼民粹党派的成功，特别是在出现了像阿尔盖达（Al Qaeda）这样的恐怖主义之后。我觉得我们没有一种理论工具去让我们真正明白当下的情况。当然我不是说政治理论强到可以解释一切，但是我想政治理论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的困局。但是暂时它还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它在产生反效果。我们以

为民主政治的目的即是达成共识。很明显，实现共识有很多方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左派和右派的分野已经不再明确，这一点我们是在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与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那里学会的。他们指出我们应该超出左派右派地去思考，而根据贝克，我们需要以“次政治”重新发明政治。这固然是典型的自由主义思想，正如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指出，自由主义从来都不明白政治的特性。当自由主义者谈论政治，他们要不就想到经济——那自然就变成了聚合式民主；或者想到道德，那就变成了审议式民主。但政治的特性总是使自由主义迷惑不解。我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缺憾，因为要在政治中行动，我们便需要明白政治的动态。

米森：这是否就构成了这本书的主题？

墨菲：是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书中我坚持政治层面是与冲突层面相链接的，冲突在人类社会中存

在，它永远代表了一种对抗的可能性：这种对抗是无可避免的。这意味着永远都不可能有一种没有排斥的共识——没有霸权、没有主权的共识。

米森：可否请你说一说你的理论与卡尔·施米特的著作的关系？

墨菲：我认为施米特对自由主义的批评的有力之处是，他揭示了自由主义是且一定是对这种对抗的不闻不问。自由主义无法明白政治的特殊性即敌友的对抗关系。施米特在这一点上绝对是正确的。我不同意他的主要是他由此引申出来的观点。施米特相信自由多元主义的民主是不可行的，正因为人类社会必然存在这种冲突，只有一种秩序可能建立起来，那就是权威下的秩序。据他所说，政治组织不接受多元主义，因为多元必然引致敌友争斗，于是便有害于政治组织。对于我这实在是一道难题，一方面我同意施米特关于对抗无可避免的论点，另一方面我又希望加入多元民主的可能性。因此我发

展出这种理论模式，我称之为“争议性民主”，我希望指出民主的主要任务，简单来说，就是将对抗转化成争议。

米森：你如何表达这种模式？

墨菲：我的意思是，对抗在社会上有两种表达方式。第一种可称为“纯对抗”（*antagonism proper*），即朋友和敌人的关系。施米特说，如果这种关系发生在政治组织中，会引导政治组织的崩解，这一点他是正确的。但对抗也有另一种的发生方式，我称之为“争议”（*agonism*）。这种情况中我们不是相互为敌，而是我称为“对手”（*adversaries*）的关系。敌人和对手的主要分别在于后者是一种“友好的敌人”；对手之间有一些共通点，他们共享一个符号空间。于是，便有可能出现我所说的“冲突共识”。他们同意构成政治组织的一些道德-政治原则，只是对这些原则的理解持不同观点。例如，如果原则是“人皆自由和平等”，那么很明显我们

可以以各种方法理解这个原则，而不同理解所引起的冲突将永远不可能完全理性地解决。你永远不可能说：“这就是自由和平等的正解。”这是不可能的。恰恰在此我看到争议：这种争议在于对同一原则的不同解读，一种冲突的共识——对于原则的共识，对于解读方式的争议。

米森：你指出民主应该提供一个让差异碰撞的场地。你可否解释一下，“争议”作为一种有建设性的政治冲突，如何为不同有建设性的意见创造机会？

墨菲：我认为重要的是将民主的任务体现为一种争议的形式，为创造一种能容纳无法避免的冲突的体制，也就是说要将这些冲突变成对手之间的冲突，而非敌人之间的冲突。如果这种争议的形式不存在，当冲突发生时便很可能变成对抗。

米森：在这里，你说的“体制”具体指什么？

墨菲：我说的“体制”所指很广泛——是整体的实践、语言游戏和论述，但我也指传统的体制，比如政党，在地方或任何层次上人们以各种形式参与的各种政治体制。

米森：你对哈尔特和奈格里的批评让我感兴趣。你可否详述一下你对于“绝对民主”和你说的“容纳多样性地构成‘我们/他们’的方式”，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墨菲：哈尔特和奈格里先后在《帝国》(*Empire*)和《诸众》中提出了关于体制的观点，我并不同意。他们的观点非常反体制，反对任何形式的本土、地区性或国家的体制，因为他们认为任何体制都是法西斯的。他们认为要抛弃对任何国家或地方的归属感，需要一种国际都会的视野和理解。要达致诸众，就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归属，但我却认为这个理论非常不成立，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他们与一般的自由主义派有共通之处）我称

为政治集体身份的“热情”的重要性。他们不明白热情的重要性，弗洛伊德（Freud）说的“力比多的投注”（libidinal investment）[对事或人或想法的一种强烈的感情]，这种热情是由本土、地区或国家身份的形成所带动的。其实，如此看来，他们的观点与哈贝马斯提出的“后传统身份”和“后国家欧洲”大同小异。从哲学人类学的观点看，我认为这非常不足。我主要不同意哈尔特和奈格里的，是他们所说的“绝对民主”的可能性，这种民主是超过任何形式的体制的。我甚至无法想象这是怎样一回事。他们说得就像救世主会来临一般。他们认为有可能达致一种绝对的民主，不再有任何权力的关系，不再有冲突，不再有对抗。这与我要捍卫的观点，也是我大部分作品的基础观点恰恰背道而驰。我的基础观点就是：对抗是不可能消灭的，但可以被驯服，那就是争议试图做到的，但对抗是永不可能彻底消失的。

米森：就这样看来，有没有谁比哈尔特和奈格里更让你认同的？

墨菲：例如说，当我想到民主时，我对德里达和他的“即将的民主”的概念更感兴趣。他认为民主永远都只会“即将到来”，永远不会有一刻我们能说民主已经实现了。

米森：哈尔特和奈格里就是在等待这一刻。

墨菲：在我们说民主已经实现的那一刻，我们骗自己说：现在我们有完美的民主了。这样的民主将不会再有多样性，因为不会再有讨论和冲突的可能性。这个概念与我的概念中的争议性民主是完全相反的。对我来说，有民主，就会有冲突，就会有对现有安排的争辩。我觉得如果我们说：“结束了，不需再讨论了。”那么民主也就结束了。关于哈尔特和奈格里，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将他们的整套理论视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重写——虽然他们使用不同的词汇，一些受德勒兹（Deleuze）与瓜

塔利（Guattari）影响的词汇。他们跟第二国际有同样的信心，觉得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等待“帝国”的矛盾将之带到一个多元的时代，于是所有重要和基础的政治问题都自动消解了。例如，他们视另类全球化运动是多元力量的一个表现。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问题是它包含许多不同的性质和意义。在这个另类全球化运动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甚至相冲突观点的群组。我认为，政治的任务是在各种不同的斗争中创造一连串的等值，将它们转化成某种统一性的运动。这当然是哈尔特和奈格里彻底反对的。他们认为运动中众多不同的性质和意义，正是运动的力量所在。他们认为，运动中的这些小组并不在纵向上联结起来，他们向前走，是直向的，是直接冲击帝国的力量，所以他们的颠覆力很强大。

米森：你对此有何看法？

墨菲：我想这十分说不通。另类全球化运动现

在面临困难，其中一个主因就是运动中的各种抗争彼此协调不足。

米森：这场运动与体制的关系怎样？

墨菲：在这场运动之中，有些人受哈尔特和奈格里的影响，他们不希望与既有体制如政党和工会等有任何关系。他们想要一场纯粹的公民社会运动，因为他们担心——这一点我觉得他们是有道理的——一旦进入现有体制，体制便会去尝试压制和安抚你。这种危机是存在的，我可不想忽视它。另一方面，要是另类全球化运动不与体制达成某种协同，我不认为它可以达致什么重大进展。举例来说，他们非常欣赏“断路者运动”（*piquetero movement*）。

米森：阿根廷的失业工人运动。

墨菲：是的，这正是哈尔特和奈格里推崇的，一场抗议任何形式的体制的公民社会运动。当然，

这场运动成功将费尔南多·德·拉·鲁阿（Fernando de la Rúa，1999年10月10日至2001年12月21日任阿根廷总统）的政府拉下马。这场运动的口号是“Que se vayan todos”（让他们通通滚蛋，我们不想跟政客有任何关系）。但当他们试图重建一些秩序，重新举行选举时，问题便出现了。那些失业工人（piqueteros，被称为“断路者”）在这方面是十分无能的，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承接体制和政党。那么，当大选举行时，变成了二人之争：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1989年7月8日至1999年12月10日期间担任阿根廷总统，是正义党的代表）和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2003年5月25日至2007年12月1日之间任阿根廷总统）。感谢上帝，梅内姆输了，基什内尔当选了，变得想不到地激进。他与“断路者”接触，希望让他们加入他的政府。他成功地与这场运动中的一部分人合作。当然，还有其他人仍然坚拒与政府打交道，而这些人现在变得很孤立。这个例子显示出，那些所

谓的诸众社会运动如果在最终不借用一点传统的政治模式，它很难走得很远。

米森：这“一种声音”——或如你所说的一种“比较传统的政治形式”——是不是就不需要某些共识？在我看来，它似乎还一样需要协商以将不同的声音聚集起来。

墨菲：嗯，我的意思是这是一种冲突性共识，你明白吗？以某种描述（articulation，我倾向用这个词）令不同的运动拥有共同目标。在这个例子里我不想用共识的概念，因为它的含义更广。冲突共识就是说我们有着一个共同目标。这就足够了。

米森：你可否解释清楚这些实践和体制可以是什么，或者它们是怎样形成的？我特别想知道另类体制和知识空间是怎样构成的。

墨菲：最根本的差异和冲突始终都会存在，但至少我们有办法把事情讲通。哈尔特和奈格里所说

的必要过程是可以置疑的。我不确定资本主义是不是它自己的掘墓人。他们声称如此，正如第二国际也声称如此。他们相信帝国会自己倒塌。这是传统的马克思论调，说生产力到了一个阶段，一些新的力量，即诸众就会出现，从而将本来的系统推翻。对这种乐观想法我不敢苟同。我不相信这个过程是必要的。我想这是一种可能性，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要实现的话，必须要有一种政治干预。这一点他们看不到。我看过一部德国电影《怎么办？》（*Was Tun?*）。这部电影是关于这场另类全球化运动及哈尔特和奈格里对运动的影响。在影片结尾，导演问哈尔特和奈格里：“那么，怎么办？”奈格里回答道：“耐心等待。”而哈尔特则回答道：“随你的意愿而行。”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我真的认为这不够。“尽管等，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迎来诸众的时代。”这不是今天我们构思激进政治的方法。其实我还有很多论点可跟哈尔特和奈格里商榷，但我们今天的谈话不能尽详。

米森：正如你所讲，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是，我们必须思考一种容许冲突的共同性，其中冲突是一种有效的参与模式，那么一种“波希米亚式参与”，即一种局外人的参与，在未来是否会容许“局外人”成为一种榜样？

墨菲：我个人认为，今天真正需要的，是创造一个争议公共空间，一种争议性的政治。这是真正欠缺的。在《论政治性》中，我说我们现今生活在“后政治性”世界，人们经常说政治党派模式已经过时了，不再有左派和右派：只有一种中间的共识，这样的话就真的没有任何另类方法的可能性。人们说，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无可作为。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党和工党如此靠向中间路线。它们提出的政纲真的跟中间偏右政党提出的没多少差别。现在，有一种普遍的共识，而没有另类方式，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危险。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搭起了欧洲右翼民粹派兴起的台阶。他们说：“有与这种中间路线共识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提供。我们会从建制那

里取回本属于你们的声音，还给你。我们会提供机会，去体现大众主权。”当然，他们提供的所谓另类方式既不足也不能接受，因为他们只会用一种排外的口吻说话。但由于只有右翼民粹派装作在提供另类方式，所以它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人，似乎也是合理的。他们也试图动员人民的激情，提供一些带有强烈感情因素的身份认同模式。左派除了作出道德谴责，他们也必须明白要成功就必须提出有效的答案。

米森：这样说来，你对于非共识如何理解？

墨菲：在各种范畴的共识都需要颠覆，需要重新建立一种活跃的冲突性。在这一点上，我可以看到你所说的“局外人”可以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个人会用另一种方法描述，因为这更多是一个不同意的人，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而这些人不一定是局外人。这些人可以来自社群内部，但不属于既定共识之内的，他们便有可能看到不同的观点。

米森：是的，但这也不正是一种外来的声音吗？这要靠那些尽管持不同观点，仍然参与现有议论和论述的人。

墨菲：当然。在某些情况，这可以是一个局外人，他突然提出一个观点，扩大了整个观点：“看，还有其他事情你们未考虑到的。”所以，是的，这个人可以是局外人，但也不一定。在社群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没有人听见他们。也可以说这些人是共识的局外人。我想必须去听所有不被听见的声音，所有不能发表的意见。我不是说他们一定没有权力发声，而是这些声音可能还未成形，因为整个共识文化根本就不让人们去构想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很欣赏另类全球化运动的口号：“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想这对于任何人都十分重要，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去思考。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而今天的新自由主义霸权一直企图令我们相信，事情只能这样发生，但幸运的是这并非真相。各种我们称为“可以扰乱共识的生产性投入”都很重要，

它们将带出那些被共识排挤掉的东西。在争议公共空间的创造过程中，很多不同人、不同声音发生作用。例如，我肯定有一个地方是艺术家、建筑师，或广泛文化界的人扮演很重要角色的，因为他们提供了不同形式的主观性。

米森：在我看来，是否迫切需要破除参与的天真想象？那是今天无数“社会性”实践的行为模式。很有趣，某些项目劫持了参与的概念，作为一个无可非议的正面的、自发的方式。这样说来，思考“冲突参与”作为一种有益的干预实践确实有用。

墨菲：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我将我们今天的处境称为一个“后华盛顿共识期”。当然，华盛顿的共识仍然存在，但可幸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它，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当地的情势相当有趣。愈来愈多的国家号称他们不想跟随 IMF（国际金融组织）或世界银行，它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组织。全球化的力量开始意识到，它需要一种不同的对策，一种参与

的对策，而这就是为什么参与变成了一个口头禅。但在很多情况中，参与变成了人们自己剥削自己，让他们不只满足于现状，甚至主动向共识投怀送抱。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你说的“参与的暴力”很有趣。我们必须明白参与也可以十分危险。

米森：你认为是什么构成这种危险？

墨菲：我早前参与了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简称 LSE）的一场讨论会，会上有一些参与了达沃斯（Davos）世界经济论坛的人，也有参与在阿雷格里港市（Porto Alegre）举办的世界社会论坛的人，他们都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有一个参与了阿雷格里港论坛的人论述一个故事，另一个参加了达沃斯论坛的人便说：“真难以置信，那跟在达沃斯讨论的事是一模一样的。”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个乐观的现象，但我就说：“等一等，他们不可能谈论一样的东西。”事实是，在达沃斯的参与者觉得他们应该改变他们的词汇，所

以他们最后谈论的都是同一套词汇，他们想别人觉得他们是运动中的一分子。我十分怀疑这种方式的参与，就好像参与本身就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当然，存在很多不同方式的参与。如果有一种争议性的、冲突性的参与，引发真正的观点交锋，那么我觉得这种参与是很好的。但参与也可以解作参与到共识之中，事先定好一些协议，直到没有人可以反对这种共识。我绝不赞同这种参与。参与要视乎你如何理解它。这肯定不是一种天真的概念。

米森：任何一种形式的参与都是一种冲突。要参与到任何环境或情境中，就必须先明白其中起作用的各种冲突力量。我们如何远离参与的浪漫想象，从而达致一种更积极的冲突性投入？你说的微观政治环境是什么？微观政治环境又在哪里存在？

墨菲：就空间的议题，我不认为你所说的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和地理政治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因为我认为这种政治层面可以在各个层次上起作用。

重要的是别去相信某些层次比另一些层次更重要，这在某一方面回到我之前说到关于哈尔特和奈格里的观点。当我们开始组织欧洲社会论坛，反对这个主意的人说这种争斗应该是全球性的，所以没有理由建立这个欧洲社会论坛，因为它给予了欧洲一些特权。但我却认为这个社会论坛应该在不同层次建立起来：城市、地区、国家——所有层次所有规模都十分重要。争议应该在各种层次上发生，不应只针对地理政治或微观政治，但应意识到政治维度不能在一个特殊空间中本土化。这种维度会在所有社会关系中发生，在任何的空间中，正如最近很多地理学家强调，空间永远是（借用德勒兹与瓜塔利的说法）“褶皱”的（striated）。人们想象空间是顺滑而共性的，朵琳·梅西（Doreen Massey）指出任何形式的空间都是力量关系的调和。这就意味着我说的霸权抗争或政治抗争需要在所有层次上进行。争议需要在多元层次上发生。所以我觉得有一种多层次政治化的可能性，而投入到各种层次都是很重要

的。我们不应只说：“噢，全球抗争是最重要的。”不是这样的。我们真的需要试着转化和描述所有层次上的权力关系。

第二部分

墨菲：在我们第一次关于“参与”的讨论之后，我就这个议题发展出不同方向的思考，现在我想再次跟你讨论。上次，我对于“参与”已是持有批判或者怀疑的态度，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不同意人们说“参与”时往往附带的对民主和政治性的那种理解。参与的概念往往暗示，如果所有人都参与，便可以达到共识和圆满的民主。也经常存在一种参与民主和代表民主的对立观点——人们倾向于参与民主，更普遍的参与，因为代表民主似乎只为精英而设，而参与民主则更为进步。所以，它预设了某一种对政治性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正是我在著作中要质疑的。

米森：你可否详述一下你说的这种政治性？

墨菲：我认为，今天的理论有两种方式谈论这种政治性。第一种称为政治性的“连带观点”（associative view），第二种是政治性的“分裂观点”（dissociative view）。“连带观点”认为政治性是整体地起作用的。这种观点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及受她影响的众多思想家著作中都能看到，就是我们全部人都在起作用，正如“参与”的概念所指出的一样。我则更同意政治性的“分裂观点”，因为它跟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冲突、对抗和仇恨有关。

米森：这些观点与多样性有怎样的关系？

墨菲：最重要的是你如何理解多样性。再一次，我们有两种观点。有一种多样性的自由观，建基于多样性就是多元——对各种各样的承认，我称这种观点为没有对抗的多样主义，因为它承认各种利益、各种价值，我们是不会拥抱它们全部的，但该观点却假定当所有的价值观放在一起，它们会构成一个

和谐的整体。在汉娜·阿伦特的著作中，我们也看到这种多样主义。例如，她提出使用康德（Kant）的概念“扩充思考”，应该为他人着想，想象自己站在他人的位置。

米森：另一种观点是什么？

墨菲：关于多样主义的另一种观点是我同意的，这种观点可以在诸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等人的著作中看到。这种多样主义的概念必定带有对抗，因为各种不同观点永不可能完全磨合。一些观点一定要否定其他观点，所以根本不能想象把所有的观点放在一起，更遑论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接受多样主义的存在，即是接受对抗和冲突的存在。冲突是不可能取消，也不可能解决的，这就是我对对抗的理解。

米森：所以对抗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冲突？

墨菲：对抗是冲突的一种，这种冲突没有理性的解决方法，因为两种对立观点是不能融和的。我认为我们在谈到多样主义时一定强调此点：用第二种观点去理解，那种在韦伯和尼采身上看到的观点。这一观点也跟政治性的“分裂观点”较为接近。我们可以以这种观点去思考主张那种属于“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的民主模式，它强调人民的主权，但我们怎样构想这个“人民”呢？我想现代民主的特性——暂且称之为“西方多样主义民主”吧，因为我对“现代”一字也有疑问，不过稍后再谈这一点——是认识到“人民”不是只有一种。但说人民不只有一种是什么意思？可能是指“人民”是多种多样的，这正是在多样主义的“连带观点”中看到的。你也可以认为人民不是一种的，因为人民是分裂的。这种观点接近我相信的政治性的“分裂观点”，或冲突性的多样主义：“人民”是分裂的。这种观点我们早就在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处看到，他说在“权贵”（i grandi）和“人

民”（il popolo）之间永远是冲突和对抗的。当我们考虑到所有维度——政治性的“分裂观点”、多样主义的冲突模式、人民的分裂——那么我们便可能用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理解参与。所以，如果我们还想使用“参与”这个词，我们便需要重新定义、重新理解它为一种对抗性的参与。

米森：这正是我尝试在空间实践的领域中提出和发展的。

墨菲：正是如此。引用这些概念去思考参与，我们便发现我们永远需要在不同选择中决定。所以，你参与，你便要选择，你不能以参与创造共识。必须要有一个另类选择，表示不同的选择永远不可能共融。

米森：而且它代表了责任。当我谈到去除参与的浪漫想象时，我也提出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在任何时候都参与任何事。

墨菲：是的。这也意味着——这也涉及包容和排除的问题——有时难免要排除。当有两种相反的选择，你可以参与去决定采用哪一个选择，也就是说难免有一些选择不会被采用，总有一些选择被放弃。这一点是绝对关键的。我们只能在排除某些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时才有可能达成共识。这就是冲突性多样主义所提出的。我对人们对参与的某些解读的批评，与我对审议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的批评相关。我不反对审议，但审议要有意义，审议的人必须要有不同的选择。如果只有一种可能性，他们还审议什么？这问题与参与的问题有关。

米森：你说要参与便需要有选择，那么，该由谁创造或提供这些选择？

墨菲：这当然视乎我们在说何种参与。例如，我尤其关注政治参与，所以我在我的著作中特别强调左派和右派的分野。例如，与贝克和吉登斯相反，

我一点也不相信随着民主的进展，左派和右派会结合。我们上次讨论时已谈过这个问题。

米森：这次你可否就这个问题，谈谈政治“第三条路”的共识和参与框架作为政治合理化的工具？

墨菲：好。我对第三条路和它的中间模式的批评相当简单：如果新自由主义没有另一个方案，我们还思考什么？我们还参与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没有选择，思考和参与有什么好处？我真的认为参与民主与代表民主的对立是一个伪问题。我知道左派中有很多新思潮，要求一种新的非代表制的民主——哈尔特和奈格里的绝对民主便是一例。某些左派人士否定代表制民主。我不同意他们的想法。我认为在一种认识到人民的分裂的多样性民主中，必须有代表不同立场的政党，所以便也需要一种代表制度。当然，即使是这样，也需要有来自草根的、直接的民主形式。但人们不应该反对代表——在争议式民主中，它是一种补充。

米森：在继续讨论下去之前，我想问你关于你提到的“现代民主”的问题。这一点怎样构成你的理论？

墨菲：我经常使用“现代民主”这个词，以区别古代民主，但我愈来愈觉得这是一个危险的用语。“现代”被西方用作其独创的专有模型。当我们谈到西方民主，我们倾向称之为现代，于是便不期然暗示了其他形式的民主是较为落后的。当然，这样的声称来自大多数的西方民主理论家。他们肯定西方自由民主是最理性的。不同政治意向的理论家纷纷同意：“我们在西方”，我们是开明的，我们创立了更为先进、更为现代的民主制。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理论和政治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后殖民批评在这里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例如，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他的著作《欧洲省级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中指出我们应该注意欧洲使用“现代”一词的方法，是欧洲帝国主义历史的一个重要成分。

米森：这就是你想说的。

墨菲：我本来已在分析这个问题。当我读到查卡拉巴提的著作时，我不禁说：“他对极了。”现在，我的关于“多极”（multipolarity）的著作引导我思考民主的各种形式，它们与西方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我对于保留“现代”一词来形容西方自由民主制不太感兴趣。然而，它可能在形容一种民主形式的特性，一种在西方世界定义的形式时有用，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现代”、“现代化”的引申意思和政治含意。

米森：这是新工党最爱的词语。

墨菲：是的，现代化是“第三条路”最爱的词语。布莱尔开口闭口是现代化。布莱尔简直就是现代化使者。我们都变成了现代化使者。你自称为现代化使者，不仅自动意味着其他人既未发展又落后，也表示了你有优越的理性和身份。

米森：可否请你举个例子？

墨菲：例如，有一些关于另类现代性的讨论，我觉得极为有趣。不只是在日本，还有印度及其他地方都有这种讨论，人们开始质疑历史进展是否一定要通过借用欧洲现代性的模式。他们试图证明，现代性其实不是只有西方那种模式，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现代性。这就是查卡拉巴提所说的将欧洲省级化。

米森：我们怎样将这一点引回参与的问题上？

墨菲：回到参与，还有另外一个思考角度，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它成为一个这么受欢迎的词。随着新式生产模式的发展，“参与”一词变得愈来愈时髦。我们第一次谈话时，我提到在达沃斯经济论坛，那些商界精英学会了使用参与的语汇。我们应该将此看成资本主义的一种新设定——放弃福特式的生产线，转向新式的劳动力组织，这种方式称为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我们可以从不同

角度分析这种转向，这将会十分有趣，因为这可能会引导我们用不同方法理解参与的概念，可以引用很多不同的理论，但我想重点谈谈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意大利的工人主义（Operaismo，或Workerism）——这种方式，当然，我们在哈尔特和奈格里中看到，也在很多其他思想家如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处看到。根据工人至上论者（Operaists），六七十年代的工人抗争运动成功迫使资本主义转换了一种生产方式，因为突然之间有一阵工厂的工人逃亡潮。工人至上论者分析那几年在意大利发生的情况，年轻的工人不想留在工厂，所以迫使资本家寻找一种新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更有合作性，更有弹性，更有参与性。工人至上论者对这种转变的政治可能性有不同看法。哈尔特和奈格里，一如所料，持乐观看法：他们视之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新兴的共同主义，他们称之为“非物质劳动力”。

米森：你觉得他们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有点天真吗？或至少是有问题的。

墨菲：不只我这样觉得，例如维尔诺便很质疑后福特主义的后果。他视之为一种“资本的共产主义”，认为这是一种新式的合作生产，将工人引导向自我剥削。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这个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在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的著作《资本主义的新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中，他们指出资本家如何挪用对 20 世纪 60 年代工人运动对自由的诉求，通过后福特主义将这种诉求转化为一种新式的控制。他们说明了反文化策略中的“艺术批评”——对真实的追寻，对自治的理想，对阶级的扬弃——如何通通被资本家用以作为推行新的资本操作手段，取代福特主义时期的严密分工框架。他们的分析有趣之处在于指出在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过渡，只不过是同一种论述的重新阐述。这种解读让我们看到这个过

渡中的霸权干预。事实上，尽管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从未提到，但是他们的分析的确引证了葛兰西所说的“通过中性化巩固霸权”（hegemony through neutralization）或“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

米森：他提出的迈向体制的长征。

墨菲：不是的，消极革命不同于迈向体制的长征。这里指的是，在面临颠覆性的诉求时，霸权会采取一种中性化的策略，通过满足这些诉求以削弱其颠覆力量。法语中 *détournement*（异轨）一词可形容这种策略，它的意思是挪用和稍作更改某字，令它表达一种相反意思。我想这个十分有趣的分析呼应了我对霸权抗争的观点，令我们看到这个过渡其实是资本霸权的一个手段，目的是去中性化那些质疑它的诉求，再使用这些中性化了的诉求巩固它的霸权。其目的是将那些质疑它的诉求中性化，但其实，这种满足只令他们更依赖资本。

米森：新工党在英国执政时，也使用了相同的策略，让人民觉得可以参与到政治中。

墨菲：是的，可以这样说。但这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达沃斯论坛上参与的概念这么受欢迎。在我们提过的伦敦经济学院讨论会上，有一位女士说巨型跨国企业变得怎样怎样民主开放，但其实，这正是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所说的异轨策略。企业利用参与的诉求重新引入霸权。

米森：这跟文化界的情况一样，资本主义挪动任何一种异见次文化，变成一种系统化的策略。

墨菲：今天，围绕参与明显有一种霸权干预。这还是要看哪一种理解最为人接受：有些人认为参与可以是颠覆性的，而其他人则认为参与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同谋，只会令人参与到自我剥削中去。所以我们在谈论时必须非常得小心，注意参与的两种相反的解读方法。我们固然不应该简单地拒绝它，因为它可能是一种激进的概念，但同时它又可能代表消极革命。

米森：你刚刚说的这种理解的弹性，我认为很有趣，因为我们可以以弹性的概念为工具，对参与作出有效的批评。我认为，我们不应埋首于参与的某种解释，反而应该回应现实。说到弹性，即是可以适应不同的情况，你必须灵活变通，找出相应对策，而最好的对策往往是需要最低程度的共识的。当你灵活变通，你也不会变得保守，因为其实你想做的是反映和建议。后来在阿雷格里港市的会议上讨论了些什么，我很有兴趣，但我还未有机会读到相关记录。

第三部分

米森：在我们进入另一个话题“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之前，我想谈谈目前的危机是否带来什么样的进步可能性。

墨菲：好。我们上次谈话时，英国政府（带着它的走向中间的第三条路共识）还在向欧洲展示一

副榜样的模样，还那么坚信除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别无他择，但当然，一场金融风暴很快便摧毁了一切。

米森：所以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墨菲：首先，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场危机，这个想法明显是错的。这可能是某一种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场危机，但我也不太肯定。暂时为止，没有任何人采取任何激进的行动，国家参与进来，也只是为了解救银行。银行本身好像得不到教训，马上又回到本来的操作模式中去。事实上，这场危机根本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深重，除了对那些失去工作、失去积蓄、失去家园的人们来说，而对于跨国企业和大银行，很快便恢复原状了。但这场危机的有意思之处在于打开了一个另类可能性，突然之间，国家好像重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因为以前我们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市场说

了算，国家是妖魔，愈少国家的参与便愈好。然后，突然间，国家变得非常重要。有些乐观的人预计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政策会重新出台。国家有点恢复了它的角色，那是肯定的，但接下来又如何？

米森：国家的新角色会是什么？

墨菲：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而我想这一种可能性已发生，就是国家出手拯救银行，但没有逼银行作出一些根本改变。或者，国家可以借这个机会，推动另一种全球化，推出资源再分配的新政策，以求解决几十年来由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严重不公平，将社会两极化的趋向逆转过来。但不幸的是，暂时这种可能性还未发生，也没有迹象显示在可见未来它会发生。

米森：我想起前面讨论过的一点：在弗朗西斯·福克斯·皮文（Frances Fox Piven）的文章《奥

巴马需要一场抗议运动》(*Obama Needs a Protest Movement*) 中，她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论点。她提出奥巴马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并非因为他的远见，也不是因为他的领袖风范，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技巧的政治家。奥巴马的雄心怎样才能有建设性地实现？

墨菲：我很熟悉弗朗西斯，她是我的老朋友。事实上，在奥巴马上任后不久我在纽约见到她，我们当然就他当选带来的新可能性讨论了一番。我绝对同意她说的一切要视乎一场社会活动的出现。这十分有趣，因为美国很多左派人士对奥巴马极度怀疑——但又不至于反奥巴马，这样说大概又太严重。相反，弗朗西斯对于这位有知识的总统感到兴奋。她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大改变。但当她说到是否有进步性改革还得靠一场社会运动时，我又问她：“但是，弗朗西斯，一场什么社会运动？”她回答道：“是啊，我知道这真的不存在。”但她又说：“这可能会发生。”我不知道现在她会怎样说，但她当时挺有信心，这

场运动会发生。其实她是一位历史学家，她将现在与 20 世纪 30 年代作对比，她认为有所相似。说起来，当弗朗西斯说到运动，她指的是那些被赶出家门的穷人的运动。她不是说那种在互联网上发生的动员——她说是真正的草根的运动。她的论点是，在今天的美国，每天都有数量多到难以置信的人们失去工作，被赶出居所。她也说：“他们已无法接受了，会有一些事发生的。这就是 30 年代发生的——是这些人开始组织起来，对政府施压。”而正是这种压力令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激进起来。弗朗西斯认为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奥巴马身上。政治处理危机的方式与权力形势有关。在欧洲大部分地方，人们不能指望很激进的事情发生，因为有很多保守的右派政府，而即使中间偏左的政府上台，这些政府也无力提出另类建议。这当然是因为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在很久之前便相信除了自由主义全球化之外别无他法。但是我又想，即使我们回到从前，回到危机发

生之前，我们也渐渐在破除自由主义全球化下一切都非常美好的幻象，愈来愈多人意识到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出路。

米森：是否就是这个原因，让人们吃惊于社会——中间——民主政党没有在危机中发挥得更加好？

墨菲：是的。保守政府似乎在危机中占了好处。神奇的是，只有在冰岛，保守派才被逼下台，其他所有欧洲国家都没有发生这件事。在法国，可能是因为社会党派自己内部分裂，但整体的问题是就算左派都深陷在新自由主义政治之中。事实上，在很多国家，私有化政策都是由社会党或中间左翼政府推行的。他们提供的不是与右翼取向不一样的选择，所以根本就没有变革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坚持人们要在既有秩序中看到选择的可能性。而如果你不提供选择，我想人们就会跟随既有秩序。

米森：是的，尽管那不是他们相信的，但起码是他们知道的。

墨菲：右派当权，左派没有提供另类选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整场危机中左派一点作为都没有。

米森：你觉得人们的注意力是否太短暂了？例如，我同意奥巴马现在真的不在领导一场社会运动——起码在弗朗西斯的定义中不是——但有趣的是在选举时奥巴马成功动员了很大一批民众，但是只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之后人们便不再关注了。

墨菲：是的，但是我不认为网络上的动员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动员，因为这样不会引发一场真正的社会运动。

米森：我同意。

墨菲：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告诉我们今天国家政治的情况。基本上，奥巴马被包装成一位流行明星。

米森：一个大众媒体的标志，是吗？

墨菲：是，像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人们很兴奋，因为奥巴马就像一个演员或球星，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真正政治化的表达。

米森：那么，一场真正的政治动员的例子又是怎样的？

墨菲：只有当不同群组的支持者，包括工人和穷人，他们都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而不只是网上的年轻人。我不是说网络不重要，但网络不是一种另类选择，因为网络不是一场社会运动。顺带提一下，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又或者在那次柏林谈话中我提到过的，就是奈格里在德国 *Tageszeitung* 报上发表的一篇访问。他说：“奥巴马的胜利就是群众的胜利。”简直荒谬。我想全世界对奥巴马的支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今天的政治表达：一场媒体大戏。但社会运动是另一回事。当弗朗西斯说到社会运动时，她指的是人们真的去组织、游行、堵塞工

厂，而不是在家发发电子邮件。

米森：但你认为奥巴马怎样可以变得真的有所建树，怎样摆脱这种肤浅？

墨菲：我不是说他肤浅。我不是针对奥巴马本人，而是说那些对他的支持显得很肤浅。他需要一场大动员来推动他的医疗改革。当然，他的改革政策比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要温和得多。事实上，在那次选举中，他的政纲是三人中最不激进的。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还是算激进的。所以我们还是等着瞧吧。但在欧洲呢，人们真的需要起来抵抗，例如，在法国。你肯定也听过在好些地方已有工人开始占领了。

米森：占领工厂，你指那些炸弹恐吓？

墨菲：是的，他们甚至想烧掉整间工厂。这真的出现了，因为这种力量的关系，他们准备好与现有情况抗争。这引申到另一个我想讨论的问题——

你说的另一个大受欢迎的词：可持续性。我们应该怎样达致可持续性？好，虽然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或者可以简单谈谈这一点，因为这也是被公共广泛讨论的议题之一。可持续性是什么？当人们说这个词，他们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生态危机。当然这是绝对正确的，而这种共识也愈来愈强，它不再只是左派的议题。

米森：我觉得我们在柏林爱因斯坦咖啡厅谈话时，你说的很有意思，你说可持续性肯定不仅仅是关于生态，也可以关于很多方面、很多题目、很多现象、很多问题。例如，我们可以谈论一个政治或金融系统的可持续性，而我们也看到这些系统在某种程度上崩塌了。但可持续性是一种全盘考虑，讲求一种长远的考虑。有趣的是，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奥巴马现象，我们发现人们的注意力很短暂。正如你刚才说，对金融危机的注意力更是难以置信的短暂。话音未落，那些跨国企业和大银行又开始几

十亿几十亿那样赚钱了。才过了六到八个月，之前谈论过的所有调节整顿政策又全部抛诸脑后了。关于可持续性，如果我们想象不同形式的经济可持续性，是否有意思呢？有哪些形式的经济可持续性呢？人们谈到可持续性，似乎总是只谈生态的方面。

墨菲：是的，其实我想用另一种观点去看可持续性的问题，但这肯定要谈很久。最终这是关于我们之前谈到的：其实经济危机带来了一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另类方法，不论这种另类方法看似有多遥远。即使一切回归正常，人们也会保持一种道德知觉，明白如果不去处理全球化的问题和议题，便不可能实现可持续性。

米森：但我们可以怎样处理那些议题？

墨菲：有很多不同方法去处理这些议题，可以从左派的角度，也可以从右派的角度。例如右派会尝试开发一些节能产品和服务，事实上已经有人在从事这种生意了。生产一些在生产和消费上都符合

环保原则的产品，但依然没有人考虑商品与资本的关系。所以环保问题不一定只有左派关心，事实上，讲求环保的政党往往一点都不左。

米森：左派又怎样看可持续性这一点？

墨菲：我想重点是要提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另类方式。

米森：关于可持续性的思考重点何在？

墨菲：对自由贸易的批评。很神奇的是，除了在另类全球化运动，几乎没有人质疑自由贸易，即使是左派也没有质疑它。自由贸易是某种教条：“自由贸易是好的而保护主义是坏的——我们不能质疑自由贸易。”我的观点是，对自由贸易的批评应该是我们一个重点批评。例如，越来越多人注意到粮食主权的议题。我们更关注食物的问题，事实上，因为有些国家已经无法生产足够的食物给自己的国民。我想这个现象是跟自由贸易息息相关的，因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愈来愈多的食物生产是专门为了出口的。这个现象不只对发展中国家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对西方国家也有影响。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跨国企业只为出口而生产。企业不再理会国内市场，造成很多恶果。

米森：不理睬国内市场会引起什么问题？

墨菲：在过去，企业为了国内市场而生产，他们需要考虑到国内人民的购买力，也会考虑到国内的就业情况。如果没有人购买，就没理由生产。但今天，情况发生了重大改变，因为企业大部分只为出口而生产，他们不再理会国内是否有市场会消费他们的产品。这也是一个去本土化的问题。跨国企业只会寻找最廉价的工人。在先进的经济中，这些工厂是失业率上升的主因。这也会影响政治，因为失业大军很容易变成右翼民粹派操纵的对象。当然，在贫穷的国家情况更糟糕。在非洲，每星期都有很多本土工业倒闭，因为它们无力跟平价进口产品竞

争。例如，我最近读到一些报道，关于在塞内加尔（Senegal）曾经非常兴旺的洋葱生产业，但由于国家进口更廉价的荷兰洋葱，该行业现在已一蹶不振了。这样的例子每天都在发生。还有更糟糕的例子，一些国家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给本国人民，因为生产都被跨国企业控制了，用作出口。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粮食主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认为国家不能也不应该将注意力全都放在全球出口上。我相信每个国家都应该先确保为本国人民生产足够的粮食，这也是“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运动的主张，这是一个支持小户农民的国际组织。若泽·博韦（José Bové），你可能听说过他，也积极参与到这个组织中。这是一种方法，争取让每个国家先生产足够的粮食应付国内所需。

米森：可否请你再谈谈出口贸易与本土工业的关系？

墨菲：我想情况最恶劣的例子是在非洲撒哈拉

以南的国家。在非洲，正是这些年来从欧洲和美国进口的平价产品彻底毁掉了本土工业。大部分人在家乡无力维生，这当然也是为什么他们被逼移民。所有这些绝望的人们想方设法坐船到欧洲，或通过暴露他们的生活困境而得到援助去到欧洲，因为他们在家乡实在没法维持生计，其主因正是出口贸易。我认为欧洲人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要对这种情况负责任。正是欧盟和美国的贸易政策和资助制度造成这种情况，令这么多年轻人为了生存而移居外国。我们要明白不能继续这样。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起码我们要承认错误，改变政策。可惜的是，左派没有远见，也没有勇气告诉人民要认真解决这个问题，西方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就必须改变。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福利是建立在他国人民的悲惨之上的。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这很令人震惊，当然也不可能持续发展。真的要有改变。西方人习惯要求东西变得更便宜。我们想食物卖得更便宜，不只食物，我们想所有的东西都更便宜。我们

想衣服变得更便宜，愈便宜愈好。当然，我们没有意识到，或者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明白这种追求便宜的偏执狂热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本土工业倒闭，人们离乡背井，失业率大幅增加。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恶性循环，而左派的任务就是要说服大家，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米森：这就谈到一個我們兩個人都感興趣的題目。而且我覺得這個題目，尤其在這個背景下，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非道德政治（non-moralistic modes of politics）。似乎在所有的歐洲國家，左派政黨談論問題時都不是在談論問題，而是用一種道德政治來保護自己。

墨菲：一些歐洲左派反對任何形式的移民管制。他們說，我們應該打開國家，讓那些貧窮的非洲人來我們國家生活和工作，但這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正如我所說，要是那些國家不斷流失它們的潛在勞動力，它們國內的情況就不會改善。解決這個問題

的方法不是反对移民管制，或者干脆全面打开我们的国家，而是去帮助这些国家发展可持续的本土经济。有那么多“不用护照”和开放移民的道德论，但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对的政治方法——不是只去组织帮助非洲儿童的慈善活动，而是要反思我们自己所得的特权。这不是一个慈善的问题，而是一个公义的问题。帮助他们的方法不是让他们来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才是他们悲剧的起因。我们不能再盲目追求愈来愈便宜的产品。人们需要明白，他们应该付出更多钱来买食物，他们已经过了几十年的消费主义生活，不应该再继续。这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方法。其他方法可能是道德的，但没法针对问题的根本。

米森：我很有兴趣听你说说这种方法怎样可以在不同的规模上关联起来，例如本土和全球？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谈及过。

墨菲：首先，本土和全球不是对立的。他们是共存而相互依靠的。全球永远都是在本土构成的，反之亦然。在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奈格里和哈尔特的“诸众”概念，我是反对今天在某些左派圈子内流行的“去国土化”概念。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不能看到问题的核心的原因。事实上，我甚至觉得一定程度的保护主义是重要的。在法国，伊曼纽尔·托德（Emmanuel Todd）一直在争取一些欧洲保护主义，只要它不是那种只讲究“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工人的国家至上、妄自尊大的保护主义，我是支持的。我们要思考如何陈述本土和全球的关系。

米森：那么，我们首先需要一场在欧洲内部的讨论，从而超出行善捐赠的道德共识，真正地去改变我们的习惯和生活方式，去引发更大的改变。你可否再谈谈你对各种可持续性的理解以及模式的观点和批评？

墨菲：我形容的欧洲人和他们的做事方式，恰

恰代表了我对可持续性的看法。它提供了一种与现有模式不同的方法，可惜没有人，至少没有人从政治上研究过这种方法。从左派的观点看，我坚持认为我们十分需要一种考虑平等和重新分配的可持续政治。我就是想不到一种可以跳过不公义和再分配问题的可持续政治。这样说来，我也捍卫多极世界的观点，如你所知，我非常反对这种国际都会的想法，什么国际都会式民主，国际都会式公民。我认为应该以地区性去构想问题，所有形式的地区组织都很重要。从地区的观点开始考虑问题，永远都是比较好的。例如，如果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内的一些国家可以联合起来，它们的问题便有可能更好地解决。当然，每个小地域的解决方法都不一样。拉丁美洲的解决方法跟其他任何地区都不一样。我不认为我们可以构想出一个单一的模式。事实上，我认为可持续性就应该有多样的解决方法，以迎合不同情境的问题。相反，认为可持续性是一种单一模式，这样的观点非常错误，十分令人担心。我们需

要考虑情境，也要考虑本土和地区的传统。可持续性必须要跟多极世界的概念并行。

米森：这就指出了对现代民主的多种批评和一种争议空间模式的可能性。

墨菲：是的。我们何不直接这样思考：这是我们的民主形式，而它肯定是需要激进的反思的。它是属于西方的，我们不应相信它也符合非洲和中东等其他任何地方。这不是说，像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民主只在西方有效。相反的，我会说民主概念是“跨文化”（trans-cultural）的。我不会用“普世”（universal）这个词，因为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个词意味着有一种模式是到处都适用的，相反，我会使用“跨文化”这个词。人们就国家如何管治的问题上，渴求更多的民主参与，这不只是在西方才会发生的。但民主制度怎样构成，十分视乎当地的特殊传统和文化，所以我们应该用多种方法构想合理的民主形式，不应相信所谓的“现代民主”是唯一合理和正

确的方式。最重要的是，人们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构想适合他们的民主。

米森：“普世”或“跨文化”的问题也令我想到责任和危机的问题，特别是当你谈到欧洲国家边界时，他们不谈这些移民在本国面对的问题，只谈欧洲国家的疆界和是否应该让移民进来。我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一定要有人出来负起责任。所以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政治决策者总是外判（outsourced）责任，而不担起责任？

墨菲：你说的外判是什么意思？

米森：我说的外判就是一种安全而政治正确的参与形式，管治者通过提出这种参与，让人们觉得他们真的可以参与到国家的政治决策中。这一点在新工党领导下的英国最为明显。这种责任的外判造成各种虚假的参与，制造参与的幻觉，我认为这仅仅是政客在外判责任。这样的话，在遭到批评时他

们就可以推卸责任，说他们已经提供了框架，至少在理论上，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所以我觉得政客，特别是左派政客如何处理责任的问题很有趣。另一个我想跟你谈的问题是，在我的书中，我关注“局外人”的概念。我说的局外人是直接存在于他的政治环境（例如他的党派）的共识中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英国上议院那些中立议员，他们不从属任何政党。同样的例子，你也可以在其他情况下找到，不一定在政治中。所以，我想知道你的想法，你认为局外人有怎样的可能性？

墨菲：我不同意你说那些中立议员会带来一些不同的可能性，因为我认为这些政客之所以中立，恰恰因为他们不去表态。我认为在政治中，最重要的是有真正的选择，但你必须知道你的立场。我觉得中立政客不想确立他们的立场，左顾右盼，我不认为这种态度多有政治性。

米森：这可以是一种解读的方法，但另一种理

解正好相反：政治态度来自挑起政治冲突，从而引发改变的能力和野心。我的观点是，没有必要采取立场，但必须根据你的直觉和真正信念去做决定，去说你认为什么最好，别让你的意见和方法在离开你身边的政治环境之前就被冲淡。用议会的例子说，就是不要让你的政党局限你的意见。这彻底不同于你在一个党派中，你必须先与党友寻求共识。而对于中立议员，他可以马上提出他的建议，这个建议不需要也没必要让大家都满意。

墨菲：是，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之前告诉过我你的一些干预行动，所以我觉得你在用理论解释你的角色。

米森：是的。

墨菲：你在分析在干预一些情境和机制时所扮演的是局外人角色。我是不同意中立政客的，但我认为你的情况跟中立政客不同，因为中立政客面对的是左右分明的两个阵营。中立政客回避用自己的

立场去支持某一方。我经常说政治化的行动，就是作为“我们”一分子的行动，以“我们”的立场去行动，我倒不会赞扬一个只为他自己而行动的人。我眼中的左翼政治不是这样的。同时，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我看到你的理论是十分正面的，而且有建设性，例如你在中东做的那种项目，你在其中的位置就好比一种从外部的干预，就像一个想提出一些冲突的人。

米森：我不是说这一定在某模式或范式中总是可行，例如国会，正如你所说，国会的结构非常复杂，它是由政治党派构成的，但从空间的角度理解，它又是自立的。我的观点也不应该理解为一个通用的政治理论。你说得对，我很大程度在谈我自己的经验，我也认为这个观点的基本原则对于其他相似的情况都适用，对于那些在不明确的范畴中工作的人也许是有用的，因为这种观点提出一种另类的参与方式，提示怎样处理高度政治化的环境的空间实践。

这是一种将局外人视为优点而非限制的观点。

墨菲：这是一种暂时的干预。你想做的是让这些人互相对话，引起一种动力，推动发展。

米森：没错，引发改变。

墨菲：是的，我认为这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

米森：如果你来自局外，重要的是你不想被标签为某个派别，你附带的关系愈少愈好。

墨菲：当然，你需要显得独立，不属于冲突双方的任何一方。但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干预。

米森：你说在政治的党派结构中，某些人，像那些中立政客，拒绝表态。也许我们可以稍微谈谈政党代表制。我认为政党总是有某种取向，这本身就很有趣，因为政党集合了有相同信念的人，这些人也经常有相同的背景。但你是否也同意政党可能变得非常教条和范式化，所以也变成一种限制多于

保护？在这些政党中，即使有些人偶然发现需要一种另类想法，他们也不能追随这种想法，因为他们受到政党的教条所限制。我这样说没有夸张吧？

墨菲：当然没有，这种危机总是有的。这要看政党是怎样组织的，它的内部容许多少的争辩议论。事实上，大部分政党接受内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也接受多元。在原则上，我想一个民主运作得很好的政党，应该在不用外人干预的情况下，让辩论在政党内部发生。我明白你的想法，正如我所讲，就你的实践的例子来说，就一个尝试思考冲突、干预空间的人，我是同意的。但就在政府政治，在英国上议院的例子，我就不肯定了，尤其是上议院本身就是一个不那么民主的体制。

米森：我当然意识到这一点，但对我来说，这个例子有它的比喻性魅力。上议院是贵族框架中的民主代表制，这本身就有点荒诞。但我喜欢使用这个例子，因为人们一听就明白我在说什么。对于我，

这个例子有趣也因为它的空间设定。你看着议会的图像你就可以看到争议在哪里发生。你可以看到两个政党坐在两边，而这些中立的人坐在中间。这是我喜欢用这个例子的唯一原因。尽管，它当然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墨菲：是的，但这不同于你的工作方式，马库斯。在你的实践中，你不会左摇右摆，事实上，你的所有项目、你的著作、你的教学，都采取局外人的态度。

米森：是的，《不请自来的局外人》(*Uninvited outsider*)——这是我之前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墨菲：你尝试把人们带到一起，让他们互动。你永远不站在任何一边太久，所以，我觉得你就不像那些中立议员。

米森：那么，我们可能只是需要另一个字眼，最终变成语言问题了。精彩。但政党本身也很有趣。

例如，在德国，我发现很难选择。选举在两个月后就举行了，我还决定不了把票投给谁，更不要说加入哪一个政党了。对于我，这是一种内部冲突。不是我不相信政党——你有加入政党吗？

墨菲：没有，哈哈！是的，我跟你同感。问题是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政党是我很想加入的，但我还在找。

第七章 平行现实——进入体制的左派

柏林的 Grunewald 是富人区，那儿的 16 世纪打猎小屋和别墅非常有名。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牵着他的狗，沿着僻静的湖边散步。这位老人穿着在巴黎玛德莲广场买的、度身定制的名牌西装。他呼唤他的狗，慢慢走回他最近才装修过的豪宅，他三十二岁的妻子在家中等着他——她是一个电影制片人，一位伊朗库尔德斯坦反对派（Iranian Kurdistan）民主党的前成员的女儿。

费舍尔，没有人像他那样，将“六八学运”那一往无前的文化政治革命续演得如此戏剧化。费舍尔来自一个匈牙利家庭，在德国出生，年轻时做过摄影师、书店售货员和出租车司机；他曾经是毛泽东思想崇拜者，试过由德国坐顺风车到科威特。他

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在 1967 年成为德国左翼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后来又加入了法兰克福武装组织“革命抗争”（Revolutionärer Kampf），参与（或应该说，领导）对抗警察的街头武力冲突。不久之后，他开始接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阿尔及尔（Algiers）参加了一个会议，结识了年轻的亚希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一直发展过来（反高潮地），在差不多四十年之后，在 2007 年，他辞任德国外交部长一职，正式离开德国政府，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访问教授。

在他的充满争议的生涯中，费舍尔由一个典型的 60 年代激进分子，变成了一个机灵的政治内部人士。他的故事也反映了葛兰西式左派和他们的浪漫主义，在抗争路上遇到了怎样的困境。

人们经常将费舍尔称为“反叛的现实主义者”（Rebel Realist）。他任绿党领袖长达二十年，协助将之由一场街区抗争运动变成一个主流政党。在哈格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任总理的红绿两党

联合政府中，费舍尔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到了 2005 年，他成为德国战后史上在任期第二长的外长，成为代表战后婴儿潮一代中，一个政治正确却又最敢言、富争议性的声音。他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是要在他曾经的朋友汉斯 - 佐艾占·克莱茵（Hans-Joachim Klein）的审讯时出庭作证。克莱茵在 1976 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在维也纳会议时策动恐怖袭击，因而被控谋杀。¹ 在 70 年代赤军旅（RAF）发动多次恐怖袭击，将德国工业部长汉斯 - 马丁·舒利耶（Hanns-Martin Schleyer）绑架及撕票，费舍尔谴责以暴力推动政治变革。上任外交部长时，他为年轻时的暴力行为道歉，但他从未跟激进运动划清界限。

看费舍尔早年的故事就像坐过山车，而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却一帆风顺，只沿着一颗政治野心在固定政制中稳步前进。作为一个高级政客，他的早期活动可说很不寻常，但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又惊人地普通，跟随着既定的权力体制，一步一步地，从一

位独立社运分子、一位组织欧宝汽车厂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摇身一变成为国会议员，最后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在国会，费舍尔经常被认为是反对派的“真正”领袖。他将“在野派”的身份转化成一种政治资本，将绿党引领到德国国家政治的中心：这是一代人慢慢进入体制，然后飞黄腾达的故事，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这种反对派的体制化给管治阶层带来了“相对的安宁”。

看看费舍尔那一代对于今天的抗争文化的反应，可能会有点讽刺：我们总是听到他们不满于今天的抗争是那么的停滞不前，世界只是在经历大众文化和次文化（先是摇滚，之后是朋克，然后是电子音乐）之间反复不断地更替。看看六七十年代激进运动的主将，尽管他们今天已完全习惯了文化高档化，写典型的传记，舒舒服服过着中上流社会的生活，但他们却指责年轻一代只知跟随共识，不知批判精神。但是这真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批评，因为所谓共识就是这一代人的现状，特别在欧洲各大新

工党的各种领导之下。现在要自称反叛分子，不是留长头发就可以了，今天这种表面的“不正常”仅仅被视为一种民粹派的时尚。最近《艺术论坛》（*Artforum*）刊登了一篇利亚姆·吉利克的文章，他写道：“1968年对于‘不同’（*difference*）的认识，比任何一年都要深刻。1968年最重要的论题是：人可以用不同方式生活。尽管这个论题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成效（性解放、公民权、学院重组、生态、反战、妇女权、社会运动、自我意识，等等），却始终无法动摇共识社会的基础结构。”²而且，当代资本主义似乎总是能在一种抗争真正发生作用之前把它收纳，市场化，最后磨灭它的作用。一旦媒体和市场开始吸收“不同”，这种“不同”便不再能发生作用。所以，去批评二三十岁的、成长在叛逆文化中的一代年轻人不懂怎样去叛逆，这是讽刺（甚至有点反动）的。

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批评和抗争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上街。今天，我们看到物质世界

现实转移到非物质世界中。这些抗争有时比较内敛，但大多数时候人们都是有意选择使用互联网、私人聚会和其他微型交流互动去介入政治和文化。费舍尔那一代人还在等待一场新的革命——一场在街上爆发的新的社会运动——因为他们还埋首于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抗争方式中，以致就算新式的“激进主义”从他们眼底下流过，他们都未必察觉。今天，“网络一代”那么善于无声无息地渗入系统中，完全不需要任何正面冲突，冲突的存在几乎神不知鬼不觉。唯一还公开的起义，也拒绝任何一种可能被媒体和市场消费的抗争方式。与其创造一种可以被当代企业和风险资本家（那些经济达尔文主义的信徒）利用的文化框架，他们拒绝传统的政治消费，创造一种新的批判性、作者权和网上社会模型，拒绝参与被认可也被监控的相互主体性，但这些抗议的效果远远不限于在网络上。在过去十年中，文化界人士如作家、电影导演、政治活动家及哲学家等悄悄化身局外人以应对世界的重要议题：国界、

空间政治、堕胎。他们走到边缘，用多面向的共同网络，例如点对点小组、开放资源、非政府组织及 YouTube 网去表达他们的立场。尽管这些平台也可以被用作个人投机出名的工具，但它们也的确创造了一种平行现实，一种实践框架，而不仅仅是一种可被消费、抄袭、挪用（买和卖）的实用美学。³ 这根茎性的、超链接的、非物质的网络结构是一个新的集会广场——一个共享共编知识的、由人们共同构想的高速系统，我们不再需要慢慢渗透进体制中，我们可以在主流文化和媒体之外，创造出一个不断更迭的平行现实。要渗透进一个系统，不必再实实在在地走进体制。互联网一代创造不同规模、不同媒介（新媒介）的另类选择，而他们往往是完全在虚拟世界创造这些可能性的，他们不再与官方竞赛，创造属于自己的平行的、虚拟的世界。

在大部分情况中，葛兰西提议的“迈向体制的长征”的终点都是保守的框架、陈腐的原型和既定的共识。葛兰西说霸权是由语言和权力建立，以分

散的方式在社会体中运作。1968年是一场针对欧洲传统左派政治的革命，它主张一种简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展开斗争，将由上而下的统治打散为多样庞杂的各种议题，如参与、环境、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等。

但在今天，一场新长征在平行世界起步了。如前文所述，葛兰西、哈尔特和奈格里都认为文化变革不一定要等到革命之后才可能发生。推崇不同的生活方式便可能产生超出预期的效果。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是一个活的系统——这当然不是什么崭新的概念（因为艺术从来都能为“革命”塑造场景），真正崭新的是今天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和蔓延性。

我们愈来愈清楚，即使在政治体制高度发展、行之已久的国家，要落实远见、创造新的现实，我们都不再需要慢慢穿越重重体制。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开始扬弃过时的期望，他们在反叛旧式的“反叛”，创造属于当下的革命性的平行现实。

“68一代”尝试通过进入体制、改变体制以落

实他们的政治理念。但正如葛兰西说，这样的话，他们便不得不付出“真实政治”(Realpolitik)的代价，即要来到社会的中心，根据它的规则去做事，只是他们认为这是唯一可能引发改变的方法。今天，那些“长大了”的左派已经完成了知识理念的革命，他们的口号变成：权力应该用作保卫人权。但最终，这就代表费舍尔那一代人已经变成了主流政治家——大部分还有一种喜欢干涉的大男子主义。费舍尔还是在德国外交事务上唯一有远见的人，但远见的好处也是它的坏处，即它可以永远都是一种远见，一种可能性，永远都不必落实——因为这一点，希碧乐·克劳丝-博格(Sibylle Krause-Burger)写的费舍尔传记名为《穿越幻象的征途》(*The March through the Illusions*)。⁴今天费舍尔改变了，或者说，他对中间左派的定义变得更精确了：“一种平均社会的信念”，排除万难，追求一个没有等级之分的“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世界。⁵但这一代人眼中，文化变革始终是需要漫长知识运动才能引发的，

而今天，变革却可以通过纵向差异和另类形式的介入发生，在坐在家中上网的人之间发生。“68一代”拼命地挑战民主管治，就为了接近它，挪用它。我们看到这代人多年来的变化，似乎在告诉我们，他们年轻时的种种努力，他们所说的“不”，其实跟说“是”没有什么分别。

注释：

1. Toby Helm, "Fischer's Sixties links with PLO spark new row," *The Telegraph*, June 19, 2001.
2. Liam Gillick, "The Difference Engine," *Artforum* (May 2008), 322.
3. 然而，现在即使是这些新方式都被体制纳入采用了，2008年的美国大选就是一个例子
4. Sibylle Krause-Burger, Joschka Fischer: *Der Marsch durch die Illusion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2000).
5. Interview with Joschka Fischer by Hanns-Bruno Kammertön and Stephan Lebert, "Ich bin immer noch ein Linker!," *Die Zeit* 34 (August 14, 2008): 16.

第八章 向市场学习

市场是一部错失良机的历史。

——托比亚斯·梅耶（Tobias Meyer）

扩张是新千禧年的熵：我们要不就减慢，
要不就灭亡。！

——雷姆·库哈斯

我们对“诸众”的一个基本构想是，诸众就是在资本统治下工作的人，所以也可能是那抵抗资本统治的阶级。……换言之，这个概念符合了工人之间没有政治等级的说法：所有形式的工人，在今天都具有社会的生产力，他们以同样方式生产，也分享同一种抵抗资本统治

的潜力。他们拥有抵抗的平等机会。²

——哈尔特 & 奈格里

我们在思考经济共融问题时，不应参考哈尔特及奈格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³

——约阿希姆·希尔施（Joachim Hirsch）

2006年出版的博尔坦斯基和希亚佩洛的著作《资本主义的新精神》⁴，以一种崭新的管理学文本分析法，探讨反资本主义批评面对的危机。本章节将用一种相似的方法，引入一系列管理理论及商业思维，试图用一种另类方式去理解和阐述“局外人”及“外来因素”等概念。我以商业界外聘顾问的理念和实践作为例子（虽说这些理念和实践本身是有问题的），尝试说明不请自来的局外人和中立者可以发生怎样的作用。

只要用市场的角度看，我们便能将批判性看得特别清楚：批判性总是来自边缘或外部的，它并不来自既有系统内部。当大公司或大机构要进行结构改组，除了从内部动员，也会聘请一位公司外的人来评价、观察和分析公司的重要业务，提供一些有建设性、批评性而行之有效的建议。这就说明仅仅靠既有系统的内部是很难组织改革的，而且，大部分既成系统中的参与者都很难理解或看出该系统有何缺陷。文化是由历史构成的，文化中的历史来源和禁忌往往有着曲折迂回的渊源，而文化又往往通过某种威吓来规定我们的行事模式。我举一个通俗例子——猴子实验。这个实验向我们证明了这个绝对真理：有几只猴子关在一个笼子里，一只香蕉挂在梯子上。当一只猴子试着去爬梯，其他猴子就会受罚，久而久之，当有猴子想爬梯时，其他猴子便会攻击它。猴子慢慢更替，新来的猴子很快就学会了去攻击想爬梯的猴子。直到猴子全部被换成新的，它们都没有见过那本来的惩罚，却仍沿袭这种攻击行为。⁵

什么是“有建议性”的另类方案，而什么人会因此得益，这些当然都是看情况而定。假设，在某公司，一位外聘顾问提出，为了维持公司的健康，建议董事会下令关闭一整个部门。于是，很多人会被开除掉。这一章节将不会研究或评价这位外聘顾问的做法是否合乎情理，而只探讨为何由外部提出和推动的改革往往是更有效的，即我不研究整体情况，只研究情景概念。

成功的管理只会短暂地让人看到，而不会久留。管理要突然让人看到什么……管理就是去掌握情景中的机会和偶然性，了解事情的运作，将潜在可能性偷运到情景中去。……管理者不知道也不会知道未来的“正确”道路，他只知道每个情景都有它的潜在可能性，而那些在日常工作中的人并不会意识到这些可能性。⁶

在商业世界，人们对这种外来者的作用有着非常不同的理解和实践。其中，两个最有趣的实践模式分别是麦肯锡模式（McKinsey model）和康历斯

维沙方法（Königswieser approach）。⁷下文不会从情理和批判的角度考察这两种实践，不会拆解它们的策略，而仅仅描述它们作为相反的两模式。

麦肯锡公司是一家全球管理顾问公司，专门提供高级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这家公司的顾问专员作为外来“专家”走进各种公司，他们使用经典的分析方法：建立框架，打破结构，重组体制。他们的分析根据的是一本经验录，一个知识管理系统，是麦肯锡公司自20世纪30年代一直建立起来的。麦肯锡公司派出它们的顾问专员跟各种公司紧密地合作，他们的基础是决策权力的金字塔结构。他们的工作往往是短期的，也不太考虑这公司的整体环境，只根据他们的管理知识去作考虑和反应。他们长期使用同一套分析和认知权威的系统，这是一种知识的保守主义，形成一种闭门的文化，让他们很少和外界交流。他们十分重视客户的保密性，甚至不同队伍的顾问专员也不能互相讨论工作细节。他们应用的这套系统里有很多“权威”的知识，但没

预留多少空间给“奇思妙想”，于是也很少产生特别的结果。这种分析模式的缺点之一就是它同时依靠理性思维和共识，但同一种原因不一定造成同一种结果，它可能产生多种结果，正如经典的方法也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行。

与麦肯锡模式相反的是康历斯维沙公司（Königswieser & Network）的做法。康历斯维沙是维也纳的咨询公司，以其“补充顾问服务”（Complementary Consulting）而闻名。此方法与麦肯锡的截然不同。康历斯维沙的人员会与客户公司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可说是一种深入的工作方式。他们不一定以低层员工的角度出发，但他们很重视对日常 workflows 的理解。假以时日，他们对于要处理的问题愈来愈了解。这种方法几乎像一个疗程，它超越了一般分析，它不是旨在计算出一条解决问题的方程式，更多的是建立一个针对问题特性的网络。它依靠直觉多于分析，懂得欣赏失败的价值，懂得非线性思考和“向他人学习”。它宣称复杂的

挑战需要全盘的思考去应付，与其开出解决问题的药方，不如在不断改变的工作过程中引入不同方案，它明白问题是无法完全解决的，我们只能缓解其影响。比起制定策略计划，它更鼓励整体地重组工作结构。

用分析法来做批判性设计很可能会失败，因为分析只会考虑既有结构所提出改变的元素，而不会问更多的问题。或者，可以引用阿纳柏·查泰杰（Arnab Chatterjee）最近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举行的智囊团会议上的一个充满真知灼见的说法：“如果我们让一位麦肯锡的专员和一位设计师去改造一个玻璃杯，他们的做法将会彻底相反：麦肯锡的专员会看着杯子，想办法怎样改造杯子的造型，换言之，他的改造是美学上的。相反，当一位设计师看着杯子，他会思考杯子的作用，将它作为一个给人补充水分的容器去思考。”这当然就涉及到一个人在思维中设定的界限。一个反复的设计过程会不断划出新的框架，所以最终成果非常可能不在本来的

框架中。麦肯锡的专员则往往在工作初期便限死了一个框架，所以他们堕入了这个陷阱，即他们觉得任何偏离了常规的事情都是问题，而系统又自然而然倾向于保持自身的结构。相反，设计师不会固守原有的框架，他们勇于打破框架的边界。

那么，如果一种引发对话和沟通的设计可以引发变革，我们便可能将设计视为一种宏观地重设秩序的方法。聪明的设计意念总是考虑到各种可变因素，同时针对多种因素，产生互动。网络本身并不创造任何东西，网络内的定位才是最重要的。再者，在一个有效的跨范畴协作模式中（真正的不同的范畴，而不是文化环境中的几种近似的范畴），一个人必须放弃他的定位，才能使新知识出现。

在第四届 DOM 会议*之后，在奥地利林茨（Linz）和蒙特斯（Mondsee）举行了一次智囊团会议，会上也讨论了上述的一些问题。DOM 会议的

* DOM 是 Design-Organization-Media Research Laboratory，设计-组织-媒体研究实验室。——译注

主题是如何借用设计的方法论去解决复杂的问题。在这个前提下，设计不仅是一种在既定的复杂组织或社会情景中，创造和改造物件或建筑的方法，它更是一种反复学习和解决问题的原型，任何机构和专业都可以借用它，以找到比简单地更改或优化更好的解决方案。⁸这个观点也涉及协作对话中的开放性，以及通过创造新现实而学习。要发展出一种批判性实践的模式，我们需要推动直接和针对性的参与，一种非程序化的方法，而不再单靠反复阅读旧知识。⁹

这种观点也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的知识分类：即假设真相是存在的，我们可以客观地把它找出来。这种思考不会专横地告诉你何为对何为错，反而会给你一些提示。与所谓的系统思考相反，这种更全面的思考方式告诉我们，所有我们已知的都是珍贵的，我们只需为知识加入新的维度而已。如果我们将系统思考比作传统疗法，那么全盘思考及更具冲突性的模式则更像补充与另类疗法。

在商业界，几乎一切都是以增长为依归的。但如果“X”是好的，不代表愈多“X”便愈好。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坟场可以变得愈来愈大，但它不会有发展。”¹⁰这种现象也可说是金融危机的一个成因：人们最关心的不是价值，而是数量，又没有人准备承担责任。发展并不来源于增长和数量，它不关心事情有多大，它直接关注内容，它需要设计。这种发展和其批判性改变的基本条件，是一种针对性和全盘性的思考，即使它企图改变一个（权力）架构，它也不被局限在其中。因此，发展的要点是如何为崭新知识找到应用方法，因为没有应用的方法，即使是最精密的知识都是没用的。例如，在美国产生的新知识比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和还要多，但很多新知识却无法被应用。在商业世界，这个缺乏知识的应用途径的问题产生了一个矛盾：增长往往来自于采掘（exploit）而非探索（explore）。一间公司要长期成功，它既需要灵活变通，又需要秩序井然——可谓是需要“ambidexterity”（两只手

擅长不同的技巧)。有了这种技巧，一间商业机构才可以很好地在探索和采掘之间摆动。这也说明了，你要是只追求两者之一，即使你在一方面做得很成功，最后你的业务都会失败的。细心看看苹果电脑或 OMA* 的发展史，你就会发现这两家机构总是游走在变更和秩序、探索和采掘之间。正因为苹果公司有 iPod 这个长期大卖的产品，公司才可以挑战、扩展领域的边界，“浪费”数十亿元在研究和开发项目上。相似的，在几次几乎破产之后，现在 OMA 学会了如何“隐身”地做一些项目，赚取资金去发展真正有趣的工作。以前，这些有趣的工作永远都是预期要亏本的。

墨菲提出的问题比她提供的答案更能启发我们。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一个人在分析反思他四周的情景时，怎样可能将之变成一个有建设性的论述？

*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 库哈斯主持的建筑事务所。——译注

在商业语境中，墨菲的理论称为“构想困境”（formulating the mess）。在这里，“困境”应该被理解为探索、问题和行动的场域。一个人将“困境”构想出来，就是为了说服自己或说服他人去作出改变。如墨菲所言，这种方法或工具创造了一个接合空间，在其中，大家同意互相不同意（an agreement to disagree）。对于一个顾问专员，“构想困境”就是准备一些条件，归纳各种真实情况，从而提供不同的建议。墨菲认为，它强化了一个环境，一种存在着双向冲突的共识，从而更有效地运用这些冲突。为了归纳这困境和冲突的场域，便一定要观察和理解系统背后的基本原理，了解它的历史，看看它是怎样运作的。而思考历史案例时，最有趣的恰恰是失败而非成功，是问题而非解决方法。

从错误中学习是非常有效的。在日本，所有退休的行政总裁都会加入公司的一个专家小组，他们是公司今昔之间的桥梁，将旧问题解释给新一代员工。相同的，当马克思把困境摆在《资本论》¹¹的

读者面前时,他更关心的是找出问题而非提供答案。《资本论》的主旨不是要提供一张改变的蓝图,而是通过构想困境,激发对改变的渴求。

亚马时德·加若达黑将我们面前“困境”的性质描绘为一个多种问题的互动系统,它涉及多变的因素、不同的层次和管治原则,换言之,包括了社会系统的所有构成元素。如此,困境便是设计未来的结构的工具,它是建议性的。这个困境应该由个人或者团体自己构想出来,必会针对相关系统中最弱的一环。在这个情况中,一个局外人可能面对最坏的情况是人们不愿意负责任,没有权力和没有安全感。

换另一种说法:要引发改变,不只要懂得“对的”方法,更需要去说服他人你提出的方法值得一试;而要说服持份者,就要充分认识他们的活动、兴趣和目的。在复杂的社会情景中,纯粹的理性就是起不了作用,因为所有人或持份者都会先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一点,当然,也是人们对于参与结构

的一种过分浪漫化的想象：可以建立一个由下而上的结构，但不是所有持份者都对这种民主方式感兴趣。现实告诉我们，当人们走在一起时，大部分人还是主要为自己着想，这是很合理的，因为协作（合作的冲突性近亲）只在大家有清楚不同的机会和目的时才可能发生。

要设计一个共享作者权的模式，就先要认定权力就像财富一样，人们并不愿意分享它。“去做”的能力和权力，例如在决议时可以参与计划、投票和行动——这种权力不同于管理别人的权力。去中心化是这种权力的同义词。要达到一个共同基础——一种对于“为什么”的共同理解——在没有权力核心的持份者之间必须有自由，但也必须有一个共同基础。这个共同基础就是大家对系统的一致理解，同时又解构它，将本来单一的权力打散和分派。而唯一能透彻明白系统的方法就是去重新设计它。但在这设计过程中也有一种危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准确、小心地设定责任感。之前我们已经谈到过，

利用参与的结构，人们可以轻易地逃避责任，同时却又继续担任主事者。所有系统都需要某种结构或权威，以使它可以有效运作。但有人描述出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的确存在），其中有一种无限的浪漫，它是纯粹的自我组织、网络的网络、运动的运动。纯粹的自我组织网络或行动当然是一种无限放大的浪漫想象，哈尔特和奈格里在《诸众》¹²中就是这样描述的。他们一直致力于用理论解释民主的状况和形式，他们认为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任务是怎样找出一种没有矛盾的民主：推行民主总是面对这种问题，即它无法完全遵守自身的原则；一种新的民主只有在找到它本身想找的权威时，它才会变得合理有效。

回到商业世界，让持份者参与的唯一可能性，就是让他们参与到设计中。而这，当然，也是所谓“参与性项目”的基本问题：要参与到最初的设计工作中，人要先准备好承担责任。要使设计变得可能，主事者要先将现有的困境描述出来，才能避免

反复犯错。所以，描述困境是重新设计的基础。然而，即使在最包容的社会环境，改变也会引起惶恐。所以，墨菲所说的人们可以提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平等基础是很重要的，它创造了一种共同语言，让人得以认识系统中各种极端，并让矛盾得以发生。

每个结构都包含多种功能，也会创造更多功能：例如伦敦当代艺术中心、柏林 Kunst-Werke 艺术中心或纽约新美术馆这样的机构，它们的结构和历史是经年累积起来的。苹果公司有一个董事会、一个工会、一套教育系统、很多股东和消费者，等等。所有这些持份者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一样的历史，这一点不容忽视。然而，一旦我们将困境描绘出来，便可以据之开始设计。人们需要一种信念以完全进入到情景中，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能纠缠在系统之中，要坚持作为独立的局外人。

设计改变需要时间，在设计过程中，重要的是指出现有的矛盾，并引入外来的冲突作为药引。应该避免在设计过程中太早订下共识协议。事实上，

设计师预留愈多的空间给未来的矛盾，这个框架便愈有可能获得长线成功。这种设计应该包含让矛盾重获建设性的潜能。社会 - 文化系统会自我衍化。矛盾取代了公开透明的假象。持份者倾向于片面地思考问题，他们只会用他们知道的解决方法，只会考虑那些全世界通用的限制，例如时间、金钱和资讯。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偏离标准（往往是唯一的标准）的情况都被视为威胁。但问题通常都不是积累起来的，往往是特殊而突然发生的。

局外人应该对内容有一种认真的兴趣，有一种促进他去探索系统的有益的好奇心。他不能靠对数据的伪科学兴趣，而要对情景有直觉性而深入的理解。要实现批判性实践，对保守结构和陈词滥调作出挑战，就必须按实际现状去实践，要更进一步，将回应和批评转化为建设和应用——而且不能过于急进，因为过于急进将不容许我们有任何时间思考。

几乎所有情景都在空间中发生，所以，空间实践可说是物质现实、法律、文化、政治、哲学和日

常生活的大熔炉。综合的设计思考——以局外人的角度投入语境中——可以应用到不同的专业和操作中。在细微处着手而不失宏观视野，批判的空间实践者应该将一系列的问题放到空间、社会政治和社会经济语境中考虑，然后提供一个变革的机制，描绘出地方与更大范围之间的分歧。这些变革机制的性质可以是物理的、法制的或社会的，它们是一系列被小心策划、编辑过的结果，它们的编辑小组同时是煽动者和刺激者：通过整合和更改既有的知识，协力去寻找和创造知识、结构和物理生产的新方法。这些编辑需要十分清醒，又要勇于冒险，不能掉进既有结构原型中去，否则便会失去他们的批判眼光。这些局外人的角色在系统中种下种子，让局内人在未来耕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个设计是需要由持份者来栽种的，否则，它是不会被接受的。建筑师、设计师和艺术家是多目的生物，他们不只是为了赚钱这个简单的目的而工作。设计和反映性的论述都是关于限定选择，是一个编辑及策划的过程，要冒

险相信直觉，与纯粹分析的方法是完全相反的。然而，有趣的是，也让我们了解到里和外、力场和外来分子之间的清晰区分。局外人拥有的特殊力量正是来自他们与结构内部的各种政治全无关系。

在建筑的语境中，我们还是要问这个问题：如何用我们的已有的工具箱，发展出一个超越民粹的形式主义的方法论。建筑师经常只为客户作宣传，就像一个宣传大使，但建筑师根本就是局外人。如果一位建筑师在这个荒凉的范畴中还可以保持乐观，那么这局外人的位置就是他的力量所在，是他最根本的财富。建筑师一直都以他们相对的自主权为基础，来发展他们的方案。尽管如此，形式主义的建筑师却只关心建筑物本身，而他们喜爱的物理结构与权力结构又息息相关，他们热爱让他们不断地创造的经济机会。

注释：

1. Rem Koolhaas, "Junk Space," in *Content* (Cologne: Taschen, 2004), 162-171.

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op. cit., 106-107.
3. 约阿希姆·希尔施与作者的对话。约阿希姆·希尔施是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政治科学教授，也是《霸权与另类政治》(*Hegemonie und politische Alternativen*, Hamburg: VSA, 2002)一书的作者。
4.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Gregory Elliott (London: Verso, 2006).
5. 参见百猴效应：http://en.wikipedia.org/wiki/Hundredth-monkey_effect
6. Alexander Kluge, interview by Dirk Baecker, "Vom Nutzen ungelöster Probleme," in *Vom Nutzen ungelöster Probleme* (Berlin: Merve Verlag, 2003), 50.
7. 也可参见网站 www.mckinsey.com and www.koenigswieser.net.
8. 这个智囊团的成员有：Jamshid Gharajedaghi、Fred Collopy、Greg Van Alstyne、Arnab Chatterjee、Alejandro Gutierrez、John Thackara、Wolfgang Schwaiger、Michael Shamiyeh、Albin Kälén 及作者本人。
9. See also Michael Shamiyeh, *Creating Desired Futures: Solving Complex Business Problems With Design Thinking* (Basel: Birkhäuser, forthcoming).
10. Jamshid Gharajedaghi 在智囊会议上的发言。
11.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1867).
12.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第九章 危机与失败

在回忆录《失·意·录》¹ (*Hand to Mouth: A Chronicle of Early Failure*) 中，美国后现代小说家保罗·奥斯特 (Paul Auster) 解说他的失败体验：在他二十八岁到三十几岁这段时间，他做的所有事情都以失败告终。2005年6月，在一个名为“失败的价值”² (*The Value of Failure*) 的会议上，柯林·麦凯波 (Colin MacCabe) 说“成功已是人们衡量他们自己和别人的人生的关键词”，但他也将失败置于重要地位，特别是在科学知识发展和艺术创意实验两个层面上。在结尾时，他提出疑问，到底当代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成功？又在当代英国（也是当代欧洲），当所有文化教育活动的公共和私人资助都以所谓成功为目标时，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模样？

试想象,如果我们有一副分析失败的超级眼镜,而世界又像结构主义者说得那么结构工整得令人安心,事情便很简单了:我们可以分析导致失败的种种原因,从而决定正确的行动。这样的话,我们很有可能造出连续“成功”最多次的世界纪录。

我们总是认为成功是好的,因为成功就等于财富。麦凯波说:“成功之所以支配我们,多少是因为全球化告诉我们,好的生活就是有钱的生活。”于是,失败不用说便变成了贫穷的保证。但看看当下的空间生产,甚至是整个艺术世界,我们很高兴地发现创意与失败是密不可分的。失败是另一种成功,这一点大概在各行各业各种事情上都是对的,但在今天的文化界,它特别受到重视。根据这种观点,尽管“失败乃惊喜之母”不是什么新的概念,却是一个值得深究的概念。今天,首要强调的是,至少在创意生产的范畴,我们已经远离了对最终产品的依赖,而且有幸地,这种依赖被文化实验所取代了。在文化实验中,预想的产品和其生产过程的

失败，变成了一种知识生产，文化就像一个实验室，里面进行着充满挑战性的工作。如果我们将实验视为构成空间生产文化意义的重要成分，那么我们便不得不承认失败的价值。于是，我们也应该反思以成功作为进步的唯一方法的社会标准。

失败和冲突都是过程中有益的成分，所以最坏的是因为害怕失败而什么都不做。只有生产的行动才能让我们修正、扭转、反思、改变。在重新发明自我的同时，它也打开一个不明确性的空间，往往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知识和内容。如果一个人的首要目标，就是不惜一切的预防失败，奇异的可能性便不会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专业范畴的研究和发明都是那么的可以预料，绝大多数的创意和艺术生产都是那么地保守和平庸。去冒险，就是因为无法事先得知研究的结果。通过勇于在过程中经历失败，便可以打开惊喜的天窗。这时，冲突性参与和非效忠式参与将生产出新的知识和政治性政治。

注释：

1. Paul Auster, *Hand to Mouth: A Chronicle of Early Failur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7). [中文版《失·意·录》，梁永安译，台北天下文化出版，2009年。——译注]

2. 2005年6月在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 Starr 会议厅举行的会议。

第十章 不请自来的局外人

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爱德华·萨依德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定义为局外人、业余者、扰乱现状的人。他认为，知识分子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要“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化约式的类别（reductive categories）”。¹ 萨依德又将知识分子形容为“在公开表现上既无法预测，又无法逼压成某些口号、正统的党派路线或固定教条的那些人物”。他明确分辨了知识分子和局内人：“局内人促进特殊的利益，但知识分子应该质疑爱国的民族主义，集体的思考，以及阶级的、种族的或性别的特权意识。”² 萨依德认为，知识分子最理想应该在边缘工作，就像一个流亡者，一个业余者，发明一种对权贵讲真话的语言，而不是收

钱给客观建议的专家。本书提出的“不请自来的局外人”是一个无私的形象，非常切合萨依德的观点。这个形象告诉我们，只有冒险是普世的。没有死规则，“没有神祇可以崇拜并获得坚定不变的指引”。³ 萨依德质疑默认的行事方式，很明显就是针对那些专家、局内人、有明确利益目的的人。他写道，知识分子应该永远对群众说话，于是也自视为群众的代表。他对于自己的实践有着自己的一套概念，有着保持独立的知识责任感，不被外来压力所左右。在强调局外人的角色时，萨依德表示有时也必须进入一个社会权威的网络，从而直接引发改变（在第八章已解释这一点）。与寄栖于权威之下相反，这种有建设性的、目标明确的反对精神，是局外人实践的原动力。必须明白什么时候应该是系统的一分子，什么时候应该走在系统外面，策略性地摆好自己的位置，从而可以作出关键的决策——否则，这些决策就会被其他没有周全考虑的人所掌握。

但是，萨依德笔下的局外人很孤独，他引

用了福柯所说的“不屈不挠的博学”（a relentless erudition）：“既没有职位要守护，又没有地盘要巩固、防卫的知识分子，具有某种根本上更令人不安的特质。”⁴“不请自来的局外人”具有某种范畴的专业知识，但他愿意走出他的专业范围。他应用一系列的软性技能（Soft Skills）去拆解情境和问题。萨依德认为，这位局外人在社会中扮演一个特殊的公共角色，他不能被化约为某个面目模糊的专业人士。正因为他的工作超出了他的专业界限，他才可以超出某种特殊的利益考虑，去表达他的关注、观点和态度。一方面，每一种专业范围及专业知识都会有其特殊的利益考虑；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专业知识不是出于无私的，它才可以对不同情境作出有益、特殊及有效的贡献。这一点来自“他们是具有象征性的人物，其特征在于坚决远离现实的关注”⁵，来自一种怀疑和投入的意识，对他的道德判断的坚持：“独立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一种绝无仅有的人格，他们奋力抵抗刻板

印象，不让真正具有活力的东西死去。要获得新的理解，就要不断揭穿和击破刻板的观点和知识，现代的传播将我们湮没在这些东西之中。”“知识分子不是调解者，也不为了建立共识而工作，他“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意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⁷

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基本但关键的问题：他应该用怎样的语言说话？他的话又应该对谁说？他应该站在什么位置说话？这些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要因不同情境而定。这也是一个规模的问题。可能在某种特殊情境下，他要面对更大的群体、更大的利害关系。只要掌握情况的特殊性，他便很容易产生更大的意义。在传达他的讯息时，他必须突破他的专业话语，放弃专业以内的沟通方法，从而创造一个新的、更大的公共受众。“不请自来的局外人”也可以比喻为在其他知识范畴中的流亡

者。古语云：“人不可能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为先知。”（One cannot be a prophet in one's own country.）同样的，在他自己的专业领域中也不可能。

这种流亡又可以理解为一种游牧，不一定是指来回于不同的地方，而是处于一个永远在调节中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⁸ 萨依德认为，流亡作为一种不满的状态，不仅可以是一种思想风格，甚至可以理解为一个新的（可能是暂时的）栖息之处。萨依德进而提出一种业余性，而“这类行为的动力来自关切和喜爱，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狭隘的专门化”。⁹ 所以，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¹⁰ 不要只做分内事，而要能对各种理由和既定做法提出疑问。流亡者并不耽误在实践的共识中，他们反而从理性、道德和政治的角度提出怀疑。这些局外人代表了和致力于对长久以来的协议和共识的诘问，这一点可能

是那些纠缠于势力、权力和政治关系中的人难以做到的。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的，就是萨依德也强调要与受众接触，跟他们建立一定的关系，才有可能引发改变：“问题在于是否要满足听众，让他们像客户般高兴；还是去挑战它，因而激起直接的对立，或动员它更民主地参与社会。但这两个情况，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跟群众的关系。”¹¹

现在最重要的却不是将业余爱好者发展成准专家，而是以局外人的概念为工具，突破千篇一律的专业实践。这个局外人不一定要博学多才、样样皆能（那是文艺复兴时代对建筑者¹²的理解），但他应该懂得用整体的抽象思考、让他的知识变成一种另类却必要的辩论能力，解开现存实践中的关系死结。要成为策略性冲突的主动煽动者和发起人，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利用“弱联结”（weak ties）^{*}的力量。

* “弱联结”即那些不太跟你熟悉的人际网络。由于最熟悉的人际网络之间，掌握的是非常相似的资讯，所以不太熟悉的朋友有时反而能提供更有用的建议或帮助，此为“弱联结力量”理论。——译注

这种从他者、差异中得益的理念，与诺斯底知识（Gnostic knowledge）*的概念彻底相反——诺斯底主义信奉专业知识是“好”及可信的，在相关的环境和实践中，人们只应该接受专业知识，于是这种概念也引申为人们应该安于现状，如果你不是专家，就不应该参与。但“局外人”并不同意这一点，他们认为要对其他知识范畴保持一定的好奇心，而且要冲出自己的专业界线。再者，很重要的是，在流亡中，一个人会建立起一种“批判的接近”¹³（critical proximity，建筑师泰迪·克鲁兹语），即一个局外人可策略性地进入体制或其他结构，从而理解、扭转、动员其资源及组织结构。

这就变成一种没有专业的范畴，一个没有处方和已知知识的范畴，一个批判性的框架：一个局外的范畴，一种寄生式、无偏见的咨询。知识及知识生产不是通过积累而成，而是通过编辑和简

* 即透过个人经验获得知识。——译注

化，或者，就像乔治·戴维拉（Jorge Dávila）对福柯的权力分析的看法：切断就是为了开始一些新的东西——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切断，一个断裂的时刻，一个排除的时刻，它产生于人们作出决定的时刻。“像“参与”一样，“批评”也可以被驯服为平庸的形式和力量，正如我们讨论过的费舍尔的案例（见第七章），批评也可以被驯服，被吸收，就像反叛也可以被招安一样。要使空间实践产生有效和特殊的批判性，我们一定不能让批判性也沦为另一种模具或商品。

以下是一封来自作家与策展人提达·佐赫达（Tirdad Zolghadr）关于“局外人作为一种专业”的电子邮件及马库斯·米森的回信：

吾友马库斯：

在你决定不把我当做一个“单一范畴”的人之前，我要说的是，我们不是局外人。我们喜欢把自己看做走私客、流氓、游牧者等，但其实艺术世界

一点点地迈向稳定的范畴，已经变成一种保守的参与模式。所以，不只我们不是局外人，我们甚至不是不请自来的。作为“专业的业余者”，我们真真正正地变成了专业人士。我们那种半生不熟的知识，现在已经全部变成正常、主流的风格了。这不是说你不可以实验性、好玩、轻率……但你需要毅力和耐性才行。长期投入，就不同主题发明不同的做法，诸如此类。

附我至诚的敬意

提达

挚友提达：

我说的其实不是那伟大和浪漫的局外人概念。我是在说一份工作，一些技术，从而远离在我身边盘旋已久的参与概念，那虚伪虚假的社会民主过程，迈向一种对参与的机会性的理解。我既非慈善家，也不是社工，但90年代中以来，起码有半个艺术界埋首于这两项工作。虽然我很喜欢做跟我的道德

准则相符的项目，但我兴趣不在于建立另一个民主的乌托邦。

如你所知，超越所谓的“范畴”界限并不是那么容易。一个人是好的策展人，不代表他也能胜任一个建筑师，反之亦然。在我谈论的跨界实践中，我考虑到必须接受某些限制：如果完全没有边界和限制，何来有建议性的摩擦？

是的，我们喜欢把自己看做走私客、流氓、游牧者，但不要忘记：你是艺术世界的一分子，我不是。而我所写、所指、所做的，只有一点点与艺术世界相关联。我最近在 *frieze* 杂志中读到你谈艾亚尔·威兹曼的一句很有意思的话。我同意你说他现在做的项目很了不起，但问题是，这个项目很棒，是因为它在实际情景中改造了一个实在的场地，这是关于这个实在的场地，而不是仅仅反映改变本身的，而那却经常是艺术世界的标准。

我认为，艺术世界是众多思想的试验场之一。对于艺术世界中的所有人，艺术就是“雇主”。以下

一小段文字，是布莱希特（Brecht）对葛兰西式霸权的描述，特别指出一种中性化的媒体机器的机制。下面的文字或许能多少解释我对局外人概念的兴趣。

我不觉得收音机的作用仅仅是为了美化公共生活……收音机是单向的，但沟通应该是双向的。它纯粹是一个公布和分派的机器，所以我有一个好建议：将这个机器的功能由公布变成沟通。收音机会是完美的公共生活沟通工程，一个庞大的通讯渠道。即是说，如果收音机可以接收、可以传播，可以让听众说话和收听，可以让他与别人建立关系，而不是把他孤立起来……无论收音机怎样被运用，它都应该力求让人们广播作出回应，因为无法回应使几乎所有的公共体制显得那么愚蠢。我们的文学是不能回应的，这不单让文学本身没有出路，甚至它描绘的所有事物都没法交代其结果，还想方设法让读者觉得很正常。¹⁵

最终，问题是：这个回应是什么？而更重要的是：来自艺术世界之外的回应又是什么？如果有的话，这本书使用我的情境，和我对于脱离“参与的危机”之路的苦苦追求，试图乐观地（也可能是天真地）总括出我对如何应对这个危机的看法。而如果我们可以是专业分子，又是局外人，那就更好了！

祝一切好

马库斯

注释：

1.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xi. [这里各段引文的中译均沿用单德兴先生的翻译：《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译注]
2. 同上，xiii.
3. 同上，xiv.
4. 同上，xviii.
5. 同上，7页。
6. C. Wright Mills,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ed. Irving Louis Horowitz, (New York: Ballantine, 1963), 299.
7.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op. cit., 23.
8. 同上，53页。
9. 同上，82页。

10. 同上。

11. 同上, 83页。[此处本书译者并无全部沿用单德兴先生译本, 因译者对原文有稍为不同的理解。——译注]

12. 也可参见 Andrew Saint, *The Image of the Architect*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13. 也可参见 Teddy Cruz, interview by Sevin Yildiz, "With Teddy Cruz on 'Power' and 'Powerlessness,'" on *Architect*, available at http://architect.com/features/article.php?id=93919_0_23_0_M。

14. 参见 Jorge Dávila, "Foucault's Interpretive Analytics of Power," in *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 Research*, vol. 6, no. 4 (August 1993)。

15. Bertolt Brecht, "The Radio as an Apparatus of Communication," in *Brecht on Theatre: The Development of an Aesthetic*, ed. John Willet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4), 53.

第十一章 未来的学院——教学体制建成中

我们先作一个假设：鉴于在主流大学的体制结构中，创造有意义的新内容变得愈来愈困难，所以，以人性和内容为主导的知识生产工程便只能在学院以外发生——通过在体制边缘设立的小型框架。当然，这种方法已有无数成功例子，但我们还是值得去拿一个例子谈谈，以描绘当下的情况。

伯萨拉·多曼尼（Beshara Doumani）在《9·11后的学院自由》¹（*Academic Freedom after September 11*）一书中指出，以往学院的各种显得理所当然的优势，如今面对着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美国9·11袭击之后，学院受到布什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所危害。虽然这是美国的特殊情况，但我们也看到，在全球很多大学中，学术自由和自主知识

生产正在枯死，因为学院教授不再被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负责行政和筹款的职员，他们通过政治正确、紧随共识的政策，使学系通通变成大学的摇钱树。我们本来认为学院是不受政治和财政压力影响的独立机关，是真正的知识生产和民主公共文化的发源地，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却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学院应该提出问题，思考我们该如何应对当下的复杂环境，但事实上，它却花了大部分时间在行政和筹款上。

这样说可能显得又天真又理想主义，但学术自由应该包含对保守的专业知识的批评，它应该质疑各种既定的权力架构。高等教育的任务之一是为公共服务，无论我们怎样理解这“服务”的含义。由于学院里的学术气氛不断被腐蚀，我们应该反思现行这种用管理大学的商业方法，是否能保持大学的学术发展、实验精神和激进思维。最近，我们看到一种新模式的学术机关在构成。在这种模式中，知识生产是一种商业活动，知识被当成货品般被售卖，

而学院也经常被理解为提供服务的公司。在这种公司的环境中，批判性思想又怎么可能生存呢？

阿兰·布洛姆（Allan Bloom）的《美国精神的封闭》²（*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已是一部旧著作，但这本书很有先见之明。它指出，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体制中便有太多的民主，它准确地指出了大学太早让学生决定他们自己的方向，但学生却不知道应该怎样选择。在2005年，鹿特丹的贝尔拉格建筑学院（the Berlage Institute）撤回阿里桑德罗·萨亚勒-保罗（Alejandro Zaera-Polo）的领导权，转而建立一个所谓的“策划局”。学院的领导分别由维德兰·米米卡（Vedran Mimica）（主管课程及研究）和罗伯·多达（Rob Docter）（主管财政）负责。这个分工将建筑学内容和财政分拆，也为后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这种管理结构将学院的发展置于两个方向之间，不仅使学院方向不明而无法前行，也直接显示出一个在建筑界心照不宣的禁忌：将项目参与者作

为筹款工具，将学生当做免费服务提供者——免费使用他们的时间——这些却全部由学院所推行和推崇。因为贝尔拉格建筑学院不是被认可（并非国际认可的大学）的研究机构，所以情况便更恶劣了。它愈来愈依靠学生的学费来维持，更有传闻说荷兰政府拒绝资助它。来自亚洲富有家庭的学生能够负担学费，便会来这儿读书，而欧洲学生则倾向于到例如台夫特科技大学（TU Delft）等被认可的大学，那儿的学费只要贝尔拉格的三分之一。可惜这些负得起钱的亚洲学生不仅水平严重不足，甚至连基本沟通的英语都说不好，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良好的沟通是教育中批评、反思和讨论的最重要的基础。更有甚者，学院依靠教师吸引资金（来自客户），所以“你有资金，你就可以教书”成为学院的信条，它完全变成了一家企业或服务提供者。

布洛姆的讽刺最后达到一个最彻底的结局：甚至建筑实践教学的课程都被学生推翻了。那些不仅不懂，而且还不能理解、不能沟通的学生成功获得

学院行政部门的支持，将课程的内容改成他们要求的東西。那些分裂出来的行政部门凌驾于不受薪的教员之上，因此他们只能把工作室的主导权交给了那些付钱上课的学生。在两个层面上，内容被换成经济收益。教育民主变成无辜的被告和共犯。

即是说，重新思考学术自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出一种与当下情况相反的文化，即是要反对学院变得愈来愈单一化，愈来愈只求共识，也愈来愈霸权：“教育的商业化在生产一种一致的文化，这种文化对大学作为博学的社会批评港口的传统角色简直恨之人骨。在这种情况下，学术自由变成了奢侈品，而不是追求真理的基本条件。”³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将负责任的（学术）实践定性为对各种专业惯性的怀疑，这正是我们说的学术的核心。它主张学院作为博学、独立、另类观点的堡垒或岛屿，它是一种特权，并应该在一种特定的体制环境中茁壮成长。然而，这种特权还可不可能在今天的大学结构中出现呢？

在今天的环境中，我们似乎在面对两个主要的危机。第一是行政和财政的苛刻要求；第二个问题比较不那么明显，就是人们以为“真正”的知识只能通过专业知识产生：“于是，一个出版物和一个报告到底是非正式的还是学术性的，变成一个讲究的问题，特别是当一些本来是非正式的活动，后来渐渐构成了专业知识的一个范畴（诺姆·乔姆斯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⁴正式学术活动认为只有专业的观念和实践才能产生最有价值的成果。然而，事实却似乎恰恰相反：所有叫人惊喜的成果和知识，都是在专业的边缘创造的。它发生于“事情”（既有或甚至矛盾的知识）重叠时，不一定是通过浪漫的跨学科方式，而是当专业，或更准确地说，专家的思维与局外人相碰撞之时。特别在美国，学院被认定为专业知识的中心，可惜的是，这种看法也说明了从事学术工作不再代表积极投入社会现实，而变成了一种孤立、漫长的个人事业。

在保罗·希斯特（Paul Hirst）的标志性论文

《教育与知识生产》⁵ (*Edu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Ideas*, 发表于 *AA Files* no. 29) 中, 他反对了约翰·马卓安 (John Major) “收紧文化, 抵御改变”的说法。希斯特认为: “这种改变纯粹是技术性和经济性的, 而我们在市场的成功, 定义和划定了我们的现代性。”希斯特孜孜不倦地号召那些愿意抛弃传统的思考模式, 将实践投向文化和政治参与的人们: “最重要的是, 有一门专门的技艺不代表要退出世界, 正如很多学者都反对大学现在正在发生的改变。如果大学是为了创造参与政治和文化革新的知识分子, 它绝不可能切断对人的关怀。”学院应该可以提供一个类似乌托邦的空间, 在那儿, 即使是本来无人问津的反思、评论和研究都可以进行。这种努力可以用两种方法实现: 沿用现有学院体制, 但通过学院的名声和地位, 尽量获得足够支持研究工作的资金; 或者是通过一种相反的学院模式, 即将学院规模缩小到一定程度, 使所有资助的使用一目了然, 不会无法追踪。如果我们追求上述的第一

种现有的大学教授模式，那么国家应该担当它的政治角色，负责资助这些教育活动。但无论如何，我们或许都应该支持让大学变得小一点。一个体制永远是一系列的回声，与其他的知识体系产生共鸣。如果我们再也听不见这些回声，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产生这些回声，那么便是时候去寻找别的知识生产的方法了。

在2010年3月8日，由伊雷特·罗戈夫（Irit Rogoff）联合主编的 *e-flux journal* 第14期出版了。⁶ 在这一期中，读者看到一系列我们急需讨论的立场和论据，以重新评估当代教育模式，考虑学习和交流如何可以在更弹性、短期和不稳定的环境中发生。

我们到处都看到对知识生产的不同语言、不同模式的追寻，一种对“教育”问题的解决办法，即在意见和实践上，冲破由官僚实用主义划定的局限：近十年来，控制和规范愈来愈多，市场价值被加诸在基本公共权利上，中庸的唯唯诺诺取代了任何形

式的批判性——我们追求的却是自我组织、极其创新的异见模式、批判性、一种推动人们在他们的领域和知识上勇于实验的野心。⁷

罗戈夫反思当下教育模式中的潜在危机，因为教育正变成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活动。她指出，在现有的主流教育系统中，学生愈来愈被视为付钱的客户，他们的学习和状况变得相当糟糕。她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是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Accord）^{*}，因为这个政策企图统一之前欧洲各国各种相异的教育模式，甚至将前东欧和前西欧（冷战时期的东西欧阵营）合并成同一种知识传统，“取消了东欧各种知识模式的几十年历史，用知识经济和官僚手段制造一种结合的幻觉。”⁸

在本书的第五章，我介绍过弗洛瑞安·施耐德关于合作和协力的思考。施耐德进而探讨了学科的概念，及其制造出来的孤立化和自我封闭等各

^{*} 欧洲诸国间在高等教育领域互相衔接的一个项目，以确保各国高等教育标准相当。来源：维基百科。——译注

种问题：“毫不意外地，不同的知识体被称为‘学科’，一个由不同学科组成的学院体制，本身就将教育变成一个反复巩固现有权力秩序和分布的剧场。”⁹施耐德指出，我们急需重新评估各种体制及其相反建议：“网络化的环境，去体制化和无规范的空间，如非正式网络、免费大学、公开学院、临时大学、夜校或自行组织的大学。”¹⁰他发明了“ekstitutions”一词，来说明我们既需要组织性的实践（ekstitutions），也需要拆解它们的组织（institution），重新提出排他性这个过时的概念：“就其本质而言，institution 需要同时包容不同的人，它应该对所有合乎既定标准的人开放，而进入 ekstitutions 则属于一种不断反复的谈判。”¹¹

贝尔拉格建筑学院在新领导之下，号称可“给新一代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以工具，更好地去了解和干预当代生活的复杂性。”¹²但在几年之内，学院便由一个充满批判精神和超越学科生产的、充满挑战性的场所，变得几乎像一间工厂；教授需要

为学院吸引比他们的工资更多的资金，才能获得教席，而且整个框架还充满了各种双重标准，令学院体制衰败得更快。

学院走向商业，引入公司培训式的教学——由于这个极其有问题的政策转向，学院也明显失去了批判性，荷兰政府决定停止对学院的一切公共资助。一个公共资助的学术机构，如果只为某一个行业而服务，只希望通过雇员而获取利润，那么它的价值何在呢？它的目的很简单：更多的钱。经济是首要考虑，教学是次要的。

在 2010 年，贝尔拉格建筑学院有两个工作室是私人公司资助的，当时在任的两位学院总监视这种私人资助为学院未来的模式。这种资助并不罕见，特别在美国。然而，当私人资助碰上严重没有责任感、罔顾教学内容的学院，那么，学生便很容易变成免费劳工，教育便彻底走上歧途了。尤其成问题的是，工作室没有明确的目标，其教学和项目缺乏内容，提供资助的公司又过多地参与课程的编排。

在贝尔拉格建筑学院，这极坏的情况不只危害到学院的自主，更让学生和整个课程变成私人公司制造生产的工具。学院和学生为客户制造了一种二手经济，变成公司的一部推广书。私人公司取代了教育者的角色，它决定学院课程做什么、何时做、如何做。教授变成了行政职员，一个为客户服务的经理，他提供他的人际网络，提供一定数量的免费工人。学生为这个两年课程付了 25 000 欧元的学费，却又变成了学院的公司客户的免费工人，学院则以此维持营运。

这肯定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有所影响：他们的兴趣不在于工作室会创造出什么，而在于工作室创造了怎样的关系。对学生作品评分变成了向客户报告。在学生作品的“评委”中，公司的代表比学院的代表（指那些真正具有批判性的、知识主导的代表）更多。再者，这些报告不再是富有成果、非常必要的批判性知识交流，而是为公司而设的、小心翼翼的、以共识为主导的产品。只要客户高兴，大

家都高兴。但学生的学习又怎样呢？教育者的投入又在哪里？学院除了保住自己的生存和反复地为私人公司提供研究服务外，它还可以做什么？有一些贝尔拉格学院的教师和学生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工作室制度，但一直没有人听他们的意见。再者，学院显示出一种令人莫名其妙的双重标准，一方面，它希望做一些“真正”（赚钱）的项目，而另一方面，又拒绝承认。它没有理会这种教育的做法和理念不仅对学院有害，对教师不尊重，而且对学生而言也是不能接受的。学院软硬兼施，不断增加工作室的经济生产，只要教师能吸引资金，便不管他们教什么，否则，便唯恐来不及摆脱他们。教师不应该负责为他们教的工作室找资金，也不应该花自己的工资去邀请演讲者、评论家、让学生出外考察等。有趣的是，在真正商业的环境中（这间学校正在模仿），像这间学院这样的雇员方法是犯法的。教授不会长期投入，教师只获得一个学期的短期合约，这样既不能保证有意义的研究项目，教师又没有可能专注

于工作上。出于财政的考虑，教员随时可以替换，认真和深入的研究方法论便不可能发展起来。

似乎，在这场危机中，至少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个可能的办法脱离这种恶性循环。第一，是回到传统的大学模式，重新将学院的最大责任放在教育上，而它必须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并愿意将资金用在教育上，即学院需要支付教员的薪金，也要支持他们的工作，如讲课、举办讲座和工作坊等。另一种方式，是建立一些小型、外部的结构，这些结构容许持续不断的变革，就像施耐德所说的“ekstituition”。这个观点将学院规模视为决定实践模式的要素，尼古拉斯·西潘（Nicolas Siepen）和爱瑟·宋嘉杜特（Åsa Sonjasdotter）在 *e-flux journal* 上发表的文章《以做为学：关于建立一间新的艺术学院的思考》¹³（*Learning by Doing: Reflections on Setting Up a New Art Academy*）探讨了相关的问题。文中两位作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国办（或私人资助的）艺术院校和“现有

制度所缺少的，没有既定结构、不断重新定位”的所谓的自我组织结构。¹⁴

自我组织模式经常反思和改变其参与者的所学所做，而国家大学或民办学院又总是面对资金不足的问题——不是指资金不足以支持学院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而是因为学院被自己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重官僚系统拖累，没法做出聪明的决策（并因此浪费了很多资源）。学院“真正”的问题在于管理和盈利：“相反，资金短缺对于自我组织学院来说既是痛苦又是荣耀！换言之，当国家学院运作不了，它就会关闭；但自我组织‘学院’还会茁壮成长，正因为它本来就不靠（也无法）正常运作。”¹⁵ 然而，还有，或至少有一点可清楚分野正式学院和自我组织。对于后者，参加者为了进行研究而工作，他们很合理地只获得少量薪金，或根本没有薪金。在前者，参与者要根据一份职业简介去工作：他被聘请为教授或教师，他应该获得相应报酬，因为他所提供的“服务”是事先协议好的，例如他带领的工作

室有多少个学生,上多少堂课,多少次讲座、辅导课、测验,每个星期上课多少个小时,每个学期又有多少个星期上课等。讽刺的是,贝尔拉格学院本来是以自我组织的模式建成的,它是一个没被认可的实验室,可以在一般学院的条条框框以外工作,它有相当的自由,然而它最后却堕入了正式学院最易堕入的陷阱,而且还奇怪地因为它的非官方状态而令情况更为恶劣。

有了这个框架,我们回到一开始的假设:似乎愈来愈有必要创造其他形式的教育活动,配合另类的学习方式,但我们仍保留传统学院颁授的认可及附带的关系和特权,因为这些是学生付钱买的,而坦白说,他们也需要这些东西。结构变革更可能从外部发生,而不是从内部。在国家控制或私人资助的教育外,还有在边缘的小型的结构,它们更灵活,更多变,更擅长创造以内容为主导的教学,它们创造和参与本地的项目,自行发起一些协作项目。在这个环境中,参与者和贡献者学习如何忘掉学过的

事情，反思实践和专业之间的差别，发展出对他们四周环境的社会政治阅读，在他们操作的领域中加入一种批判性。这就是我发起中东冬季学院背后的动力，下一章将会详细讨论这个项目。西潘和宋嘉杜特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比我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要言简意赅：“为了谁、由于什么原因，这间学院要在这里建立？”¹⁶

注释：

1. Beshara Doumani, ed., *Academic Freedom after September 11*, (New York: Zone Books, 2006).
2.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3. 同注 1, 38 页。
4. 同上, 125 页。
5. Paul Hirst, "Edu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Ideas," in *AA Files*, no. 29 (London: AA Publications, 1995).
6. Irit Rogoff (ed.), *e-flux journal*, no. 14, accessed at <http://e-flux.com/journal/issue/14>.
7. 同上, 引自 Irit Rogoff, "Education Actualized".
8. 同上。
9. 同上, 引自 Florian Schneider, "(Extended) Footnotes on Education".
10. 同上。
11. 同上。

12. 参见 www.berlage-institute.nl.

13. Nicolas Siepen and Ása Sonjasdotter, "Learning by Doing: Reflections on Setting Up a New Art Academy," in *e-flux journal*, no. 14, op. cit.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

第十二章 批评与赞扬之间的灰色地带： 中东冬季学院

在 2008 年，我发起并领导一个流动的、小型的自行组织学院，或施耐德称之为的“ekstitution”，以回应西潘和宋嘉杜特提出的问题（虽然当时他们还未提出这个问题）：为了谁、出于什么原因，这所学院要在这里建立？这所学校是既本土却又游牧性的介入关键的环境议题的第一步。

同时，美国和欧洲的大学进一步在阿联酋，特别是阿布扎比（Abu Dhabi）和迪拜（Dubai）开办分校和课程。在中东，美国的主要大学和常春藤盟校要不已经有了代表，要不就快要开办分校。有趣的是，这不是因为大家突然对于这个地区有真正的兴趣，而是出于 9·11 袭击之后的一种经济考虑。9·11 之后，美国大学流失了很多中东留学生，因

为很多中东父母不再把孩子送到美国读书。而很多美国大学都很依靠学生的学费，所以它们才集体决定到中东去追赶它们的“客户”，结果便造成一大堆学术联合项目、合作和分校。

在头两年，中东冬季学院跟伦敦建筑学会合作。它的理念是通过这个不同的、较小型却更全面的介入，我们可以在中东创造出一个与大型“出口教育”（educational export）截然不同的模式。冬季学院并不只带来西方的教师，我们更想邀请区内的专家，凝聚一系列的本地知识。第一年，我们获得在沙迦（Sharjah）的美国大学和在迪拜的第三线画廊（Third Line gallery）的支持，这些支持对于这个项目能在阿联酋实现必不可少。

第一个工作坊有四十四名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包括黎巴嫩、意大利、伊朗、德国、巴勒斯坦、埃及、英国、韩国、巴林、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新加坡、墨西哥、伊拉克、拉脱维亚、多米尼加共和国、约旦、科威特、沙特

阿拉伯及马来西亚。在经历着高速现代化的 21 世纪初，似乎应该也有必要培养一种新的建筑文化，这种文化不只有建筑及城市发展方案，而且还会引发超出估计的发展，在肯定和控制中引发不确定性，当大部分人在考虑“问题”的解决方法时，却创造出有益的冲突。冬季学院不像大型的大学分校，不是为了在新地方建立地盘，而是为了给希望超越传统学术机构而工作的本地从业人员和教师，打开新的批判形式和小型的平台。除了纯粹的批评之外，冬季学院也积极参与和推动批判性的介入和讨论，建立一种辩论的文化。在避免任何新殖民主义的态度同时，我们试图主动处理一些极受批评的议题。只有通过直接的参与，我们才能认真而及时地追问空间现实的问题：用政治性的方式，却不在政治的范围中。冬季学院的第一学期针对外来劳工的问题，特别研究迪拜的劳工大本营（“向迪拜学习”，2008 年 1 月）；冬季学院的第二学期则在 2009 年 1 月开课，主题是“空间及知识的规模”。

试想象一个没有人的城市：如果迪拜的外来人口全部走掉，它便会变成一个没有人的城市。近三年来，批评家最热衷于讨论迪拜的外来工人，特别是那些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他们其实是这个地方发展得如此飞快的条件。我第一次到迪拜时，为西方传媒、思想家及各种作者对这个城市的野心持续不断地批评而感到吃惊，所有批评都大同小异，但经常被遗忘或避而不谈的是，迪拜作为一个城市、一个文化生产的现场，它在短短两年内便极尽浓缩地经历了现代性，变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和地方。欧洲或整个“西方”用了一个世纪经历且还未经历完的事，迪拜用了短短两三年便经历过了。暂不说近来发生的经济危机，这种发展必曾面对很多问题和挑战，需要极大的信念、野心和努力去应对。过去五年来发生了很多事。当各大杂志在批评迪拜这个庞大的建筑工人群的情况和待遇时，他们的第一个工会已经成立了。虽然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发生的，但我们还是看到了除了城市外貌之外的变化，

更有趣的是，我们目睹或可称之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很多小型机构和项目空间开始诞生。与其只以悲观的眼光看迪拜，冬季学院宁愿全面、深入地探讨迪拜的城市结构和公民社会框架，同时也直接但独立地介入，提出一些重要的另类环境方案。

基于对建筑作为现代工具的笃信，阿勒·马克图姆酋长（Sheikh Al Maktoum）的建筑野心十分令人兴奋。这个城市不断建造最高最大的建筑，但西方一点都不欣赏。当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讨论“应该做什么？”时，迪拜决定先做，然后再想。一大批国际建造业的舰队，建成了一个奇特的群岛，里面有全世界最高的建筑，也有全世界最大的商场。但在2007年的沙迦双年展，人们看到了一个转向，它针对的是一些从未被讨论过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双年展没有展示什么自我参照的作品，而指出了过度城市发展、污染、单边主义政治以及自然资源的误用、滥用、过分开采等各种问题。这时，艺术和空间实践似乎可以担当这个地区的政治所不能担当

的角色：正义的批评者。库哈斯在 *Al-Manakh* 的序言中写道：“又一次重复的‘迪斯尼宗教判决’^{*}，太能反映西方对阿拉伯海湾城市的批评想象了。”¹ 这个地区（特别是迪拜）的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甚至让中国和印度相形见绌。但在阿拉伯海湾的极速城市化中学会了什么？我们似乎急需对海湾的变化有一种不同的理解，不再带着消极的目光，而是真真正正去了解和善用它的活力，严肃对待它，而不是一味批评它的荒诞。

安瑟姆·法兰克（Anselm Franke）说：充满可能性和自治性的艺术可以成为改变的药引。艺术的自由创造一种例外状态，有极大的可塑性，由个人而非社会所划定。法兰克批评道格·艾特肯（Doug Aitken）在《扩大图像、打破叙述》²（*Expanding the Image, Breaking the Narrative*）中号召建立一个拟真的图像世界，因为这等于是逃避跟情景现实、

* 人们认为在伊斯兰城区建迪斯尼是荒谬的，因为这个地方太专制、保守。——译注

社会框架和政治体制的直接碰撞。他指出艾特肯的书有点迷失的征状，将艺术生产空间理解为完全独立，而没有需要与整体环境发生关系的体系，这是很危险的。就今天的中东，我们也需要一种相似的思维：我们不能再假装中东的整个情况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们不能单纯地批判或赞扬这片土地正在产生的景况，我们一定要尝试理解，甚至投身到它的复杂多面的情况当中，从而“打破图像、扩大叙述”。冬季学院抱着这种可能有点天真的雄心壮志，进入到迪拜的特殊环境，结合我们的批判网络与地区内的知识。浓缩紧凑的工作室制课程，分成一系列的单元，每一单元都发展出一套方法，而这些方法都是指向“外来工人与大城市”（2008年）和“空间与知识的规模”（2009年）这两个大题目。这些单元由一个辅导员带领，各自探讨海湾地区的新兴空间现实的各个方面，特别是针对迪拜本地。单元以“谷歌地球”（Google Earth）作为策略工具，反映城市在全球背景下的形象，探讨迪拜城市结构中

外来工人营地的空间和位置，建立一个口述历史资料库，里面有来自各地、从事各种行业的外地人，包括来自孟加拉国的建筑工人，来自俄罗斯的性工作者，来自韩国的盗版手机卖家，来自东欧的建筑师，来自德国的文化顾问，还有酋长本人。冬季学院试图理解城市的一闪即逝的性质。与几个单位的协力，例如第三线画廊、交通设计画廊（Traffic design gallery）及《拜多》（*Bidoun*）杂志，确保了工作坊的成果不会烟消云散，反而能成为一场持续讨论的起点。乐观点儿说，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可以对本地和区内的实践产生长线的影响。

在迪拜，游牧式的小型学院是参与本地教育体系的最有效方法，所以冬季学院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很多方面，冬季学院都在采取与西方出口的名牌大学恰恰相反的方式——那些大学邀请对中东只知皮毛甚至一无所知的西方教师，与他们签订一种滚动合同，让他们教两三年便走，之后后继者又用相同的方式来到这里，所以这些教师没法留下

多少知识，没多少知识可以累积起来。冬季学院旨在建立一种动力，然后让本地拿走、继承或劫走，去按他们的方法继续发展下去，这个小宇宙将会提供一些另类生产模式的起始点。在冬季学院的工作室，资讯和知识被共享，空间生产不是根据政治和文化的等级，而是来自于对实验和探索的真正信念。工作室的环境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方法，一个工作和学习的模式，一个教学相长的模式。

冬季学院会继续以这种方法努力。它不会堕入共识政治的陷阱，它试图创造和居于一个另类的中间空间，在那里生产一个新的和有建设性讨论的散漫空间，一个在批评和赞扬之间的灰色空间。通过一系列的协力，冬季学院现在正开展新一阶段的工作坊：我们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UN-Habitat）合作，2010—2011年度的课程在科威特举行，2012年度则会在德黑兰举办。

注释：

1. Rem Koolhaas, "Introduction," in *Volume 12: Al Manakh*, eds. Rem Koolhaas, Ole Bouman, and Mark Wigle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GSAPP; Amsterdam: Archis, 2007).
2. Doug Aitken, *Broken Screen: Expanding the Image, Breaking the Narrative* (D.A.P./Distributed Art Publishers, Inc., 2005).

第十三章 没有指令

没有革命是根据已有的系统和结构原则发生的。我们要靠自己，要为自己而行动。政治需要个人主观的发明、想象和忍耐，更需要坚韧的精神和异乎寻常的想法。没有本体性或终世论的历史哲学可以帮助我们行动。我们在与国家之间的空隙内工作，我尝试将这种距离形容为民主，我们需要建构政治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既非随意无常也不是相对主义，但它根据一种普遍的道德要求，而它的证据是确切的现实情景。这是肮脏、琐碎、本土、实际的，而大部分都是惹人生厌的工作。'

——西蒙·克里奇利

作为一个公民，我可能觉得必须讲出我的想法，但不是作为一个建筑师。建筑师建造别人想建造的，然后领取酬劳。你只有一个选择：做，或者不做。²

——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

很不幸地，瑞士建筑师彼得·卒姆托说出了真相：一旦你决定参与一个标准的建筑项目，你便没有多少回旋余地。然而，卒姆托没有考虑到在黑和白之间总有一个灰色空间，所以当然也有可能让我们超越仅仅作为一个服务提供者，我们有可能主动地就项目的特别问题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在这个充满了全球冲突的现实中，我们很难相信这种单调，政府的观点真的就这么浅狭。从业者愈来愈希望回应和理解周遭的世界，响应最新的社会政治事件。³他们的信息很简单：要主动出击，否则，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

要进行这种没有指令的行动，便必须善用局外

人的角色，要明白建筑师不是一个只关心建筑物的人，而是一个会分析、设计和应用不同框架的人。这个概念的基础是独立建筑师对比建筑公司，创造批判性的边缘人对比纯粹的服务商——要主动去找出问题，而不是去等别人告诉你什么是问题。这种行动首先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它跟萨依德的“理想知识分子”概念相关，是一个在边缘工作的人，他不进入也与体制没有关系，不受系统的共识机器所支配。他不被邀请，强行参与。他的行动主动，自发，具有必需的乐观精神，得益于一个业余者的天真，懂得很好地表达崭新而清晰的观点。正是这种有效的乐观精神，让人有可能超越预期、恐惧、保守思想等所有共识机制带来的障碍。这种由局外人的实践将会带出什么才是当务之急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去落实一个预先想好的结果。这种实践不是意味着必须攻击任何一种共识，而是要推动具有冲突性、必要性的辩论，从而产生批判性的决策。这样的话，自发、独立、不请自来等概念便成为打破建筑师和

客户之间经常性的共识关系的原动力。作为一个起点，规模的问题十分重要。与其就宏大目标起义，不如以本土议题搭起一道桥梁，让我们走向具体而有建设性的问题。再者，我们应该考虑大众的反应，和项目的特殊论述怎样超出其本身而发生作用，从而设定问题的规模。超出项目本身便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批判性观点，为更多没有参与到项目中的人打开论述，进而引入一个非常不同的位置和角度。

这种实践可以由“超正常建筑师”（para-architect）带动，不一定指一种寄生的实践（parasitic practice），而是一种超正常（paranormal）的实践——它在空间实践中提供一个有建设性的位置，这个位置不属于任何一种既定的范畴之内，它总是在移动，总是在边缘，总是根据环境和情况而重新定位：它随着它创造的作品而发展。所以，它不再是一种范畴，它是一种实践模式。

基于以往一些项目的经验，例如与尼古拉斯·希尔施、米塞尔维茨及马赛厄斯·哥列治（Matthias

Görlich) 合作在科隆欧洲美术馆进行的“生产的空间”；进行中的中东冬季学院；与菲利普斯合作、最近进行的荷兰艺术机构 SKOR 的重建咨询工作；或与缺少研究学院 (the School of Missing Studies) 和沙迪恩·祖凡诺维奇·伟斯和凯瑟琳·卡尔 (Katherine Carl) 合作的为斯洛文尼亚政府做的“东岸欧洲”顾问工作 (这个项目从很多方面看都反映了一个局外人如何提出问题)，我们可以以这种实践模式作为开始，思考一种理想的规模及一个批判性投入的临时框架。空间框架实在、可见可感，所以是一个明显的起点。但似乎最有效的投入是微型的，而这些微型投入也跟更大的文本在对话。这些微型可以理解为人的社交行为，可以是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可以受体制或社会结构的程序和软体所影响，它可以是短暂而非物理的，它关于现在和未来多于关于过去。这种非历史的敏捷性尤其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实现及时反映现实的意愿和野心，而不是停留在纯粹的分析层面上。

如果一个人总围绕着已有的事情去想，他便很难改变事情的运作。正如在第八章中提到的，如果这些改变是来自一种推动对话和有利沟通的设计，那么我们便可以将设计视为对事物不同规模的重组。决策永远应该着眼于事情中最活跃的因素，而且应该针对多个层面、多种因素进行互动。为欧洲美术馆而做的“生产的空间”对于本地的网络特别敏感。然而，它不提出沙文主义或国家主义，它着眼于本地。这个项目不是就一个本土空间、一间机构专门来进行，而是一个内容主导的方法，利用不同框架的发展和生产。对于空间实践者，批评性和文本性的实践令他的工作获得了政治性。似乎，要看清情景中的权力分布，我们便需要一个可行的焦点，一个本土和特殊的光圈。这是为什么中东冬季学院是经常但不定期发生的，它是短期、浓缩、一年制的。在迪拜，通过这么短暂的课程，“学院”可以避过政治当权者的雷达。这个方法反映了一种能在特定系统中工作，同时又创造颠覆性的可能。

回到回应现实的批判性投入的话题上。这种方法也与墨菲的观点有关，准确地说是她关于民主、普世性和霸权的概念。墨菲不同意民主“看似”什么，而认为它同时而永远需要保持一种社会和政治的层面。民主是一个地方——其尽头既不为人知，也无法达到——尽管大家对于怎样去那儿都有不同的见解。

所以，墨菲的观点可以与邦妮·霍尼格（Bonnie Honig）的竞争政治性概念相比较。⁴霍尼格的争议政治理论发展自一系列的批评，但也像墨菲一样，是一个纯粹理论、未被测试的框架。她感兴趣的是竞争和对既定实践的捣乱，解放各种潜能。她认为政治性既不能化约为共识，也不能是简单的竞争，因为两者都是政治性重要的成分。简而言之，民主永远都是“进程中”的，追求民主和不同意见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方程式中，关键的分子是以非共识为有益的可能性。冬季学院计划决定采用实验室式的学院模式，邀请一些智囊去构思教学过程和地

点——正因为它旨在打开非共识和探索。民主永远都需要空间，让它被思考和想象。然而，这些空间不一定永远都完全符合民主原则。民主是一种悬浮的治理术，需要不断的重新估算和重新定位它的界限。民主决策永远都需要一个不同意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如墨菲所说，我们同意互相不同意：“符合民主的原则旨在行动（Handlung）的意愿，存在的多样化和转化。”⁵这表达了一个公共实践的模式。这种实践模式的难度在于永远创造可能性而非限制，以知识生产达到多样化，打开跨环境的辩论，而不只是自囚于自己的环境中。这里，环境（milieu）的概念与专业（profession）和范畴（discipline）非常不同，因为它提出了人行动的一些文化背景——例如艺术界就包括了很多不同的专业和范畴，但整体来说它也可以说是一个环境。

关于空间实践的另类模式，上文提及在科隆欧洲美术馆的“生产的空间”计划，可以算是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计划是对科隆市政府的一个弊政所

造成的损失和缺欠所作的反应。事缘当地政府计划拆掉科隆市美术馆的历史建筑，事前答应会建一座新的美术馆，但拆掉了老美术馆之后，他们突然说没有资金建新的美术馆。于是，一些本市和区内的艺术家、社会活跃分子和文化人组成了一个草根组织“Das Loch e.V.”，提出一连串疑问：可以做什么？关于体制的持续论述，无论是就它的软建筑和行政程序，还是它在城市中的物理建成，我们应该考虑些什么？于是便有了“欧洲美术馆”这个计划名称。这个计划不试图寻找即时的解决方法（例如筹款建造新的空间），也不选择接受市政府的提案（如与地产发展商合作，建一个多功能的项目）。组织决定走更艰难的方向，探索典型体制的种种冲突和问题：在当代现实中，一间欧洲的美术馆应该怎样构成？眼前的冲突被用作种植另一个冲突，然后有效地利用现在没有共识的情况创造新的可能性。结果是建立了一个临时的体制。这种情况下，共识会使事情容易很多，也更易于导致切实的结果，但欧洲

美术馆计划更感兴趣于重新思考一个模型，这个模型通过策略性地使用争议反思已有的模式，它产生论述而不产生地方。

作为一种主动投入的工具，参与模式是最有效的，但它不一定要是由下而上的民主进程。这是一个原因，解释了欧洲美术馆的创办总监尼古拉斯·沙夫豪森（Nicolaus Schafhausen）的方法，他尖锐地揭示了现有论述在关于体制在地方政治的角色的讨论上的欠缺。如果参与的框架够清楚，即如果有确切的群众对象，那么参与将是非常有效的。同时，这个框架还需要是非常确切的。在这个框架中的小结构可以含糊，但它需要有特殊针对性，却不需要普世适用；它需要清晰明确的目的和目标；它需要针对一群人，需要注意这群人的背景，却不只需要某方面的专家。它提出微型政治抗争可能比宏观政治雄心壮志更有效。这个概念有点不同于同时在不同层面工作的方法，即墨菲等人提出的，主要在政府的层次上作改变，同时处理地区和微型事务。在

体制和地区的细微处，冲突的效果是最为立竿见影的，所以这些地方是最好的试验场，为更大的社会冲突做准备。细微之处的重要性在于它高度本土化的性质，可以专注于产生改变。通过提出非常具体的目的和目标，它可以非常确切，可以很快地以现实验证。这就是说，我们根本就不用提哈尔特和奈格里的全球方式，因为他们相信连属于某个地方的想法都是要排除的，他们想象以一种国际化的思维去盖过所有本土的特殊性。

与其讨论现存的分类、理论、思想模型，我们更急需传播的是一种更为冲突性的参与，不是由一个人邀请其他人“进来”，而是人们在“没有指令”下行动的方式。强行进入一个论述、项目或现实，正如第十章中讨论过，这些都有可能从对它的内部结构不感兴趣的外部元素处获益。这不是说将不会有或不能有共同的著作权，但传统的主事者和行善者应该被一种主动（而不是纯粹的善意）的实践取代。在这个意义上，参与或涉及到一种网络的另类

概念，不是一种创造共识和在同一环境中的讨论的方法，而是一种让冲突的声音和观点碰撞的可能性，让人们可以参与他们希望参与的事务，激发行动的可能性。

注释：

1. Simon Critchley, *Indefinitely Demanding: Ethics of Commitment, Politics of Resistance* (London: Verso, 2007), 132.
2. Peter Zumthor "Wir Schweizer sind nicht so anfällig für Moden," *Spiegel* online, May 29, 2009, <http://www.spiegel.de/kultur/gesellschaft/0,1518,627167,00.html>, trans. by the author. "Als Staatsbürger habe ich durchaus das Bedürfnis, meine Meinung zu sagen. Als Architekt nicht unbedingt. Ein Architekt baut am Ende das, was bestellt und bezahlt wird. Da hat man nur eine Möglichkeit, sich selber einzubringen: Indem man sagt, das mache ich, oder das mache ich nicht."
3. Claire Gilman and Margaret Sundell, eds., *The Storyteller* (Zurich: JRP Ringier, 2010), 7.
4. See Bonnie Honig,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Christoph Möllers, *Demokratie—Zumutungen und Versprechen* (Berlin: Verlag Klaus Wagenbach, 2009), 55, trans. by the author.

第十四章 中立的实践者

总有些迷茫的人，以为凭一人之力可以改变什么，你要杀了他才能说服他他是错的，这就是民主的争论。

——参议员 Charles F. Meachum¹

我将我的方法比作顺势疗法：在系统中放入毒素，激发治疗衰弱处的能量。²

——古斯塔夫·梅茨格（Gustav Metzger）

西蒙·克里奇利认为，哲学总是始于失望。³ 虚无主义即意义秩序的崩溃，令我们想象中所有最稳固的道德基础都变得没有意义。克里奇利说，哲学活动——自由的思想活动、批判反思的可能

性——“的定义就是对虚无主义的抗战”。⁴ 为了对当下社会政治气候保持起码的乐观，我们需要创造一片土壤，让我们可以不必再不断慨叹世情，不用满怀悲观，不必一味抹黑当代状态。正如彼得·斯劳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认为，一个设计师需要试着去装裱某种专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是自主的个体，但不是通过相对的专门化，而恰恰相反：一个当代的“专家”需要做的，不是成为某一个领域的绝对专家，而是一个畅游在实践海洋中的不专业的大师。斯劳特戴克认为，设计就是巧妙地掌握这种“不专业”（the skillful mastering of incompetence）。⁵ 巧妙的“不专业”是一台中性的仪器，一个平行的现实，其中，即使有那些刻意埋没自己意识的人，实践都可以持续、乐观地生产。

思想要是自由的，便一定不会抓住既有、实用或“正确”的观点不放，不会停留在陈旧的实践和经验中。在局外工作的人就像一个不进入体制的自由人，在某种程度上他好比一个外聘顾问⁶，他也

主动演绎一种边缘性。要克服这种边缘性面对的孤立处境，就必须努力不懈地协力、投入、试图改变——不仅需要知识思想的带动，更需要一种局内人无法拥有的距离，这种距离将创造出不可多得的批判精神。这是一种以主动和坚持的精神引发改变的实践模式，与主流共谋就意味着它的死亡。这种模式需要一种以结果为主导的实践模式，它的可能性只能以现实来验证。与其在理论上不断反刍它的可能性，不如造出具体的事来，这样才可以批评、改变、扭转、编辑甚或推翻它的结果。所以，这里关键的概念是“具有建设性、批判性的生产力”。我们应该定下目标，例如每年要做出十件事来，然后从潜在的错误中学习，从而发展出一种实践。真实的验证使我们更灵活变通。这验证需要在合适的环境中进行，需要与他人的协力，需要跨文化地进行，以避免自我、虚荣、固守象牙塔的心理作祟，这些心理都极有碍于批判性和有效生产：

戏剧可能会变成一种自娱自乐的游戏，就像一个清洁阿姨在舞台上拖地，她看着窗上自己的倒影，她意识到自己拖地时屁股的扭动是多么的美。舞台的地板有没有拖干净，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了，因为那屁股的扭动才是拖地的绝对成果。这是我对当下戏剧的看法：一个除了她自己屁股的猥亵的扭动外，什么都不想的清洁阿姨。⁷

借用马丁·乌特克（Martin Wuttke）的比喻，我们似乎必须在现行实践和当代状况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灵活多变的方式，避免走进死胡同。今天的实践者应该对政治保持敏感，不应在文化政治中游走却不听不想不看，像迪德里克·戴德里克森（Diedrich Diederichsen）说的“代民主参与”⁸（surrogate-democratic participation），即在严肃的专业工作中彻底失去政治意识。在当下的气候中，我们必须摆脱那些90年代末以来风行的、人人趋之

若鹜的魔术词——可持续性、参与、民主、诸众，我们不应将这些词简单地用作政治标语，而更应该用实际行动验证其背后的意义。这种词还有很多，它们将我们的注意力从眼前事物调到宏观的想象中去。在政界，各党各派，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同样使用这些词。⁹有时，在口边挂着这些词似乎很酷，至于你是否真的相信这些词所代表的理念和可能性，倒变成了次要问题了。这是一种主流时尚，在不同学科范畴、不同政见派别中都流行。整个文化实践的意义在于提出和预示可能的未来，它通过（对公众来说过分抽象的）批判理论和实践，来考察各种可能性。¹⁰

但又有人会说，文化实践的真正价值是藏在那些不尽依靠理性思维或共识的方法中。我们不妨以英国上议院中的中立议员作为一个有趣的例子，但不是指上议员那整体政治结构和保守的组织，而是中立议员作为一个特别的组成部分，预留了空间去提出挑战以及引发改变。中立议员就是独立的参与

者，他并不属于任何政党，也没有惯常倾向的政治阵营。虽然这也令他成为一个不那么可靠、稳定的角色，甚至显得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但相对于议会上其他以共识主导的，什么都一早已内定了的政党，中立议员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可能不偏不倚的观点，尽管这些政客肯定也有他们的政治姿态和意见，但他们没有党籍，不像其他政客那样有党有派。中立议员在议会的座位安排也反映了这一点：工党议员坐一边，保守党议员坐另一边，中立议员坐在中间，靠向房间的后面。

现在，参与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部件，它的最终目的还是维护新自由主义的系统，不再有人探讨真正的权力问题。在这种“指导下的参与”和被高度控制的政治投入下，我们应该提出一种自主的参与实践，将冲突看成推动力而非阻力。我们需要反思 90 年代以来浪漫的“参与”模式或行动，重新认识中立者的作用和责任：一种冲突性参与模式，不再依赖别人的邀请，而是在没有共识指令下

行动，不偏不倚地激发有效的生产。

参与中往往有太多人作决定，却只有太少人愿意承担责任和风险；太少人勇于将决策付诸实行；太少人勇于真正地向前迈进。政治实践固然必须专注于某个地区范围，也必须坚守民主的基本原则。然而，总是靠主流意见来作出决策也有潜在的害处。民主的两难在于，如果投票的人都是笨蛋，他们自然便会推举出一个笨蛋政府。像最近在瑞士关于回教寺庙的公投那样，只要有人有足够财力去动员那些笨蛋，便很可能将整个国家都变得很笨。参与的浪漫想象的核心问题是，它以为所有人都应该参与到决策中，但事实是很多议题不是人人关心的。英国《太阳报》(*Sun*)、《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德国《图片报》(*Bild Zeitung*)都是读者人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是否因此我们就要相信它们的内容？这个问题加上近十年来参与性项目的发展，其实正指向一个更大的危机：左派的问题和无助。如果他们决策的唯一方式是外判，是将

责任抛给公众，那么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民主制一定出了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十年的阴影下，我们目睹右派的重新抬头，并奇怪地好像能解决问题。这极尽讽刺，几乎令右派变得无懈可击：“左派可能在政纲上取胜了，但右派打赢了公共关系的战争。右派用了老套的方法，它掌握了古老的花言巧语的艺术，它用的漂亮词汇一旦进入公众的心中，便很快能站稳阵脚。”¹¹

在今天的种种情况中，建筑师的角色可以是什么呢？一位当代建筑师面临的难题是他的职业已不复存在了，这个职业不再有所谓的核心技能，但斯劳特戴克已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是优势而非问题。每个公司都有它的核心技能，例如索尼就是电子产品小型化，本田就是内燃引擎，3M 就是所有粘贴的东西……但即使你做某件事做得再精，它的需求也可能在某天消失掉。所有加入这些公司的人都应该明白只有当这些专长可以应用到不同范畴时，才会有价值；他们要知道怎样设计这种转换，知道人们

为什么需要它。直到今天，很多建筑师还是不懂得这一点。在过去几十年来，他们慢慢遗忘了这种长久以来建筑教育必教的技术。在文艺复兴时期，博学者、多才多艺者是建筑师的典范形象。他们是善于思考的饱学之士，他们懂得横向思维（lateral thinking）。在不同的时代，人们为建筑师定义了不同的主要工作，但最有趣的是，建筑师可以让不同层面变得穿透，互相关联起来。

与其缅怀过去，不如乐观面对新挑战和新可能性。有些建筑师十分善于发掘相关领域，这一领域就是建筑业，即制造建筑物的行业。但当决策总是交给错误的人去落实时，建筑师便不得不觉醒了。他们获得了一种有益的怀疑主义。近几十年来，人们所知道的建筑专业已解体为一堆杂乱的实践；本来一种专业，一个定义清晰的范畴，变成了一系列的有点政治化的实践，这种转变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¹² 这些实践试图达成很多相互矛盾的目的，但它们用的都是同一种素质，那就是想象和阐述的可能

性和技术，还有设计出容许事情发生的策略性框架。然而问题是，这种抽象的素质还继续被应用到老的领域上，这使得建筑师一开始便失败了。这提出的问题是关于如何定位和一个人如何在更大的批判实践领域中自处。不难认同，某些不专业的人或实践正在主宰这个专业。然而，在文化领域中，还有很多可以发掘和占领的空间。发掘稳定和不稳定之间的潜在空间，批判实践可以被视为一种舞台设计，一种排演未来的策略手段。犬儒派也许会说，建筑项目本身就是一种松松垮垮的说故事，而他们可能多少是准确的，那个人需要做的就是把故事说好。

这种全才的实践不只给建筑师找到了新角色，也给一般批判实践都找到了新角色：超越传统的物理建构，转向现实的建构，不跟随原型，而是去主动创造原型。这包含了非学院知识分子的抗辩，一种超越学院的广泛声音，虽然这些声音也必然得益于学院。¹³ 更为甚者，中立者不应该只隔岸观火。他们应该投入政治世界，因为政治世界恰恰充满了

权力和利益的考虑，不像学院，政治世界可以影响整个实践、整个社会，而不只对学生有影响。我不是试着要夸大，但我想指出在危机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更大的知识理性上的承担。在这个意义上，从相对抽象的理解和阅读，转向有更直接影响和挑战性的社会改变和转化，这可能将局外人的观点表达得更大更广。“宣称只是为了他或她自己，为了纯粹的学问、抽象的科学而写作的知识分子，不但不能相信，而且一定不可以相信。”¹⁴ 在这个看法中，萨依德直截了当地指出最关键的问题：“身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一面就是代表经由你的工作和介入所宣告的事情，而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机器人，奉一种系统或方法之令行事。”¹⁵ 按照萨依德的意见，重要的是永不遗忘你有选择权。选择就是力量，即使在个人身上也是如此。

政治空间包含决策和判断，要判断就必须引入等级系统。这是一种策划的实践，其核心是策略和拆卸，因为做出选择就是去决定要排除什么。在批

判空间实践中，建筑师作为一个策划人可以被视为一个刺激者，通过引入冲突的区域，转化文化景观，那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的结果，它包含了完全不同和相互矛盾的人、体制和空间。我们于是便可以提出，与其培养下一代的活动者、中介人，不如去鼓励那些不偏不倚的位于边缘的局外人，等的只是那个对的时刻，在既有论述和实践中打开裂缝。局外人有意识地排斥先入为主的意见和做法，他们进入领域中，只带着创意和与现实相应的知识。他们毫无畏惧，不怕制造摩擦，不怕动摇现有的权力关系，局外人打开一个改变的空间，一个可以让“政治性政治”出现的空间。

我们的问题始终是如何将这一切视为机会，并尝试在各式各样的实践中找到每个人的定位，找出这个位置是否能让个人产生更多的质量和实用价值。中立的实践模式恰恰可以被形容为没有清晰指令的行动，它是主动的参与投入：它来自一个有意识的自由工作者，提出关于参与的一种异质的新定

义。这种理解非常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乐观地面对未来。它认为一个人可以通过实践、而不是通过学科和专业来定义自己。这样的话，某种技术和某种核心技能取代了学科和专业主义的传统理念。参与创造了一个另类的平行世界，它是由自发性、政治目的性、协作意愿和不惧怕排除的精神而来的，而不只依靠不去发问的包容。这种批判性手段一定不可以将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但也决不能没有立场。换言之，不能不承担责任，但也要具有弹性，要灵活，要打破条条框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中立策略的缺点，因为它们往往是短暂而本土的，所以可能有缺乏宏观、长远视野的危险。

于是，除了一小部分的实践者之外，艺术和建筑世界（作为实践而非纯粹批评的）团结不再有效了。艺术实践很少创造出比标语口号更有意思的东西来，艺术欢快地生活在愉快幸福的泡沫中，所谓参与只是小圈子活动，结果去掉了所有的政治性。

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引入批判反思，在体制内外思考价值观、定位和政治介入的短暂性。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应该可以勾勒出对参与和关系性的另类理解，被动的演员变成主动的重要角色，超越关于社会情景的事件性艺术生产，迈向一种直接和个人的投入，务求激发某些特定的未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避免被困在某个环境中，例如艺术环境中，或者不能困在一个特定的政治计划中。人有脚所以他可以走，不会老是不动，要不然我们就做树算了。这需要以内容和目的为主导的游牧实践，以批判性探询为动力，这是一个非常之散漫的定位，从某领域出走只是为了可以用一种不同的方式重新进入。它应该容许一种暧昧性，从纯种变成杂种的同时要承担责任。这位实践者是一个合作者（co-author），而不仅是参与者，他不再需要被加诸以结构。虽然“自由的激进者”并不存在，没有什么是纯粹的（相反，所有事情都有两面性），这种实践依然需要朝一种不会沦为共犯的理想迈进。要使主动的参与变

得有意义，此三者必不可少：态度、适合性和责任。很不幸地，这些都是缺少的。

空间是行动（Handlung）的结果。¹⁶ 消极的抗争是不可能造成改变的。实践不仅需要超越简单的吸收，而且要真正地反映现实：它一定要进入实际的情况，将自己变得可见，变得工具化。当参与变得没有意义，仅仅代表一种政治正确性时，这种建议性的，而不仅仅是推理性的实践的概念提供了一种争议性投入的温床。

在近五十年来的次文化运动中，我们见到的是勇悍的前卫性，而不是民主参与的概念：第一手现场，考察未知的领域，消息时有时无，但总是生活在地下世界的荒野和危险中。¹⁷ 正如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形容的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对于他，孤独给批评家提供了自主性，而自主性就是他产生作用的必要前提。”¹⁸

注释：

1. 2007 年电影《生死狙击》(*Shooter*) 中的角色。由 Ned Beatty 扮演。
2. Gustav Meztger, interview by Mark Godfrey, "Protest and Survive," *frieze*, no. 108 (Jun-Aug 2007): available at http://www.frieze.com/issue/article/protest_and_survive/.
3. Simon Critchley, *Indefinitely Demanding: Ethics of Commitment, Politics of Resistance* (London: Verso, 2007), 1.
4. 同上, 2 页
5. Peter Sloterdijk and Sven Voelker, *Der Welt über die Strabe helfen-Designstudien im Anschluss an eine philosophische Überlegung* (Munich: Wilhelm Fink Verlag, 2010), 11-12.
6. 也可参见第 8 章《向市场学习》。
7. Martin Wuttke in Stephan Suschke (ed.), *Nahaufnahme: Martin Wuttke-Theaterarbeit mit Schleef, Müller, Castorf, Pollesch* (Berlin: Alexander Verlag, 2010), trans. by the author.
8. Diedrich Diederichsen, *Eigenblutdoping-Selbstverwertung, Künstlerromantik, Partizipation* (Cologne: Kiepenheuer & Witsch, 2008), 279.
9. 同上, 49 页。
10. 同上, 184 页。
11. Stanley Fish, "Intellectual Diversity: The Trojan Horse of a Dark Desig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The Chronicle Review*, February 13, 2004.
12. 在第 3 章中 "The Grand Narratives: Life after Bilbao" 也有描述
13. 见本书第 11 章《未来的学院》。
14. 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110.
15. 同上, 121 页
16. 也可参见 Martina Löw, *Raumsoziologie* (Frankfurt: Suhrkamp, 2001).
17. Tobias Rapp, *Lost and Sound* (Frankfurt: Suhrkamp, 2009), 49, trans. by the author.

18. Marcel Reich-Ranicki quoted in Uwe Wittstock, *Marcel Reich-Ranicki: Geschichte eines Lebens* (Munich: Karl Blessing Verlag, 2005), 192, trans. by the author.

大写建筑

与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对话¹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以下简称奥布里斯特）：一开始，我想问你这个问题：你的建筑偶像是谁？

马库斯·米森（以下简称米森）：塞德里克·普赖斯。

奥布里斯特：这一点我们是相同的，普赖斯也是我的偶像。1998年我们做《移动的城市》展览时，我与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一起认识了普赖斯，之后我们几乎每周都见面，直到他去世为止。我想我们今天可以说没有多少建筑师像普赖斯那样改变了建筑的历史。他只用了一些设计图、建筑物和文字，便为建筑引入了时间的元素。他也

是 21 世纪伟大的文化机构的先驱：我想到他的“欢乐宫”（Fun Palace），仍然那么能代表一种乌托邦精神，一种跨学科的工具；但我也想到他的“陶思带”（Potteries Thinkbelt），一间移动的学校，一日比一日变得更有意思。我来自艺术策展的领域，像“欢乐宫”和“陶思带”这些文化机构，还有他在建筑中对时间的考虑，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普赖斯对你作为建筑师有什么影响？

米森：我一直对普赖斯的项目中的暂时性质感兴趣。在过去十年，人们愈来愈迷恋建筑的形式主义，特别是那些没有意义的、计算机生产的设计。很多建筑物愈来愈像自我参照物。不知怎的，很多建筑师将他们的职业联想成某种雕塑艺术。建筑师老是比其他论述落后十年，这一点我很喜欢。我想普赖斯最伟大最有价值的概念，也是他的核心理念范式，就是建筑物不必是一件物，它不必是物理的。普赖斯问了一个很聪明的问题：“如果科技是答案，问题又是什么？”建筑真的是在时间中发生的。那

已经是他的很多项目的本质，而现在，在这个金融危机中，这个概念更是比任何时候都有用。我想问问众多所谓与时俱进的建筑师：“如果参数化城市设计（parametric urbanism）是答案，问题又是什么？”

奥布里斯特：但普赖斯也建造东西的。前阵子我在伦敦 Robert Fraser 画廊看到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设计的一张精彩绝伦的桌子。还有伦敦动物园的大鸟笼，也是他的一件杰作，那是我最喜欢的伦敦景点之一：一个移动的大鸟笼，随着风向而改变形态。那么，普赖斯的“建造”的一面是如何影响你的？

米森：他的建筑作品一直以来都有一种舞台的质量，就像一个舞台的陈设，一个不确定性和可能性的空间，让事物得以出现和发生。所以，任何在物理空间发生的事都像演出，而当你看普赖斯处理作者权的问题时，每个项目中最关键的工具和等式中的元素都是使用的原型、策略性框架和项目设计

的方式。普赖斯以细腻而谦逊的方法将自己理解为一个服务提供商，他提供内容以创造空间，这一点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奥布里斯特：在继续谈之前，我还有一个关于偶像的问题：普赖斯最后为纽约市做的项目（曼哈顿西区的发展建议），他计划发展一个城市的肺，一个自由的区域可以为城市提供氧气。对你来说，除了普赖斯之外，什么是你的“氧气”？艺术、建筑，或生活中的其他东西？

米森：我在教育结构和让知识交流和创造的社会团体中获益良多，这是我全心享受的。近几年来我做的很多项目都跟教育有关，特别是涉及小型、自发的体制，例如我在中东开创和监督了一个项目，名为“中东冬季学院”。在头两年，这个学院设于迪拜，是与当时我任教的伦敦建筑协会（AA）合作的。开始时，中东冬季学院就像AA的一个卫星学校，但在2010年，我开办了第一届独立的冬

季学院，现在正在科威特进行，是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IFA 和一些本地和区内的机构合作的。下一学期我希望在德黑兰开办，但科威特的模式也可以是更长期、更持续性的。我们的概念是这所学院会在中东漫游，引入地区知识，在各个地方引发一些建设。我认为这个项目最有趣的一个方面是重新思考建筑和城市设计的教育，要通过应用的、小型的学院，而非简单地进入既有的模型——至少在中东应该是这样的。除了对教育的兴趣外，我还在进行几个研究项目以及很多写作。对我来说，能不断地转换题目和活动是很重要的，应该时刻保持灵活和好奇，不能让自己沉闷和故步自封。然后，当然，还有另一个世界，那就是我的私人生活，我是完全将它与专业生活独立开来的，私人生活就像一个避难所，当我身心俱疲时，恐龙二世（Dinosaur Jr）和 Neu 的音乐总是给我有效的治疗。我会说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的作品和乌特克的演出也是我的氧气源泉。

奥布里斯特：这正好将我们带到地理的问题。你似乎总是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你的办公室（nOffice）也从伦敦搬到了柏林。你可否谈谈这两个城市。

米森：当然。我和我的两位合伙人尼尔森和拉尔夫·普夫卢格费尔德（Ralf Pflugfelder）都很喜欢伦敦。我自己在伦敦的生活非常开心，我在那儿住了七年，先是学习，然后在伦敦建筑协会教书，但总会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需要改变。我很难想象自己永远住在伦敦。而且，有一个时刻，我们开始考虑伦敦是不是对 nOffice 的持续发展有利。在我们决定搬迁之时，金融危机尚未发生，伦敦还是一个非常昂贵的地方，所以我们觉得搬迁是合理的，我们找到一个日常开支不那么高的地方，让我们可以进行不同方式的实验，不必再担心在伦敦时的那种经济压力。有了这种考虑的话，柏林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特别是在这儿建立一个基地是很好的。经常，我一个星期只会待在柏林两到三天。

奥布里斯特：你可否给我讲讲 nOffice 正在从事的不同项目。我知道你刚刚在纽约完成了一个 Performa 空间，那是一个表演和吸引各种活动的聚合点，这个概念也与普赖斯有关。

米森：是的，Performa Hub 是罗斯李·歌德堡（RoseLee Goldberg）委托我们做的，那是一个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困难的项目。最早是在 2008 年，Performa 双年展找到我们，希望我们参与。但是当时他们没有预算，也没有一个实在的场地，所以有好一阵子我们是真空工作的。我们对这个项目的可能性感兴趣，也想用空间的方法储存 Performa 创造的内容，同时，这个实体建筑物也可以成为他们活动的一个焦点。最后，Performa 获得了一个空间 [新的柯柏联盟学院（the Cooper Union）的地下一层]，而我们也得到了一笔很有限的经费，所以我们要用 14 000 美元的经费，在七天的时间内，设计好一个 250 平方米的空间。我们仅仅在双年展开幕的两个星期前才接到工作的通知，于是我们决定

用最便宜的物料去制造一个大型而与众不同的室内空间。整个结构基本上是一面巨大的墙，上面有好些袋子可以包括一些固定的节目，其他节目也可以同时进行。这是一个节目的混种空间。那儿还有一个小剧场，是整个创新的空间的背景，它成为双年展每晚的节目的大舞台。

奥布里斯特：你们还有哪些项目在进行？

米森：现在，我们在柏林进行一个相似的项目，这是一个在克罗伊茨贝格（Kreuzberg）的空间，名为文献柜（Archive Kabinett）。它也是一个混种空间，是一间画廊，也是一间文献库，它是由 *Archive Journal* 的出版人奇亚拉·费歌妮（Chiara Figone）委托的。我们也在为巴西一间图书馆和媒体中心工作，那是一个更大项目的一部分——巴西东北部的海岸地区的一个文化集结中心，旨在加强本地社区之间的联结。这个项目的整体有趣之处在于，它没有委托一位建筑师去做一个宏观的设计，

相反，它邀请了来自不同界别、不同背景、有不同兴趣的空间实践者参与到该项目中。于是，一方面它有奥斯卡·尼迈尔（Oscar Niemeyer）参与，也有更年轻、更新锐的建筑师参与。为了这个项目，我也开展了一个更长期的研究项目，与蒂娜·迪卡罗一起。这个项目有一段时间是与我们在鹿特丹的贝尔拉格建筑学院设立的研究室联结的，我们在那儿任访问教授，有十个学生，他们跟我们一起到过巴西几次。现在，nOffice 还在柏林进行一位艺术收藏家的家装设计和一间画廊的设计。

奥布里斯特：我的所有访问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落实的计划，那些因为太小或太大而没有落实的计划。

米森：谈这个问题就谈到我俩的关系了。nOffice 的最有趣的没有落实的计划，就是跟你在过去三年以来的合作，那就是将你的个人档案和图书馆公开让人使用。大概在 2008 年，这个计划

变得实在起来，我们甚至找到经费在瑞士恩加丁（Engadin）设立一个空间。但很可惜，当地政府反对我们其中一个建筑物，就是我们希望能在瑞士国家公园里面建的。我们现在还在找别的方法。这个项目是一个档案馆，但也是一个公共的图书馆和活动的场地，或者可以作为一个夏季学院、一个展览场地，或者一个艺术家驻场的空间，所以它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我们会乐于长期围绕它而工作。作为实现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我们现在在研究你收藏的档案中有关普赖斯的部分。我们跟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 Armin Linke 的 HfG 合作，因为我在那儿有教职，我们跟六位学生合作，将所有录像艺术家资料数码化。更一般来说，将为内容设计空间成为我们实践的惯常方法，我们似乎迷上了档案馆和图书馆，我们很多项目都是围绕这些类别的空间和相关主题的。

奥布里斯特：你总是在写书，从 21 世纪的

参与的考察到欧洲的多面概览。你现在又在做什么书？

米森：我正在做好几本书。其一是一个长期计划，与约瑟夫·格里玛（Joseph Grima）合作的，是一个由哈佛的奖学金资助的计划，它是关于中东的空间概念的研究的书。我们观察中东，特别是科威特，作为一个批判实践的自成体系，我们也重新思考关于内容生产而非知识分配的会议的形式。

奥布里斯特：我对你怎样看待跟你同一代的建筑师很感兴趣。你跟谁的联系比较多？你是不是某个潮流中的一分子？

米森：通常我很尊敬的人，多是来自其他知识范畴的。在建筑界，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因为你说的潮流在我这一代人中并不存在。我看到他们唯一的共同兴趣就是那种参数化设计，但坦白说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死胡同，而且，很多走这条路

线的建筑师都是将自己跟周遭世界完全地隔离开来的。就你的问题，其中的问题就是“我这一代”还太年轻了，还没有资格建造什么。我三十二岁，很多建筑师要到四十岁才开始建造什么。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借口，但的确在我的年纪层很少有人建造了什么有趣的项目。与我合作的建筑师，多倾向于以调查研究作为空间内容、空间生产的驱动。例如，我经常跟格里玛合作，我也很敬重康多拉莉、耶斯科·费萨和艾亚尔·威兹曼的工作，虽然他们不完全是“我的一代”，他们比我年长。我非常喜欢他们的方法，也欣赏他们不过分注重形式的问题。我认为他们的作品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们有启发性，无论它们是否发明了建造空间的新问题。例如，他们的工作就跟其他的年轻建筑师如比亚克·因格尔斯（Bjarke Ingels）或朱利恩·德·斯密特迪史美迪（Julien De Smedt）有非常不同的定位。后者试图模仿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近二十年来的所有做法和人力架构，他们试图在两三年之间做起来。

相反，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就我们能应付的特殊情况去建立一小套技能，通过不同的文化生产模式。这也是说，举例说，十年之后我们不会在十个不同的国家完成了二十个预算巨大的建筑项目，但我们会就某一种空间实践，例如档案馆、图书馆或机构的空间发展出一套议程。如果我要就今天的建筑说一句，我会说有些榜样角色正在转变。建筑令人沮丧的地方，就是它是一种不断推延的实践，它讨论的事情永远比其他范畴（如艺术界）讨论得晚十年。这一点在我这一代人稍稍有改变，因为这个专业已不再完全的定义分明了，它变得更具弹性，更灵活，它容许更多别的东西渗透进来。我们很多人都不是靠从事建筑赚钱，但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身份都是建筑师。

奥布里斯特：你提到你作为老师的工作，那你对 2009 年的建筑学生有什么建议？

米森：要树立榜样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有这么多建筑师没有工作。学生必须问自己,第一,他们是否真的希望将建筑和城市设计定为他们的专业背景;第二,在这个转变中的专业中,他们视谁为他们的榜样?我说的榜样不是指偶像,而是指“某种”实践的原则。大写的建筑(传统意义、定义分明的建筑专业)已不复存在了。已不再有资金,大部分的大型项目都被跨国企业发展商吞食了。我想,如果我们还是看着那些 20 世纪的建筑师为榜样,即那些大写建筑的代表,那么建筑和建筑师注定都会失败。近二十年来,有一股全新的发展商和其他人的浪潮出现在建造业中,他们取代了某些本来属于建筑师的工作。所以,建筑师最迫切的任务是划出一片另类实践的新空间,像库哈斯的 OMA 做出了很了不起的实践,但要是没有库哈斯,他那种工作范式和规模也不会存在。同时,OMA 或哈迪德或弗兰克·盖瑞的工作室在结构上并不令我感兴趣,因为它们设定了一个大型的行政结构,我觉得那是令你变得不灵活的框架。对于学生,我会说最重要

的是去问我们的实践倾向，同时好好利用这场经济和生产内容的危机，将之作为一个发展新的实践模式的好机会。

注释：

1. 本对话的简略版本最先于2010年2月发表在 *Kaleidoscope* 第五期。

后记

杰瑞米·宝德利 (Jeremy Beaudry) 和巴萨姆·艾·巴朗尼

梦魇是你的内心产生的一个图像，是你清醒的思维无法想象出那么恐怖和强烈的图像。睡觉时，你的潜意识向你展示你的清醒的内心所不能描述、不能构成的如此严峻、如此可怕的景象。在这个景象中，熟悉的和似是而非的都极端得可怕，或者呈现出没有任何办法解决的困境。你被困在一个无穷的黑洞中。

从恶梦中醒过来，即就是要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你不能在梦的逻辑中逃出梦，你一定要离开梦的世界。回到意识的范围，你便能明白到你是梦的舞台上的一個角色，同时也是这出戏剧的观众。你观察这个角色，这个人就是你自己，你在做一些在梦的逻辑中自然而然也无可避免的事情。但逃出了

那个世界之后，你的清醒意识走出了梦境，看到了这些场面完全是虚构的……你看到的灯光、摄影机、道具、其他演员，那恐怖的怪物不是真的，只是一只会动的巨大布偶。

在参与的梦魇中，政治主题陷入了一种表面的参与、虚假的参与的逻辑当中，这种逻辑被夸大到空洞的程度。这种参与的力量就是催眠的力量，令我们无法从恶梦中醒过来，让我们被迫继续扮演我们的角色。为什么参与会变成了一场恶梦？在 80 年代，西方的参与政治模式兴起，成为一种合法合理的力量，它是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舞台的一个重要进展。在这里，参与是一种工具化的政治实践。参与变成了自由民主编排好的场景，你只需往里面加入演员、道具、灯光、摄影机和电动怪兽而已。醒来吧！

这是参与的一个最差的场景！试想象：联合国决定建造一个 21 世纪的新总部，这个建筑物要反映出全球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国家。于是，联合国邀

请来自全世界所有角落的建筑师、设计师和理论家组成一个专家小组，构想一个世界建筑史的新高峰。在这个场景中，我们便能清楚看到参与的梦魇：从那些非西方的参加者那里，我们想要什么？例如一位来自莫桑比克的建筑师，或者来自阿曼的室内设计师？他们应该怎样贡献？他们的文化吗？他们的参与的前提是什么？

他们来自这些地方，是不是就代表了他们一定会用他们祖国的方式思考？他们的不同之处是否那么清楚，那么简单？或者这种差异已经不像旧时代那么明显？又或者，他们的差异大到根本就建立不起任何共同的基础？

又如果这些热心的参与者果真代表了一种非西方、非现代主义的方法，那么他们的参与又真的会被认真处理考虑吗？如果他们的不同性达不到被接受的水平，那么会不会有人理会他们的参与？

当然，这样会有很多不同声音的代表——毕竟是联合国！——但之后又怎样？代表仅仅是表象

的，而表象只能为潜意识提供内容。之后又怎样？什么都不会发生，因为没有人想有什么发生。我们一定要想有事发生，然后清楚指出我们的期望。我们不需要代表，我们需要真实的东西。要想从恶梦中醒过来，我们就需要一个不仅有表面作用而是有实际作用的机制。在上述的场景中，由于这种人为的不同的本质，自然而然就有很多争议。差异从来都是人造的，但要融合差异我们必须建构一个清醒世界的机制，一个可以对应生活的复杂性的机制。我们要离开为对抗而对抗，从而建构解决方法。对抗是来自系统外部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是悲观而不互动的。它聆听，仅仅为了在它自己的批判机器内消费和循环那回应。醒来吧！

只有当我们醒过来，在一个奇怪的世界中，接受了一个以不同的尺度衡量事情的秩序，参与的梦魇才会破灭，可能这恰恰是我们不想从恶梦中醒过来的原因。可能醒过来、回到这个我们不能主导的奇怪世界的这个事实才是我们最害怕的恶梦，所以

这也可能是我们宁愿生活在这个循环不断的参与的恶梦中的原因，因为至少我们对它很熟悉。

在这部书中，作者和他的合作者尽力解释了这场参与的恶梦，为的就是提供一系列与这种“政治趋导的伪参与模式”相异的方法。他们提出的各种策略引用了不同学科和知识基础，并以几种不同姿态出现：不请自来的局外人、中立参与者、管理顾问／系统设计师，等等。我们以上的说法可能比米森的更有想象，更有比喻性，但我们明白这个计划就是为了引导我们走向清醒意识，让我们看清参与的恶梦的真面目，逃出它的阴霾。它的号召很清楚：醒来吧！

跋

卡森·陈

你手上的这部小书试图勾勒出一个假设：有时，我们必须不惜代价地对我们所读的保持怀疑。在我看完米森的《参与的恶梦》的第一稿之后，这种感觉一直跟随着我。因为这本书没有带出米森本来想传达的——将建筑实践模式重新设定为一种争议性系统——但却传达出一种更强更尖锐的附带意识，即一种对体制的主动不信任和对自我的强韧的信心。米森用了一种特别的讨论方式，那是一种坚持的语气，而非花言巧语。信息清楚，立场明确，只是他引用的理论论据经常都是单调地支持他的观点，而不是真的介绍一种知识的实现过程。在第一章，米森提出“关系美学”一词时，没有必要地沿引了伯瑞奥德 1998 年的著作《关系美学》作为出

处，但是在第二章，在提到一个关于欧洲国家排外程度的调查时却没有写出处。在一些关键的时刻，脚注引导我们去书中的其他章节，或者米森其他出版过的著作。谈到另类的空间实践，他给读者的例子是他自己参与的项目（中东冬季学院、欧洲美术馆、东岸欧洲等）。奇怪的是，这本书没有探讨世上最大型的争议论坛：互联网。

那么，我们怎样解读米森的恶梦？我们怎样踏出第一步？要让我们阅读，且满怀热情地阅读，就不能没有令人吃惊的想法。这本书是一系列关于参与的著作的第三部，这可能是唯一一本反向的、通过引入一种怀疑意识，积极地引导我们介入的书。米森清楚地表明对现在体制和等级的怀疑论，这种怀疑慢慢转移到读者的身上，因为读者开始对米森的方法谨慎起来。的确，他在引言中便预先声明，这部书的材料、研究和知识“不是长年累月在图书馆和档案馆工作的成果”，这种明摆着非学术性的写作方式——却又同时是一篇博士论文——肯定会

引起对这部书的学术性及论文价值的挑战。事实上，有好几处，米森提出的议论似乎都有故意的挑衅性：在第八章《向市场学习》中，我们读到管理顾问或外来干预者应该是建筑师和设计师的榜样；像顾问专员、建筑师也应该是“提反对的动物”，而他的局外人身份又准许他们在现在系统中种下改变的种子。这样将每个计划设定成一系列需要挑战的条件而非稳定的元素，肯定会改变设计行业的运作。这个行业很悲哀地、愈来愈变成金融精英的服务提供者，但要改变它，却又要模仿那些将建筑师的工作变成商品的金融世界的人，这样似乎令人想不通。我会主张所谓“行业的荒凉景况”和很多建筑师都有的“对建造作为一种不断的经济机会的热爱”，跟米森所主张的作为范畴更新可行方法的机会主义干预，恰恰是来自同一套逻辑。无论如何，麦肯锡和康历斯维沙两家公司都已经直接在学校聘请建筑系学生了。

像上述这种没有解决观念问题变得更明显

了,因为米森对于共识的批评大多是源于查特尔·墨菲的争议性关系 (agonistic relations) 的建构,所以也附带了这个理论的所有问题。共识会孕育停滞不前,是的,但只有当共识真正达成的时候,而我们什么时候达成过共识呢? 争议模式设计出来是为了给民主政治中的主流模式提供一个另类方法,它是对诸如哈贝马斯和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等哲学家所提倡的协议式民主模式 (deliberative democracy) 的一种批评,因为这种模式只顾将现代民主作为理性共识的工具,而忽略了当代政治性的多样性,而墨菲认为这种多样性是不可能调和的。对我来说,争议多元主义和协议式民主的差别是把重点放在不同的地方,是一种像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它们都是对“聚合式民主” (aggregative democracy) 的批评,反对这种用政党代表多数民意的方式。争议多元主义和协议式民主都歌颂个人——协议式民主以道德,而争议性模式以权利: 它们都强调价值的多元性。但在指出协议模式和争

议模式的最明显的差别（即共识的价值）之前，墨菲多次指出她首要反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是他们总是忽略了在决策过程中情感和热情的重要角色。¹面对权力的角色根据的是热情多于理性，墨菲将争议性定义为对手而不是敌人之间的冲突。她也提出这种争议冲突不需要怎样应用，因为它是民主的基本条件。与之相反的是协议式民主试图达成同意或共识，而争议推崇不同意见的热情，以彰显现代民主的价值多元性。

墨菲指出了现代自由民主的两难，即它以自由之名却限制了人民的主权，²但她却没有那么直接地指出争议民主的一种明显的两难：要培养一个不共识互动的环境，需要比大家同意互相不同意更多——换言之，它绝不比达成共识容易。即是说，争议性声称共识构成停滞，但争议性自身何尝又不会构成停滞？争议性迫使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必须相信超越共识、不可调和的冲突具有生产力。支持争议关系的体制的人必须义无反顾地支持它，让

它得以实现。不幸的是，即使争议性推崇多元性，它也不能接受对争议性的拒绝和否认。有了这个观点，我们便不清楚争议如何可能“拆解和转化”社会上的霸权³，特别是当争议民主本身就是一种霸权系统。墨菲承认“一片霸权干预发生的领域”，一个理解权力的社会基础，“永远都是过去的霸权实践的结果”。⁴

如果米森的重点是要去颂扬非共识性知识生产，这部书中的其他声音却似乎在提出相反的观点。这部书远远不是一个表现多种目的的差异的场地，它收录了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米森的好友和宣传者）、艾亚尔·威兹曼（米森的论文导师）、查特尔·墨菲（米森的灵感泉源）及杰瑞米·宝德利和巴萨姆·艾·巴朗尼（宝德利和巴朗尼是 Manifest 8 的两位策展人，他们邀请了米森和他的同事设计其中一个展览场地）等人的参与……有了这样丰富的支持——特别是与墨菲的访问，二人的对话讽刺地显得相互同意——证明这本书更是

一篇制造共识的练习，而不是一篇产生不同意的力量的论文。

这种双重标准最令人惊愕之处（但这一点也是米森的议论的美丽之处）是在争议政治性中，任何不同的声音都可以中性化为支持的声音。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提出和谐的错处却也等于取消了批评所需要的观点。换过来，如果情况本来就是对抗性的，那么便不可能有另外的对抗性了。我批评、对抗和反对也真正地将本书落实为一个争议关系的空间。

这部书的症结出现在米森与墨菲的访问的结尾。当米森提出以英国上议院的中立议员作为一个独立的、非党派的行动的范例时，墨菲看出了作者其实最想做的是用理论去解释他自己的位置。米森以这些在上议院中（物理地、政治地）坐在左派和右派中间的中立议员为例子，这揭示了他潜在的依赖性，即使他自觉多么独立，但也想依附在体制中。在访谈中已经正确地提到，中立议员的自由，

只有在用共识建成的英国立法体制中才存在。在米森的书里，个人的角色被描写得那么的光荣，个人全然是自发、自主的，他拥有“严肃的兴趣”，“健康的好奇心”，“直觉但深刻的认识”，所以这个“个人”可以投身到任何类型的项目中，从医疗体制到教育到建筑到设计，这个专业模式对他来说是一种理想的行为模式。但这又怎样转译给我们其他的“空间实践工作者”？米森的方法对其他人是否都有效？在一个充满这样的“个人”的社会，集体是否还有价值？再者，实践建筑师会认同罗伯特·米克列治（Robert Miklitsch）对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即将政治纯理论化、将文化体制的实质性取消掉——但物质和其附带的经济才是一个希望建造的建筑师的头号兴趣，他们对论述并不感兴趣。哎呀，大部分的建筑学生进入建筑学院，其实都还是为了在毕业之后可以设计建筑物。即使我们表面地接受《参与的恶梦》中推崇的争议民主的价值，也无法否认它只是在世界上某些部分有效，

那些以民主为立法基础的地方，即仅仅局限在西方世界。

怀疑主题是米森这部书的主调子。由他在序言中的第一句便要求我们质疑民主，到他对建筑专业现在的情况的悲观评估，再到他号召对现有社会体制的自发的、强硬的干预，米森对体制的坚决不信任，也会鼓励读者对他的书的不信任。正如前面提到，他的非学术性的写作法会令细心的读者产生怀疑。这些论据怎样证明？米森说的“批判性”到底是什么意思？他随便地引用，既引用曾经为纳粹辩护的卡尔·施米特，又引用犹太文化评论家，大屠杀的生还者马塞尔·赖希-拉尼茨基，米森集合了一个复杂的令人迷惑的世界观，令他的著作显得十分奇特，最后它仅仅代表了一个身份，即这部书的作者。

怀疑的云雾在作者和读者之间团积着，但似乎隐约地，这正是米森想要的。像一朵卡通的云揭露了人的思想，对米森的疑问让我们积极投入到他的

文字中去。简而言之，他将我们变成他所说的“独立的局外人”。在第三章，米森抽出了斯多葛主义，于是也抽出了圣人的形象，但读者心中会同时出现一种怀疑，让我想起古典哲学中一个更早的人物：柏拉图，他记述苏格拉底（Socrates）和泰阿泰德（Theaetetus）的对话时提到的接生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苏格拉底去找年轻的孤儿泰阿泰德，让他简明地解释知识。苏格拉底不同意泰阿泰德的解释，他说他是个接生婆，但是他不是接生婴儿，而是他接生想法。苏格拉底的接生婆是知识的不育者，但他却可以在其他人身上带出、生产知识。像米森的“不请自来的局外人”，那些满怀“严肃的兴趣”和“健康的好奇心”的非专家，苏格拉底通过不断设立讨论和干预的场地而创造知识。所以，不断折磨我们的层层怀疑，就是知识的产前阵痛。

注释：

1. See Chantal Mouff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or Agonistic Pluralism," *Political Science Series 72* (Vienna: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2000).

2. Mouffe, *The Democratic Paradox* (London: Verso, 2005), 4.the nightmare of participation
3. Mouffe, "Art and Democracy: Art as an Agonistic Intervention in Public Space," in *Open: Art as a Public*, no. 14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2008), 9.
4. 同上, 9-10页。

参考文献

A

Agamben, Giorgio. *Means without End: Notes on Politics*.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Agamben, Giorgio. *State of Excep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Aureli, Pier Vittorio. *The Project of Autonomy, Politics and Architecture Within and Against Capitalism*.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8.

Auster, Paul. *Hand to Mouth: A Chronicle of Early Failur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7.

B

Babias, Marius. *Berlin. Die Spur der Revolte, Kunstentwicklung und Geschichtspolitik im Neuen Berlin*. Cologn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 2006.

Badiou, Alain.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London: Verso, 2001.

Badiou, Alain. *Metapolitics*. London: Verso, 2005.

Baecker, Dirk, and Alexander Kluge. *Vom Nutzen ungelöster Probleme*. Berlin: Merve Verlag, 2003.

BAVO, ed. *Cultural Activism Today: The Art of Over-Identification*. Rotterdam: Episode, 2007.

BAVO, ed. *Urban Politics Now* (reflect no. 6).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2007.

Benedikt, Michael. "Environmental Stoicism and Place Machismo—A Polemic." *Harvard Design Magazine* no. 16 (Winter and Spring 2002).

Bevan, Robert. *The Destruction of Memory: Architecture at War*. London: Reaktion, 2006.

Biemann, Ursula and Brian Holmes, eds. *The Maghreb Connection: Movements of Life Across North Africa*. Barcelona: Actar, 2006.

Bierbichler, Josef, Christoph Schlingensiefel and Harald Martenstein. *Zeichen 4: Josef Bierbichler, Christoph Schlingensiefel, Harald Martenstein: Engagement und Skandal—Ein Gespräch*. Berlin: Alexander Verlag, 1998.

Bierbichler, Josef. *Verfluchtes Fleisch*. Frankfurt: Verlag der Autoren, 2001.

Birnbaum, Daniel and Isabelle Graw. *Canvases and Careers Today—Criticism and Its Markets*. Berlin and New York: Sternberg Press, 2008.

Bishop, Claire. *Participation (Documents on Contemporary Art)*. London: Whitechapel;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Bloom, Allan.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8.

Boltanski, Luc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Gregory Elliott. London: Verso, 2006.

Bourriaud, Nicolas. *Relational Aesthetics*. Dijon: Les presses du réel, 1998.

C

Chase, John, Margaret Crawford, and John Kaliski, eds. *Everyday Urbanism*. New York: The Monacelli Press, 1999.

Critchley, Simon. *Indefinitely Demanding: Ethics of Commitment, Politics of Resistance*. London: Verso, 2007.

Crouch, Colin. *Post-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Curtis, Adam. *The Trap: What Happened to Our Dream of Freedom* (BBC documentary). First aired on March 11, 2007.

D

Dath, Dietmar. *Maschinenwinter. Wissen, Technik, Sozialismus. Eine Streitschrift*. Frankfurt: Suhrkamp (Edition Unseld), 2008.

Derieux, Florence, ed. *Harald Szeemann: Individual Methodology*. Zurich: JRP Ringier, 2008.

Derrida, Jacques. *The Politics of Friendship*. London: Verso, 1997.

Deutsche, Rosalyn. *Evictions: Art and Spatial Politic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8.

Diedrich Diederichsen. *Eigenblutdoping–Selbstverwertung, Künstlerromantik, Partizipation*. Cologne: Kiepenheuer & Witsch, 2008.

Diederichsen, Diedrich. *On (Surplus) Value in Art*. Berlin and New York: Sternberg Press, 2008.

Diederichsen, Diedrich. *Politische Korrekturen*. Cologne: Kiepenheuer & Witsch, 1996.

Doherty, Claire. *Contemporary Art: From Studio to Situation*. London: Black Dog Publishing, 2004.

Domela, Paul. *Manifesta Coffee Break*. Liverpool: Liverpool Biennial of Contemporary Art, 2005.

Doumani, Beshara, ed. *Academic Freedom after September 11*. New York: Zone Books, 2006.

E

Easterling, Keller. *Enduring Innocence: Global Architecture and Its Political Masquerade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5.

Eigenheer, Marianne, ed. *Curating Critique*. Frankfurt: Revolver–Archiv für aktuelle Kunst, 2007.

Eppler, Erhard. *Auslaufmodell Staat*. Frankfurt: Suhrkamp, 2005.

Esen, Orhan and Stephan Lanz, eds. *Self Service City: Istanbul*. Berlin: b_books, 2005.

F

Feher, Michael, Gaële Krikorian, and Yates McKee, eds. *Nongovernmental Politics*. New York: Zone, 2007.

Fernie, Jes, ed. *Two Minds: Artists and Architects in Collaboration*. London: Black Dog, 2006.

Fezer, Jesko and Martin Schmitz, ed. *Lucius Burckhardt: Wer plant die Planung? Architektur, Politik und Mensch*. Berlin: Martin Schmitz Verlag, 2005.

Fish, Stanley, "Intellectual Diversity: the Trojan Horse of a Dark Desig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The Chronicle Review*, February 13, 2004.

Foucault, Michel. "Two Lectures." In *Power/ Knowledge*, edited by Colin Gordon.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0.

Ford, Simon. *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A User's Guide*. London: Black Dog Publishing, 2005.

Franke, Anselm, ed. *B-Zone: Becoming Europe and Beyond*. Barcelona: Actar, 2006.

Franke, Anselm, Rafi Segal, and Eyal Weizman. *Territories—Islands, Camps and Other States of Utopia*. Berlin: KW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 Cologn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 2003.

Franke, Anselm and Eyal Weizman. *The Frontiers*

of Utopia and Other Facts on the Ground. Malmö: Malmö Konsthall; Cologn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 2004.

Friedman, Thomas L. *Hot, Flat, and Crowded: Why the World needs a Green Revolution—and how we can renew our Global Future*. London: Allen Lane, 2008.

G

Gillick, Liam. "The Difference Engine." *Artforum*, (May 2008).

Godfrey, Mark. "Protest and Survive." Interview with Gustav Metzger. *Frieze*, Issue 108 (Jun-Aug 2007).

Gramsci, Antonio. *Prison Notebooks: Selection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Groys, Boris. *Art Powe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8.

H

Hadot, Pierre.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Edited by Arnold I. Davidson. Oxford: Blackwell, 1995.

Hajer, Maarten and Arnold Reijndorp. *In Search Of The New Public Domain*.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2002.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Heidelberger Kunstverein, ed. *Islands+Ghettos*. Nuremberg: Verlag für Moderne Kunst, 2008.

Heidenreich, Stefan. *Was verspricht Kunst?* Berlin: Berlin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9.

Heidenreich, Ralph and Stefan Heidenreich. *Mehr Geld*. Berlin: Merve Verlag, 2008.

Helm, Toby. "Fischer's Sixties links with PLO spark new row." *The Telegraph*, June 19, 2001.

Hill, Jonathan. *The Illegal Architect*. London: Black Dog, 1998.

Hirsch, Joachim. *Herrschaft, Hegemonie und politische Alternativen*. Hamburg: VSA, 2002.

Hirsch, Michael. "Politics or Sovereignty: Remarks on 'The Political' inside and outside Contemporary Art." Unpublished.

Hirst, Paul. "Educ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New Ideas." In *AA Files*. London: AA Publications, 1995.

Hirst, Paul. *Space and Power: Politics, War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Polity, 2005.

Hlavajova, Maria and Jill Winder. *Concerning War: A Critical Reader* (BAK Critical Reader Series). Utrecht: BAK; Frankfurt: Revolver-Archiv für aktuelle Kunst, 2006.

Hohmann, Maria and Stefan Rettich, eds. *Von A bis Z, 26 Essays zu Grundbegriffen der Architektur*. Cologn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 2004.

Honig, Bonnie.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I

Igmade, ed. *5 Codes: Architecture, Paranoia and Risk in Times of Terror*. Basel: Birkhauser, 2006.

J

Joyce, Trevor and Shep Steiner, eds. *Cork Caucus: On Art, Possibility & Democracy*. Frankfurt: Revolver, 2006.

K

Königswieser, Roswita and Martin Hillebrand. *Einführung in die systemische Organisationsberatung*. Heidelberg: Carl-Auer Verlag, 2008.

Koolhaas, Rem. Introduction to *Volume 12: Al Manakh*, edited by Rem Koolhaas, Ole Bouman, Mark.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GSAPP; Amsterdam: Archis, 2007.

Koolhaas, Rem. "Finding Freedoms: Conversations with Rem Koolhaas." Interview by Alejandro Zaera. *OMA/ Rem*

Koolhaas 1987–1998. Madrid: El Croquis, 1999.

Koolhaas, Rem. *Content*. Cologne: Taschen, 2004.

Koolhaas, Rem, Stefano Boeri, Sanford Kwinter, eds. *Mutations*. Barcelona: Actar, 2001.

Koolhaas, Rem and AMO, eds. *Post-Occupancy*. Milan: Domus d'Autore, 2006.

Krause-Burger, Sibylle. Joschka Fischer: *Der Marsch durch die Illusionen*.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2000.

Kwinter, Sanford and Daniela Fabricius. "Urbanism: An Archivist's Art?" In *Mutations*. Edited by Rem Koolhaas, Stefano Boeri, Sanford Kwinter, Nadia Tazi, and Hans Ulrich Obrist. Barcelona: Actar, 2001.

L

Latour, Bruno and Peter Weibel, eds. *Making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5.

Larsen, Lars Bang, Cristina Ricupero, and Nicolaus Schafhausen, eds. *The Populism Reader*. New York and Berlin: Lukas & Sternberg, 2005.

Lazzarato, Maurizio. "New Forms of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of Knowledge." In *Readme! Filtered by Nettime: ASCII Culture and the Revenge of Knowledge*. Edited by Josephine Bosma, et al. New York: Autonomedia, 1999.

Leadbeater, Charles and Paul Miller, eds. *The Pro-Am*

Revolution. London: Demos, 2004.

Leonard, Mark. *What Does China Think?*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8.

Leonard, Mark. *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5.

Lilienthal, Matthias and Claus Philipp. *Schlingensiefs Auslander Raus*. Frankfurt: Suhrkamp, 2000.

Löw, Martina. *Raumsoziologie*. Frankfurt: Suhrkamp, 2001.

Long, Kieran. "MUF: Children Dressed up as Horses Take on the Modernists." *ICON* no. 22 (April 2005).

Loraux, Nicole. *The Divided City: On Memory and Forgetting in Ancient Athens*. New York: Zone Books, 2002.

Lütticken, Sven. *Idols of the Market: Modern Iconoclasm and the Fundamentalist Spectacle*. Berlin and New York: Sternberg Press, 2009.

M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 Hamburg: Verlag von Otto Meissner, 1867.

Mills, Wright. *C. Power, Politics, and People: The Collected Essays of C. Wright Mills*, edited by Irving Louis Horowitz. New York: Ballantine, 1963.

Misselwitz, Philipp and Tim Rieniets, eds. *City of*

Collision: Jerusalem and the Principles of Conflict Urbanism. Basel: Birkhauser, 2006.

Möllers, Christoph. *Demokratie–Zumutungen und Versprechen.* Berlin: Verlag Klaus Wagenbach, 2009.

Mörmann, Nina, ed. *Art and Its Institutions: Current Conflicts, Critique and Collaborations.* London: Black Dog, 2006.

Mörtenböck, Peter and Helge Mooshammer. *Networked Cultures.*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2008.

Mouffe, Chantal, ed. *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London: Verso, 1999.

Mouffe, Chantal. *The Democratic Paradox.* London: Verso, 2000.

Multitude e.V. and unfriendly Takeover, eds. *Wörterbuch Des Krieges / Dictionary Of War.* Berlin: Merve Verlag, 2007.

N

Nagel, U.P.W. “U wie Universität.” In *Von A bis Z, 26 Essays zu Grundbegriffen der Architektur.* Edited by Maria Hohmann and Stefan Rettich. Cologn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 2004.

Nollert, Angelika, Irit Rogoff, Bart De Baere, Yilmaz Dziewior, Charles Esche, Kerstin Niemann, and Dieter Roelstraete, eds. *A.C.A.D.E.M.Y.* Frankfurt: Revolver–Verlag für aktuelle Kunst, 2006.

O

Obrist, Hans Ulrich and Cedric Price. *Cedric Price–Hans-Ulrich Obrist in Conversation (The Conversation Series 21)*. Cologn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König, 2010.

Obrist, Hans Ulrich, ed. *Rem Koolhaas & Hans Ulrich Obrist: The Conversation Series*. Volume 4. Cologn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 2007.

Obrist, Hans Ulrich. *Delta X: Der Kurator als Katalysator*. Regensburg: Lindinger+Schmid Verlag, 1996.

Obrist, Hans Ulrich. *Interviews*. Volume I. Milan: Edizioni Charta, 2003.

Orwell, George. *Why I Write*.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4.

P

Pasquinelli, Matteo. *Animal Spirits: A Bestiary of the Commons*.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2008.

Pietromarchi, Bartolomeo, ed. *The [un]common place: art, public space and urban aesthetics in Europe*. Barcelona: trans.it; Actar, 2005.

R

Rancière, Jacques. *Hatred of Democracy*. London: Verso, 2006.

Rancière, Jacques. *On the Shores of Politics*. London: Verso, 1995; 2007.

Rancière, Jacques.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London: Continuum, 2006.

Rapp, Tobias. *Lost and Sound*. Frankfurt: Suhrkamp, 2009.

Reich-Ranicki, Marcel. *Wozu Lesen?* Interview by Elke Heidenreich. Zurich: Kein&Aber, 2005. Audiobook.

Riley, Denise. "What I Want Back Is What I Was." *Diacritics*. No. 1, vol. 32 (Spring 2002).

Rowe, Colin and Fred Koetter. *Collage City*,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84.

Ruby, Ilka and Andreas Ruby, eds. *Urban Transformation*. Berlin: Ruby Press, 2008.

S

Said, Edwar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Saint, Andrew. *The Image of the Architec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Schafhausen, Nicolaus, ed. *Neue Kunstkritik*. New York: Lukas & Sternberg, 2001.

Schenker, Christoph and Michael. Hiltbrunner, eds. *Kunst und Öffentlichkeit: Kritische Praxis der Kunst im Stadtraum Zürich*. Zurich: JRP Ringier, 2007.

Schmitt, Carl.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Schneider, Florian. "Collaboration: The Dark Site of the Multitude." Theory Kit. <http://kit.kein.org/node/1>. Schumpeter, Joseph A.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42.

Segal, Rafi and Eyal Weizman. *A Civilian Occupation: The Politics of Israeli Architecture*. Tel Aviv: Babel; London: Verso, 2003.

Seijdel, Jorinde and Liesbeth Melis, eds. *OPEN: Cahier on Art and the Public Domain, Art as Public Issue*. no. 14.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2008.

Sejima, Kazuyo. "Face to Face." In *HUNCH, Berlage Institute Report #6/7: 109 Provisional Attempts to Address Six Simple and Hard Questions About What Architects Do Today and Where Their Profession Might Go Tomorrow*. Edited by Jennifer Sigler. Rotterdam: episode publishers, 2003.

Shamiyeh, Michael. *Creating Desired Futures: On the Relevance of Design Thinking in Solving Complex Business Problems*. Basel: Birkhauser, 2010.

Shamiyeh, Michael and DOM Research Laboratory, eds. *Organizing for Change/Space: Integrating Architectural Thinking in Other Fields*. Basel: Birkhauser, 2007.

Shamiyeh, Michael and DOM Research Laboratory, eds. *What People Want, Populism in Art and Design*. Basel: Birkhauser, 2005.

Sheikh, Simon, ed. *In the Place of the Public Sphere*.

Berlin: b_books, 2005.

Sloterdijk, Peter and Sven Voelker. *Der Welt über die Strasse Helfen: Designstudien im Anschluss an eine philosophische Überlegung*. Munich: Wilhelm Fink Verlag, 2010.

Sontag, Susan. *Illness as Metaphor*. London: Allen Lane, 1979. Michael Sorkin, ed. *Variations on a Theme Park: The new American City and the End of Public Space*.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2.

Stimson, Blake and Gregory Sholette, eds. *Collectivism after Modernism: The Art of Social Imagination after 1945*.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T

Tapscott, Dan and Anthony D. Williams. *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London: Atlantic Books, 2008.

Till, Jeremy. "The Architect and the Other." *openDemocracy*. June 26, 2006, http://www.opendemocracy.net/ecology-landscape/architecture_3680.jsp.U.

V

Vanderlinden, Barbara and Elena Filipovic, eds. *The Manifesta Decade: Debates on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s*

and Biennials in Post-Wall Europ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Vaneigem, Raoul. *The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London: Rebel Press, 1983.

Venturi, Robert; Steven Izenour, and Denise Scott Brown, eds. *Learning from Las Vega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77.

W

Wallis, Brian, ed. *If you lived here: The City in Art, Theory, and Social Activism* (a project by Martha Rosl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1.

Walter, Franz. *Im Herbst der Volksparteien? Eine kleine Geschichte von Aufstieg und Rückgang politischer Massenintegration*.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2009.

Weizman, Eyal, and Hollow Land. *Israel's Architecture of Occupation*. London: Verso, 2007.

Welchman, John C., ed. *Institutional Critique and After*. Zurich: JRP Ringier, 2006.

Z

Žižek, Slavoj, Eric L. Santner and Kenneth Reinhard. *The*

Neighbor: Three Inquiries in Political The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Žižek, Slavoj. *Violence.*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8.

Periodicals

Texte zur Kunst. "Institutionskritik." September 2005.

Springerin. "Theory No." 2006. *Log* 1-19. *Volume.* 1-23

Own related Research Work (chronological)

Miessen, Markus and Shumon Basar, ed. *Did Someone Say Participate, An Atlas of Spatial Practi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6.

Müller, Vanessa Joan and Nicolaus Schafhausen. *Under Construction: Perspectives on Institutional Practice.* Cologne: 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 2006.

Basar, Shumon, Antonia Carver, and Markus Miessen. *With/Without: Spatial Products, Practic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Bidoun; Dubai: Moutamarat, 2007.

Koolhaas, Rem, Ole Bouman and Mark Wigley, ed. *Al Manak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Amsterdam: Archis, 2007.

Müller, Vanessa Joan, and Astrid Wege. *European Kunsthalle 2005 2006 2007.* Cologne: European Kunsthalle, 2007.

Miessen, Markus, ed. *The Violence of Participation*. Berlin and New York: Sternberg Press, 2007.

Ballesteros, Mario, Albert Ferre, and Irene Hwang. *Verb Crisis, Architectural Responses to Unprecedented Conditions*. Barcelona: Actar, 2008.

Miessen, Markus, ed. *East Coast Europe*. Berlin and New York: Sternberg Press, 2008.

Hirsch Nikolaus, Philipp Misselwitz, Markus Miessen, Matthias Görlich, ed. *Institution Building: Artists, Curators, Architect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stitutional Space*. Berlin and New York: Sternberg Press, 2009.

致谢

作者非常感谢下面的个人、机构和出版商。

出版商：卓越超群的出版人 Caroline Schneider，真诚而有见识的编辑 Matthew Evans，出版人 Tatjana Günthner 和 Melinda Braathen。

设计：不断给我惊喜的 Zak Kyes 和 Grégory Ambos。

合作者：Chantal Mouffe、Eyal Weizman、Hans Ulrich Obrist、Carson Chan、Jeremy Beaudry 和 Bassam El Baroni 慷慨大方地贡献了他们的时间、合作和知识。Dan Perjovschi 为本书的出版创作了一系列绘画。Piero Golia 和 the Mountain School of Arts 为本书提供了 Peter Coffin 的照片。

内容阅读者：Tina DiCarlo、Patricia Reed 和 Magnus Nilsson，从始至终阅读本书，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国际出版商：Merve Verlag 出版商 Tom Lamberty（德语版）、Archive Books 出版商 Chiara Figone（意大利语版）、

dpr editorial 出版商 Ethel Baraona Pohl 和 César Reyes Nájera (西班牙语版)、Metis Kitap 出版商 Semih Sökmen (土耳其语版)、维他命空间的胡昉 (中文版)。

研究材料出版物 : Cynthia Davidson and Tina DiCarlo at LOG Journal (New York); Tim Griffin and Michelle Kuo at Artforum (New York); Alessio Ascari and Chiara Costa at Kaleidoscope (Milan); Joerg Koch at 032c (Berlin); Monica Narula, Sarai, and 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Delhi); Jenna Sutela at Ok Do (Helsinki); Ralf Ferdinand Broekman at Build (Wuppertal); Joana da Rocha Sá Lima at Conditions (Oslo); Jeff Khonsary, Kristina Lee Podesva, Antonia Hirsch and Amy Zion at Fillip (Vancouver); Max Andrews and Mariana Canepa Luna at Latitudes (Barcelona); Krystian Woznicki at the Berliner Gazette (Berlin); Stephan Sigrist and Simone Achermann at Abstracts/W.I.R.E. (Zurich); Max Dax at Spex (Berlin); Pelin Tan at Muhtelif (Istanbul); Stephanie White at On Site (Calgary); Pedro Gadanho at Beyond (Amsterdam); Carmella Jacoby Volk at Block (Tel Aviv); Roger Conover at MIT Press (Cambridge); Felix Burrichter at Pin-Up (New York); Vanessa Joan Müller at Beton Brut (Düsseldorf); Chiara Figone at Archive Journal (Berlin/Turin); Eva Munz at Der Zeit (Berlin); Julia Grosse at taz die tageszeitung (Berlin); Cao Fei at People's Monthly (Beijing); Aurélien Gillier at FaceB (Paris); Fabrizio Gallanti at Abitare (Milan); Joseph Grima at Domus (Milan); Arjen Oosterman at Volume/Archis (Amsterdam); Beatrice Galilee

at Icon (London); Nina Rappaport at Yale Constructs (New Haven); Lisa Farjam, Negar Azimi, and Antonia Carver at Bidoun (New York); Jesko Fezer at AnArchitektur (Berlin); Renate Ferro and Tim Murray at Rhizome (New York); Anthony Barnett at openDemocracy (London); Georg Schöllhammer at Documenta Magazine online Journal (Kassel); Nikolaus Kuhnert and Anh-Linh Ngo at archplus (Berlin); James Westcott at Art Review (London); Christian Höller at Springerin (Vienna); Christoph Laimer at Derive (Vienna); Michele Robecchi at Contemporary (London); Xerxes Cook and Shumon Basar at Tank (London); Veronika Leiner at Eurozine (Vienna); sexymachinery at sexymachinery (London); Paolo Priolo at Klat (Milan).

发展、讲座和观念的传播者：Chantal Mouffe and the Democracy Club (London); Eyal Weizman at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Architecture at Goldsmiths (London); Mohsen Mostafavi at the 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Cambridge, MA); Mark Cousins at the London Consortium (London); Roemer van Toorn at the Berlage Institute (Rotterdam); Brett Steele at the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London); David Graham Shane at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Teddy Cruz and the Political Equator team (San Diego/Tijuana); Kristina Podesva at Emily Carr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Vancouver); Ute Meta Bauer at MIT (Cambridge, MA); Adi Shamir at Van Alen Institute (New York); Sarah Herda at the Graham Foundation (Chicago); Melanie O'Brian at Artspeak (Vancouver); Arno van

Roosmalen and Jane Huldman at Stroom (The Hague); Bart Witte and Luc Janssens at Expodium (Utrecht); Binna Choi at Casco (Utrecht); Camille Louis at Le 104 Centquatre (Paris); Deborah Hauptmann and Warren Neidich at the TU Delft; Tim Rieniets at the ETH (Zurich); Stefano de Martino and Bart Lootsma at the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Huib Haye van der Werf at NAI (Rotterdam); Annick Kleizen at Museum De Paviljoens (Almere); Michael Krichman at inSITE (Tijuana); Markus Bogensberger and Vilja Popovic at Haus der Architektur (Graz); Gianni Jetzer at the Swiss Institute (New York); Michael Shamiyeh at DOM Research Laboratory (Linz); Carin Kuoni at the New School, Vera List Center for Arts and Politics (New York); Joshua Decker at Roski School of Fine Arts (Los Angeles); Jesko Fezer at ZHdK (Zurich); BAVO at Jan van Eyck Academie (Maastricht); Renate Ferro at Cornell (Ithaca, NY); Suzanne Lacy at Otis (Los Angeles); and the Strelka Institute Moscow.

欧洲艺术馆 : Nikolaus Hirsch, Philipp Misselwitz, Matthias Gölich, Nicolaus Schafhausen, Vanessa Joan Müller 和 Nina Köller。

中东冬季学院 : Zahra Ali Baba。

最近几年里的支持者 : Ralf Pflugfelder, Andrea Phillips, Shumon Basar, Céline Condorelli, Rem Koolhaas, Madelon Vriesendorp, Carlos Villanueva Brandt, Olafur Eliasson,

Eric Ellingsen, Christina Werner, Patricia Reed, Alenka Suhadolnik, Srdjan Jovanovic Weiss, Katherine Carl, Johanna Billing, Armin Linke, Wilfried Kühn, Peter Sloterdijk, Fulya Erdemci, Sunny Rahbar, Douglas Coupland, Sally Tallant, Nicola Lees, Keller Easterling, RoseLee Goldberg, Barbara Steiner, Stephan Trüby, Franz von Stauffenberg, April Lamm, Tirdad Zolghadr, Alexander Kluge, Josef Bierbichler, Christoph Schlingensief, Martin Wuttke, Abaseh Mirvali, Mihnea Mircan, Meta Haven, Sören Grammel, Adam Budak, Oren Lieberman, Hou Hanru, Felix Vogel, Bryan Boyer, Dorothee Richter, Ole W. Fischer, Yann Chateigné, Friedrich von Borries, Karen Marta, Emiliano Gandolfi, Aaron Levy, Can Altay, Alessandro Petti, Bettina Pousttchi, Andre Buchmann, Elke aus dem Moore, Lukas Feireiss, Kyong Park, Ashkan Sepahvand, Vincent Normand, John McCusker, Ingeborg Lüscher 和 Una Szeemann。

访谈：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做了许多访谈和对话，对本书的出版产生了影响。我非常感谢 Stefano Boeri, Rodney LaTourelle, Tom McCarthy, Erhard Eppler, Noam Chomsky, Paul Shephard, Liam Gillick, Karl Schlögel, Terence Ko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McKenzie Wark, Francesco Careri & Stalker, Maison Martin Margiela, LE.ft, Crimson Architectural Historians, Edwin Heathcote, Zdenka Badovinac, Eda Cufer, IRWIN, Viktor Misiano, Erzen Shkololli, Nedko Solakov, Marina Abramovic', Kazys Varnelis, Jordan Wolfson, Sislej Khafa, Pier Vittorio Aureli, Frank van der Salm, Martin Tröndle,

Philipp Oswalt, Tobias Rapp, Paul Davies, Lord Rogers, Paddy Ashdown, Shamim Momin, Orchard, Ayzit Bostan, Abäke, Lynne Cooke, Lucas Ossendrijver, Christoph Keller 和 Taryn Simon。

特别感谢的是，每天给予我支持，并容忍我的生活方式的人：Nina Miessen。

合作者简介

巴萨姆·艾·巴朗尼 (Bassam El Baroni)

生活和工作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他是一位策展人、艺术评论家,亚历山大当代艺术论坛 (ACAF) 的创始人和总监。ACAF 是个集体制的非盈利的艺术空间,于 2005 年开始投入运营。巴朗尼最近的策展项目包括在瑞士的伯尔尼 PROGR 艺术家空间“你、我以及后一切时代的发展轨迹”(You, Me and the Trajectories of a Post-Everything Era), 以及 2005—2006 年的 ACAF ; 2008 年亚历山大港首届国际媒体艺术节 ; 2009 年和海尔格 - 玛丽·诺比 (Helga-Marie Nordby) 在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奥斯陆、挪威联合策划的“困在琥珀里 : 重新制定的十年的焦虑”(Trapped in Amber: Angst for a Re-

enacted Decade) ; 2009 年在亚历山大港举行的非商业民间技术组织教育。巴朗尼是 ACAF 捐助的 Manifesta 8 的策划人，杰瑞米·宝德利任此项目的联合策展人。Manifesta 8 (穆尔西亚自治区，西班牙，2010) 由 ACAF、公开秘密室 (the Chamber of Public Secrets) 和 tranzit.org 联合策划。除了他的策划项目，巴朗尼最近主要专注于开发和进行一系列引起轰动的名为 FOXP2 的演讲，最近的一次是纽约 FOXP2，他在来自纽约的口技师肯尼·穆罕默德 (Kenny Muhammad) 创作的音乐伴奏下发表了演讲。

acafspace.org

杰瑞米·宝德利 (Jeremy Beaudry)

来自美国费城的一名艺术家、设计师和教育家，他是那里的艺术大学的多媒体教授。自 2006 年以来，他一直担任一个没有命名的智囊团意义研究部的主任。这个艺术家机构启动了质问当代城市问题

的特定场域对话，表现行为以及教育项目。他采取单干和合作两种方式，展示了国内和国际场所的一些项目，包括芝加哥的海德艺术中心（Hyde Park Art Center）、蒙特利尔 2007 Artivistic、贝尔法斯特的（Belfast）2009 年 ISEA。2008 年，他担任埃及亚历山大港的亚历山大当代艺术论坛的进驻艺术家，这是美国国家文化特使项目部的一个部分。他和巴萨姆·艾·巴朗尼一起进入亚历山大当代艺术论坛的策划团队，该团队是策划 Manifesta 8、欧洲当代艺术双年展的三个团体之一。

Meaning.boxwith.com

卡森·陈（Carson Chan）

建筑作家和策展人。他是 PROGRAM 的中心主任，PROGRAM 是一个总部设在柏林的关于艺术和建筑合作的非盈利计划。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建筑学士和哈佛大学的建筑理论和建筑史的设计研究专业的硕士学位。在柏林，他在巴考雷

宾格建筑事务所 (Barkow Leibinger Architects) 和新国家画廊 (Neue Nationalgalerie) 的建筑部门供职。2008 年, 他参加了顶尖艺术家、建筑师以及策展人为纪念密斯·凡·德罗大厦 (the Mies van der rohe building) 40 周年举办的专题讨论会, 事业至此达到巅峰。陈还是几个文化出版社的正式作家, 其中包括 O32c (柏林), 而且他还兼任特约编辑。他是几个文化机构积极的顾问, 包括 2008 年 DLD (慕尼黑)、2010 年欧洲丹麦 (European Denmark) 以及 Premio Furla VIII (米兰)。目前他正致力于关于建筑思想的策划及展示的一系列的扩展论文。

Programonline.de

查特尔·墨菲 (Chantal Mouffe)

政治理论家、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政治理论学教授。她在欧洲、北美洲以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大学任教, 并且在哈佛、康奈尔、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进行研究

工作。1989年到1995年间，她是巴黎哲学国际学院的项目主管。她编辑过《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理论》(*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出版社, 1979)、《激进民主主义的维度：多元化、公民权、共同体》(*Dimensions of Radical Democracy: Pluralism, Citizenship, Community*) (Verso 出版社, 1999)、《解构与实用主义》(*Deconstruction and Pragmatism*) (Routledge 出版社, 1996)、《卡尔·施米特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Carl Schmitt*) (Verso 出版社, 1999) 及和厄内斯特·拉克劳 (Ernesto Laclau) 合著《争取统治权主义和社会主义战略：向激进民主政治的发展》(*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出版社, 1985)；她创作了《政治性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Political*) (Verso 出版社, 1993)、《民主悖论》(*The Democratic Paradox*) (Verso 出版社, 2000) 以及《论政治性》(Routledge 出版社, 2005)。墨菲目前研究政治理论的非理性主义的方

法，系统地阐述了民主的一种竞争模式，并且从事关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以及多极化世界秩序中的欧洲地位的研究项目。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 (Hans Ulrich Obrist)

1968年5月出生于苏黎士。2006年成为蛇形画廊展览和项目部联合总监和国际项目总监。在这之前，他自2000年以来就任巴黎城市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1993年至2000年间任维也纳的博物馆策展人。奥布里斯特从1999年以来策划和联合策划了二百多次的个展和群展以及国际性的双年展，包括：“Manifesta I”，1996；“实验室”，1999；“移动中的城市”，1997；“第一届柏林双年展”，1998；“乌托邦站”，2003；“广州三年展”，2005；“达喀尔双年展” (Dakar Biennale)，2004；“第一届和第二届莫斯科双年展”，2005和2007；“里昂双年展”，2007；“横滨三年展”，2008。在2007

年，他和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为曼彻斯特国际节联合策划“邮差时刻”（Il Tempo del Postino）。同年，凡艾伦学院（the Van Alen）授予他2007至2008年度纽约奖高级研究员基金。奥布里斯特2005年在斯图加特构思了“马拉松”系列。这是第一次举办这样的活动，“马拉松采访”2006年在蛇形画廊举行，奥布里斯特和建筑师雷姆·库哈斯对当代文化的顶尖人物进行了二十四小时的采访。近来的出版物有：《策展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Curating*）（JRP|Ringier出版社）、《格哈德·里希特文本》（*Gerhard Richter Text*）（Walther König和Thames & Hudson出版社）、《艾未未：超越艺术的方式》（*Ai Wei Wei: Ways Beyond Art*）（Ivory出版社）、《谈话系列1—20卷》（*The Conversation Series, vol. 1-20*）（Walther König出版），奥布里斯特也是《住》（*Abitare*）、《艺术论坛》、*Paradis* 以及《032c》杂志的特约编辑。2009年，他成为英国皇家建筑学院（RIBA）的荣誉研究员。

艾亚尔·威兹曼 (Eyal Weizman)

建筑师，伦敦大学的金斯密斯学院 (Goldsmiths) 的研究中心主任。他曾在伦敦建筑学会学习建筑学，并在伦敦协会 / 伦敦伯克贝克学院 (Birkbeck College) 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2007 年以来，他成为拜特萨霍 (Beit Sahour) / 巴勒斯坦的一个名为“非殖民化建筑”的建筑团体的成员。2008 年以来，他进入以色列占领区人权资料中心董事会。威兹曼在世界的很多机构授课、作讲座、策划以及组织会议。他的著作有《较小的罪恶》(*The Lesser Evil*) (Nottetempo 出版社，2009)、《空洞的陆地》(*Hollow Land*) (Verso 出版社，2007)、《平民职业》(*A Civilian Occupation*) (Verso 出版社，2003)、《领土》(*Territories*) 丛书 (1-3)、《黄色的节奏》(*Yellow Rhythms*)，在多种期刊和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文章，也编辑过书籍。威兹曼为几个期刊和杂志定期撰稿，而且是它们的编委之一，其中包括《人类学》(*Humanity*)、《小陈列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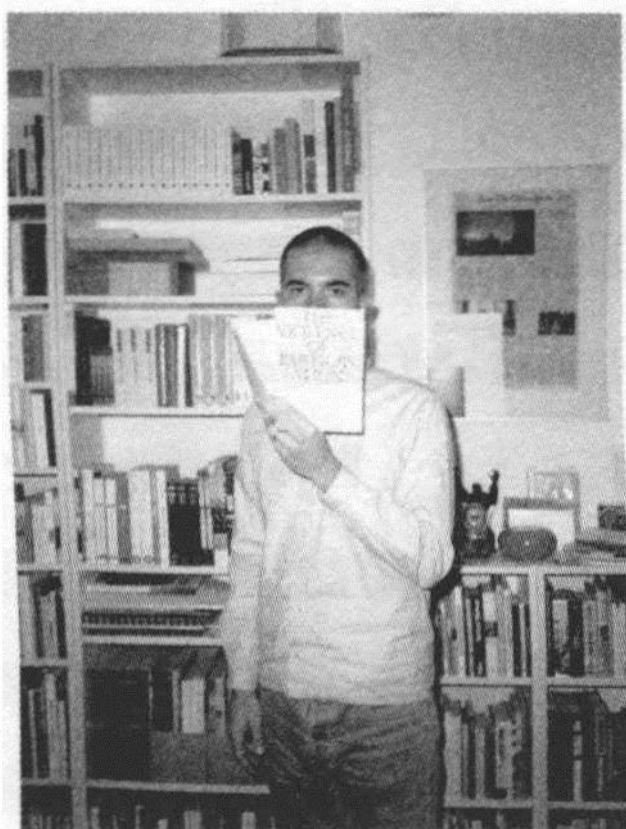
(*Cabinet*) 以及《拐点》(*Inflexion*)。威兹曼获得了 2006—2007 年的詹姆斯·斯特林演讲奖 (James Stirling Memorial Lecture Prize), 并于 2010 年在沃里克 (Warwick) 发表了爱德华·萨依德的纪念演讲。

Decolonizing.ps

Btselem.org

作者简介

马库斯·梅森（1978— ），建筑师、作家。参与四部曲* 发起人。他的工作范围包括批评空间实践的探询、机构建设和空间政治。



* 该简介是作者在2012年8月发给编辑的更新版，到目前为止，关于参与的著作有四部曲。——编者注

在多样化的合作中，马库斯已经出版多部著作，有《演员、代理和服务员》(*Actors, Agents and Attendants*, Sternberg Press/SKOR, 2011)、《从参与的恶梦中醒来》* (*Waking Up From The Nightmare of Participation*, Expodium, 2011)、《参与的恶梦》(Sternberg Press, 2010)、《机构建设》(*Institution Building*, Sternberg Press, 2009)、《欧洲东海岸》(*East Coast Europe*, Sternberg Press, 2008)、《参与的暴力》(Sternberg Press, 2007)、《有 / 无：中东的空间成品、实践和政治》(Bidoun, 2007)、《有人说参与吗？空间实践的地图集》(MIT Press, 2006) 和《空间的不确定性》(*Spaces of Uncertainty*, Müller & Busmann, 2002)。

他的作品已经在国际上出版和展出，包括里昂、威尼斯、Performa、Manifesta、韩国光州、深圳双年展。建筑项目包括英国的 LU 艺术中心、韩国光州双年

* 此为参与第四部曲。——编者注

展中心、美国 Performa Hubs (2009/2011)、西班牙 Manifesta 8、荷兰 Witte de With 当代艺术中心。目前最大的项目：前身为北约核弹设施的德国艺术馆建筑总体规划。

马库斯是德国科隆欧洲艺术馆、荷兰阿姆斯特丹 SKOR、瑞士苏黎世 WIRE、美国纽约斯洛文尼亚政府顾问。

2008 年,他创办中东冬季学院(迪拜和科威特)。学术职务包括伦敦建筑协会 (2004—2008)、鹿特丹 Berlage 机构 (2009—2010)、卡尔斯鲁厄 Hochschule für Gestaltung 设计学院 (2010—2011)。2010 年是哈佛 GSD 研究员。目前是法兰克福 Städelschule 学院的批评空间实践的教授、瑞士日内瓦 HEAD 设计学院以及洛杉矶 USC 大学的客座教授。

www.studiomiessen.com

www.criticalspatialpractice.org

www.winterschoolmiddleeast.org

关于译者

翁子健，毕业于香港大学，现任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研究员。

出版人/王吉胜 文库主持/张业宏

责任编辑/方小丽 特约编辑/周 凌

装帧设计/李 琳 王英晓

封面图片/Backbench, Manifesta 8,
Murica, Spain, 2010

空间设计/Markus Miessen, Ralf
Pflugfelder和Magnus Nilsson

拍摄/Pablo Ferao

投稿邮箱/beepub@hotmail.com

战略合作/ 博群网
beepub.cn

蜜蜂文库★当代艺术

总策划：董冰峰 张业宏

执行策划：董冰峰

丛书策划：董冰峰 胡昉 袁小滢 潘广宜

媒体艺术卷

策划：袁小滢

★《未来就是现在》

[英] 罗伊·阿斯科特 / 著

袁小滢 / 编 周凌 任爱凡 / 译

★《语境提供者》

[美] 马格·乐芙乔依 克里斯蒂安·保罗 维多利亚·维斯娜 / 主编

任爱凡 / 译

*《走近罗伯特·勒帕吉》

[德] 芮内特·克尔特 [加] 罗伯特·勒帕吉 / 著

宋逸伦 / 译

策展人卷

策划：董冰峰 潘广宜

*《在中间地带》

[法] 侯瀚如 / 著

★《年代学》

[瑞典] 丹尼尔·伯恩鲍姆 / 著
尹晟 张秀峰 / 译

*《疾走亚洲》

[日] 南条史生 / 著
潘广宜 / 译

*《艺术与城市：独立策展人15年的轨迹》

[日] 南条史生 / 著
潘广宜 / 译

*《现代艺术入门（为女子而写）》

[日] 长谷川佑子 / 著

*《一种独立论述》

黄建宏 / 著

★《苦恼人的微笑》

胡昉 / 著

*《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

[德] 汉斯·贝尔廷 / 著
卢迎华 苏伟 / 评注

★ 《行动的书》

高士明 / 著

话语实践卷

策划：胡昉

★ 《走向公众》

[德] 鲍里斯·格洛伊斯 / 著

苏伟 李同良 等 / 译

★ 《什么是当代艺术？》

e-flux journal / 编

陈佩华 苏伟 等 / 译

★ 《参与的恶梦》

[德] 马库斯·米森 / 著

翁子健 / 译

* 《关于策展的一切》

[瑞士]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

里斯特 / 著

任爱凡 / 译

★ 《策展简史》

[瑞士] 汉斯·乌尔里希·奥布

里斯特 / 著

任西娜 尹晟 / 译

* 《关系美学》

[法]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 / 著

黄建宏 / 译

* 《后制品》

[法] 尼古拉斯·伯瑞奥德 / 著

黄建宏 / 译

* 《双年展必读》

[挪] 艾琳娜·菲利波维奇 等 / 编

* 《突如其来：当代艺术中的重要之事》

[德] 约克·海瑟 / 著

空间实践原创卷

策划：胡昉

*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相看两不厌》

[丹] 奥拉维尔·埃利亚松 / 著

翁子健 / 译

艺术收藏卷

策划：董冰峰

★ 《收藏当代艺术》

[意] 安德里亚·贝利尼 等 / 编

王萍 / 译

* 《用零用钱收藏当代艺术》

[日] 官津大辅 / 著

★为已经出版，*为即将出版。